目 录

总序 …… (1)
本卷序 …… (5)

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蓬子 …… (1)
-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 (1)
-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 (3)
-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 (6)
- 抄检姚家始末 …… (8)
-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 (10)
-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 (12)
-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 (17)
-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 (19)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 (25)
- 本是阔少爷 …… (25)
- 象征派诗人 …… (32)
-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 (41)
-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 (44)

• 出任“左联”执委 …… (48)
• 蓬子和《北斗》 …… (53)
• 鲁迅写诗《赠蓬子》 …… (59)
•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 (64)
• 转入秘密战线 …… (68)

第三章 蓬子转向 …… (71)
•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 (71)
•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 (77)
•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 (86)
•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 (96)
•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 (104)

第四章 望子成龙 …… (111)
• 精明的投机商 …… (111)
•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 (116)
•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 (120)
•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 (122)
•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 (126)

第五章 对胡风“反戈一击” …… (129)
•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 (129)
• 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 (132)
• 结识张春桥 …… (136)
• 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 (139)
• 跌入了泥泞的路 …… (141)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 (149)
- 跨进《萌芽》编辑部 …… (149)
-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 (151)
-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 (156)
- 突然跃为“新星” …… (159)
-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 (161)
-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 (169)
- 横扫“右派” …… (172)

第七章 文坛恶棍 …… (179)
- “双喜临门” …… (179)
- 讨伐文坛老将 …… (181)
- 姚文元的“诗传单” …… (184)
- 一度“失业”的“棍子” …… (186)
-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 (190)
-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 (192)

第八章 几番论战 …… (195)
-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 (195)
- 巴金怒斥“姚棍子” …… (197)
- “骆漠”是谁 …… (202)
- 《杂家》事件 …… (205)
- “大写十三年”的吹鼓手 …… (210)
-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 (214)
-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 (216)
- “女客人”把上海作为“基地” …… (220)

第九章 评《海瑞罢官》 …… (224)
- 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 (224)
-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 (227)
- “火力侦察” …… (230)
- “歪批《三国》” …… (233)
- 《文汇报》的太上皇 …… (238)
-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 (243)
-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 (251)
- 终于“引蛇出洞” …… (255)
- “围城打援” …… (258)

第十章 拉开“文革”大幕 …… (269)
- 二月：南北对垒 …… (269)
- 瞄准邓拓 …… (275)
- 挖“后台”——彭真 …… (279)
- “海瑞热”的来历 …… (283)
-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 (288)
-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 (291)
-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 …… (296)
- 文网恢恢 血泪斑斑 …… (308)

第十一章 进入“中央文革” …… (315)
- 成了“中央首长” …… (315)
- 和张春桥一起发动“一月革命” …… (317)
-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 (319)
-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 (325)
- 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 (330)
- 文章少了话多了 …… (334)

• 姚蓬子之死 …… (337)

第十二章 “舆论总管” …… (341)
• 取陈伯达而代之 …… (341)
• “左”眼看画 …… (350)
• “两面派”和“暴发户” …… (354)
• 毛泽东说姚文元“不懂马列” …… (357)
• 突然发动“评《水浒》” …… (359)
•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 (365)
• 《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 (372)
• “戈培尔第二” …… (380)
• 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 (390)
• 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 (400)
• 末日的疯狂 …… (409)
• 终于束手就擒 …… (417)

尾 声 …… (427)

附录一 姚氏父子书目 …… (435)
附录二 姚文元文章目录 …… (438)
附录三 关于姚蓬子的通信 …… (467)

后记 …… (470)

总 序

不少读者以为，中国有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一个是写《江青传》、《反右派始末》的叶永烈。

在这些读者看来，写《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不可能写《江青传》；写《江青传》的作者，也不可能写《十万个为什么》。因为这是两类内容完全不同、题材完全不同、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据此推测，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都叫“叶永烈”的作家。

其实，只有一个叶永烈——早期写科普，后来写纪实。

这次，出版《叶永烈文集》，我也就把文集分成两大部分：《叶永烈科普文集》和《叶永烈纪实文集》。

这次编定的《叶永烈文集》，共五十卷。其中：

《叶永烈科普文集》，二十三卷；

《叶永烈纪实文集》，二十七卷。

我的纪实作品，不仅卷数比科普作品多，而且总字数也多。我的纪实文集目录如下：

第一卷：《国共风云》

第二卷：《反右派始末》

第三卷：《江青传》

第四卷:《张春桥传》
第五卷:《王洪文传》
第六卷:《姚文元传》
第七卷:《一九七八:中国命运大转折》
第八卷:《陈云之路》
第九卷:《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第十卷:《毛泽东的秘书们》
第十一卷:《叶永烈采访手记》
第十二卷:《倾城之恋:梁实秋与韩菁青》
第十三卷:《星条旗下的中国人》
第十四卷:《雾中奇案:戴厚英的心路历程》
第十五卷:《名人沉浮录》
第十六卷:《名人风云录》
第十七卷:《商品房大战》
第十八卷:《我的家一半在美国》

此外,还有《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陈伯达传》、《是是非非何智丽》、《离人泪》、《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六卷,已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次编选文集时,曾为书名颇费踌躇:到底叫《叶永烈文集》呢,还是叫《叶永烈全集》?

就我的科普创作而言,已经“封笔”,画上句号,可以称《全集》。因为我早已不写科普了,今后也不会再写科普。

不过,就纪实文学的创作而言,我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权衡再三,最后决定还是以《叶永烈纪实文集》作为总书名。

常有读者问我:你为什么从科普创作转向纪实文学?

这不是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大体上讲,有这

么几个因素：

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十而不惑”，逐渐转向对于国家命运的思索，对于历史的深思；二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三是纪实文学的领域比科普更广泛，创作的路子更宽广，而且更接近读者，贴近时代；四是读者对我的选择——我的纪实文学比科普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社会反响。这在客观上表明，我更适合从事纪实文学创作。

就这样，我从科普创作完全转向了纪实文学创作。尽管许多朋友在一开始不理解，但是现在他们都认为我的“转轨”是非常成功的。

这次编文集，有点类似于商店的“年终大盘点”。过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写了多少作品。这次通过“年终大盘点”，这才“盘”清楚，我从十一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起，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总共写了一千六百万字（准确的字数尚待《叶永烈纪实文集》出齐之后才能得知），总共写了五十来卷书。

这次“大盘点”，前后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很少写新作，全力以赴编选文集。我的妻子杨蕙芬女士协助我整理文集，出了大力。

其实，光是“盘点”，用不着那么多时间。我以为，把自己的作品进行“盘点”，系统地出版，这还不是出版文集的主要目的。我希望通过这次出版文集，能够使作品的整体质量提高一步。正因为这样，我趁这次出版文集，对许多作品，尤其是对纪实长篇作了修改、补充，有的还作了补充采访。整套文集补充了几十万字。尽管修改旧作比写新作要麻烦得多，犹如补旧衣比做新衣麻烦得多，有时为了核对一件史实、一个年月日、一个人名，要耗费很多精力，但是我还是尽力去做，因为我毕生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把更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在完成《叶永烈纪实文集》之后，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其

中的中、短篇新作已经补入《叶永烈文集》之中。另外，我还创作了长篇新著“人生三部曲”，即《是是非非“灰姑娘”》、《走进历史深处》和《出没风波里》。五十多万字的《是是非非“灰姑娘”》和七十多万字的《走进历史深处》，正在出版。《出没风波里》正在写作之中。这三部长篇新著，没有收入《叶永烈纪实文集》。

如果把这三部长篇新著计算在内，《叶永烈纪实文集》总共三十卷。

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

新近在全国各地书摊上发现冒名的《叶永烈文集》，其中有长篇《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林彪》。这两部长篇不是我的作品，而是香港作家的作品。盗版书商冒用《叶永烈文集》的名义，出版《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林彪》，既严重侵犯《叶永烈文集》的声誉，也严重侵犯香港作家的著作权，我已经委托我的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予以追究。

叶永烈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于上海沉思斋

本卷序

本卷是《“四人帮”全传》四部系列纪实长篇中的一部。

本书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完成初稿，书名叫《姚氏父子》，共约十三万字。其中有关姚蓬子的部分，曾经以《姚蓬子秘史》为题，发表于上海《海派文学》创刊号上。

初稿经过修改，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完二稿。

此后又进行了补充采访，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完成第三稿，三月七日改定，内容扩充到二十五万字，印出了单行本，书名仍为《姚氏父子》。

出版单行本之后，又继续进行采访，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写出第四稿，书名改为《姚文元传》，在一九九三年印出新的单行本。

这次，趁《姚文元传》收入《叶永烈文集》之际，再度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印行新版本。

叶永烈

二〇〇〇年六月八日于上海沉思斋

◎叶永烈 著

新版

『四人帮』全传之四

姚文元传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文元传/叶永烈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10
(叶永烈纪实文集:6)
ISBN 7-228-06054-7

Ⅰ.姚… Ⅱ.叶… Ⅲ.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270 号

责任编辑 高 兴
封面设计 郭 炜

叶永烈纪实文集

第六卷:姚文元传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383 千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ISBN 7-228-06054-7/I·2214 定价:29.00 元

第一章　“文革”浪潮中的姚蓬子

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我真佩服汉字创字者的巧妙构思，炫耀的“炫”字用“火”与“玄”组成：只有像“火”焰一般光彩“眩”目的东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

一九六六年初冬，他的深蓝色的中山装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灿灿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长条的“为人民服务”语录章。虽说那时候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语录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却是部队发的，惟有现役军人才能每人领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学里，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着大肚子，挺着胸膛，抬着秃顶的脑袋，昂然步入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像章引来人们的“注目礼”。他兴奋不已，飘飘然了。

“姚先生，你的这套像章从哪里来的？”已经不止一个人向他发问。

“我有兵单的！”他得意洋洋地用“绍兴官话”答道，那声音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中充满自豪感、荣誉感、优越感。他所要炫耀的，与其说是那“光焰无际”的像章，倒不如说是这句话。

谁都明白，他的两个孙女儿还不够入伍年龄哩，哪来部队发的像章？他所说的“孙女儿给的”，其实就是“儿子给的”。

他的儿子何许人？众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两个女儿那时寄养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夺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来过上海，把像章送给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个在“中央文革”的儿子！

未过几时，姚蓬子更加神气活现，臂上又多了一件闪射着火红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

他一点也没有觉得，作为大学教师、作家的他，戴着个“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样何等滑稽。他却趾高气扬，招摇过市，惟恐别人没有见到他臂上的红布圈儿——那是“革命”的象征！

可惜，好景不长。那红布圈儿才戴了十几天，他还远远没有戴得过瘾，就“忽”地不见了。

非常遗憾，迄今虽经多方“考证”，尚未能确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总司”收去了呢，还是他吓得不敢戴了？

据推测，多半是因为他吓得不敢再戴了。

他干嘛有点害怕呢？

原来，他的那个“工总司”袖章毕竟太刺目了一点。

才戴了一两天，就有人向“工总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号）解放前是作家书屋的老板，是资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资本家参加造反派不像话，工总司不是统战部！”

也有人确实有那么点“造反”精神，调查了姚蓬子的“入队”问题：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总司”头头，加入工人“造反队”的；

一查，他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

于是，开除了他的“队籍”。至于那红布圈儿，是否当场没收，不得而知。

总之，姚胖子的炫耀品，从两件减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荻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这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捡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这称呼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居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居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居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

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

当她把“胜利”的喜讯告诉儿媳妇——姚文元之妻金英，儿媳妇倒有点着急了。

金英劝她：“居委会的图章拿不得，赶紧送还吧！”

真可惜，在家里藏了三天三夜的“木头疙瘩”，不得不拱手交还给居委会。

她的“夺权”闹剧，不得不匆匆闭幕。

自称“挨鞭子的奴隶”

周修文的“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在里弄里斗争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姚蓬子更带“劲”，以“劲松战斗组”组长的身份，宣称自己是上海师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

虽然他“大舌头”，讲起话来口齿不清，却在中文系资料室门口叫住了从他跟前走过的党员殷海国，像高音喇叭似地吼叫道：

“你们党员都是既得利益者！”

“现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

“拿着鞭子的人，是不会知道挨鞭子的奴隶的痛苦的！”

这位二十年代的诗人，把心底的愤怒喷泄出来，指着党总支委员的鼻子呵斥着。

这还远远难解心头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在“一月革命”的“凯歌”中，上海师院中文系资料室里口号声连绵不断，声震大楼。

墙上挂着大字标语：“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

会议由“劲松战斗组”组长姚蓬子主持。他操一口“绍兴官话”，用洪亮的声音，替那些受屈者伸冤，批斗系党总支的负

责人。

他的开场白富有煽动性：

“中文系党总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为严重！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揭发！”

姚蓬子说罢，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尽管因患气管炎，他已经戒烟，但此时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战斗。须知，往常的学习会，他总是无精打采，就连看电影时也往往会鼾声如雷。然而，如今他的双眸不断闪射着明亮的目光。每当进入斗争高潮，他会抓住时机振臂高呼口号，使会议的“温度”不断上升。

虽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气”，可是，他沉得住气，整整一上午，只替别人“伸冤”，不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气。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举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充当主席。

下午的会议，火药味儿比上午更浓。会议的主题是为姚蓬子“平反”。“劲松”队员们连珠炮似地发问：

“你们为什么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于抄中央文革！”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炮打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犹如粤曲《步步高》似的，批斗会的调门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来，用洪钟般的声音，震得窗玻璃都摇晃：

“我已经写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吁书，题目叫《我要控诉，我要呼吁》。如果不给我平反，我随时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发。

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后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检姚家始末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岁头上动土”！在上海师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人人皆知。当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诉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干的。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一封贴着四分邮票的信寄到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办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上海师范学院　中文系领导　收”。

办事员不敢怠慢，把信送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手中。

信很简单，字体极瞥脚：

“姚蓬子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把手枪藏在屋檐里面，你们快来，我们在弄堂口等你们。”

落款为“几个红小兵”。

事情来得突兀、紧急。

办公室里，几个青年教师传阅着这封信。

“去查一查！”四个青年教师召来四五个大学生，匆匆吃过晚饭，从教师通讯录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发了。

四个青年教师都不过二十来岁，浑身“虎”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带着学生，来到上海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遗憾的是，不像信中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们。

他们闯进了居委会。里弄干部看了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也

认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层楼房，那便是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当年用金条买下的私宅，响起了敲门声。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姚蓬子面前，声言前来“扫四旧”。

姚蓬子脸上出现了惊惶的神色，一双金鱼眼瞪得大大的。

无奈，他只得接受这群年轻人的指挥，“协助”他们“扫四旧”。

年轻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是“扫四旧”，眼睛却盯住屋檐、墙洞、床下、皮箱之类容易藏匿手枪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够乱的。横一本，竖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处是书。

查过一楼。那里是姚蓬子的书房。没有发现枪支，只查到一些属于“四旧”的书。

查过二楼。那里是姚蓬子夫妇的卧室。在箱子里，查到周修文的尖头皮鞋、旗袍之类——这在当时是属于“四旧”。周修文连声喏喏：“该扫‘四旧’！该扫‘四旧’！”

查过三楼。那里本是姚文元夫妇的卧室。当年，姚文元和金英结婚后曾住在那里。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跟老子“划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着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儿。在三楼，年轻人们细细查过屋檐，似乎没有任何藏枪之处。姚蓬子在一旁睁大了眼睛，如同堕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到屋檐之下去“扫四旧”?!

几个小时过去，不见手枪踪影，年轻人们只得作罢。他们把“四旧”物品集中在一楼书房里，关照姚蓬子道：“你自己处理!”

于是，年轻人们双手空空，离开姚家……

这便是抄检姚蓬子家始末。

没有核实，没有证明，光是凭着一封“红小兵”的检举信，就到姚蓬子家“扫四旧”——这在今天听来仿佛如同神话一般，

然而，在当年却确实如此。“破四旧、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轻人们却到他的老子家“破四旧、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于怀。“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借助于儿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没毛”的年轻人有“后台”，是受人指挥去“抄中央文革”的“家”！

非常遗憾的是，那群年轻人“办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严格地讲是“抄检”）之后，随手一丢，把那封“红小兵”的检举信丢了。

这下子，姚蓬子更来劲了，说年轻人们在编造谎言，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检举信”，完全是对他进行“政治陷害”！

虽然，将近十来个年轻人，还有那位系党总支书记和里弄干部，都证明看过“红小兵”的检举信，都说信是确实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说这些人都在那里“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扬扬，一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

就在“劲松”和另一个战斗队召开“中文系教工平反大会”的翌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党总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门上，贴上一张红纸，醒目地写下三个字：道歉书！

姚蓬子双臂交叉在胸前，在道歉书前嘟囔道：“哼，连锣鼓都不敲，算什么‘平反’？人家贴红纸头，都是敲锣打鼓的！”

“劲松”战斗队终于解散

自从“平反大会”旗开得胜，“劲松”战斗队军威大振。姚蓬子益发趾高气扬，动不动斥责党员干部是“特务”、“狗腿子”、“国民党”。

“劲松”战斗队的油印机也哗啦啦地印得欢，传单的印数与日俱增。前来索取传单的，交换传单的，门庭若市，其盛况不亚

于当年作家书屋的门市部。

就在“劲松”们“劲”头十足的时候，忽然，一张大字报贴上门来，如当头一棒。

其实，那张大字报写得挺简单，而且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攻击“劲松”战斗队。

那张大字报只不过全文抄录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总共六条，人称“公安六条”。大字报在“公安六条”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条’的，不许参加革命群众组织！”

贴在“劲松”战斗队的门上，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劲松”战斗队沉默着，队员们双眉紧皱，躲在小房间里一筹莫展。

队长姚蓬子用双手托着下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宣布退出‘劲松’战斗队！”终于，一位头发灰白的队员打破了沉默。他说罢，站了起来，走出了“劲松”战斗队。

“我退出‘劲松’战斗队！”

“我也退出‘劲松’战斗队！”

又有两名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边走去。

宣布自动退出“劲松”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队长的双眉紧紧地拧在一起，拉住队员道：“就这么一张大字报，‘劲松’就散伙，太丢脸了吧！”

可是，队员们各怀心腹事，掂量着门上那张大字报的分量。

一九六七年三月，“劲松”战斗队终于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脸沮丧，一蹶不振，再也没“劲”了。

没几天，他交来一张病假单，从此躲进小屋，不再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特别是当他听说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成立了“姚蓬子专案

组”，便战战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细有朝一日被用大字报公布出来。

他常常做恶梦，梦见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重演一九五五年那触目惊心的一幕……

然而，当他醒来，看见玻璃板下那张儿子一身戎装、巍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实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他不住地用这句话，安慰着自己空虚、惶恐的灵魂。

审查姚蓬子惊动了江青

说实在的，在上海师范学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细的人，并不多。

认真点讲，姚蓬子并非上海师范学院的正式职工，他只是那里中文系的兼课教师而已，主讲中国小说史，中文系每月发给他一百元。“文革”开始以后，“停课闹革命”，上海师院也就不给他发工资了。他不属于上海师院教师编制之内，没有“教授”头衔，连“讲师”职称也没有。上海师院没有姚蓬子的档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说是个无职无业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他本是作家书屋老板。如果说，他有什么工作单位的话，那就是作家书屋。自从作家书屋在新中国成立后关闭之后，他就靠定息和存款过日子。也写点文章，译点书，不过很难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

自从一九六三年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课以来，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资收入。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那里并不过问他的政治情况，也没有审查过他的历史——因为他不在那里的编制之内。

姚蓬子引起上海师院红卫兵的注意，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那时候，上海师院五个群众组织——“红师院公社”、“千钧棒”、“东方红联络站”、“红卫战斗队”、“二二〇起义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专家线，审查上海师院一个老教师的三十年代历史问题。

红卫兵们来到离上海师范学院只有几站路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那里收藏着大批三十年代旧报刊。

物理系的一个女红卫兵埋头查阅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一页又一页，细细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她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上，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的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拍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了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

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此与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家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姚蓬子专案组在上海建国西路的办公室要单独，不准与其他三十年代专案组交流材料”；

“有关姚蓬子问题的材料不准外泄，一律交市专案办公室”；

“通知上海师院革委会，不准任何群众组织成立姚蓬子专案组，不准批斗”；

“不准上海师院、上海作协的组织组接待外调人员直接找姚蓬子谈话，调查提纲要经市专案办公室审批后方能叫姚蓬子写证明材料”；

“对通过姚蓬子了解情况的单位人员要注意，要详细登记，严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发现问题要马上报告市专案办公室处理”；

“对姚蓬子的审查不能像其他专案对象那样搞，不能搞隔离，让他在家里，用不着到学校去”；

“专案组要与姚蓬子家所在的里弄党组织联系，要他们做好对姚蓬子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有人问姚蓬子家住在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

“专案组对姚蓬子的问题作些外调，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问题，但目的不是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过他了解三十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一些情况”……

如此这般，专案组对姚蓬子实行的保护，是最清楚不过的。专案组成立之际，一位“领导”便定下了调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有谁能定他的案?”

就是这么个“专案组”，江青也还摇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姚蓬子专案组”接到王少庸的“四点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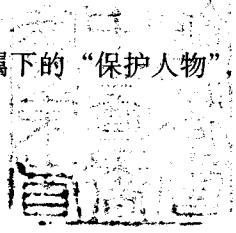
“一，姚蓬子专案组不搞了，专案组人员解散。

“二，调查材料集中，登记造册，上缴市专案办公室。

“三，不准对姚蓬子搞批斗。如一定要搞，必须打报告，经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调。如一定要了解，须经中央文革批准。”

好家伙，姚蓬子从此成为“中央文革”属下的“保护人物”，谁也不能碰，谁也不能查。



2228068

姚蓬子专案材料到哪里去了呢?

王承龙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张春桥，锁入保险箱。

逍遥，安乐，从此姚蓬子躲在小楼里，万事大吉……

审查者受到反审查

乐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专案组”成员们。

当“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到来的时候，“姚蓬子专案组”的成员们成了“审查对象”。这叫做“反审查”!

罪名是明摆着的：“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扩散‘防扩散材料’”……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连上海师院中文系几位研究鲁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对象，因为鲁迅著作中多处提及姚蓬子，他们曾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过研究。不料，那也被视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幸鲁迅先生早亡。倘若鲁迅先生健在，势必会被拖到隔离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之累累大罪!

下面摘录“姚蓬子专案组”组员之一沈震璐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写的揭发材料，足见当年的“反审查”何等酷烈:

>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个红卫兵。因为我参加过姚蓬子专案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务罪行，“四人帮”竟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
> 我原是上海师院中文系六七届毕业生，于一九六八年分配到解放军六三四一部队所属的泰州红旗农场劳动锻炼。原已宣布一九七〇年二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体学生留农场参加“一打三反”运

动。于是，二月下旬，上海师院派来的郁某、周某，宣布经市委、师院批准，对我进行审查。从此我受到了三个月的隔离审查，以后又监视审查两个月。七月中旬，宣布回上海工作并继续接受审查。一九七一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审查。

在农场五个月的审查过程中，上海来人对我进行了逼供、套供、诱供，手段极其卑劣，从精神上对我进行极大的摧残。他们一再逼问我，为什么参加姚蓬子专案组？是谁指使我参加的？把材料扩散给谁了？为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提供过什么材料？在审姚过程中搞过哪些其他活动？妄想逼我承认参加专案组是为了要搜集姚文元的材料。他们骗我，说我接触的几位红卫兵负责人有的已经畏罪自杀了，有的已经被捕，有的已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说我是红革会头头、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后来回上海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受到审查）。又威胁我，再不按他们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论处。因为涉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累及父亲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谈自己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了。

每天从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里，几个人不停息地对我搞车轮大战，轮番训斥，逼写材料。要我把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参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审查前的一切行动回忆出来。晚上最多只能睡着三四个小时。他们还常常指着外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要我想想还要不要自由。每隔一个多星期，连里就要组织一次对我的批判会。……

由于他们长时间的摧残，在第三个月我病了，风湿性关节炎发得很厉害，又出现了严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疗，要求给点安眠药，

使大脑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来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阴谋为借口，不予治疗。后因我精神确已陷入紧张、恐怖状态，双眼日夜不能闭合，学生中的卫生员李婷婷不忍看着我变成精神病，向他们提出由她担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镇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疗。我幸好没有变成精神病，但记忆力丧失了，甚至连前两个月中自己回答的问题与写过的材料也记不起来了。所谓的专案组这才被迫暂时不隔离我，但仍不许与任何同学接触讲话。那时，同学韩晓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饭，就趁我不在时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价的香脆饼，竟被连夜召开全连批判大会，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这个同学连夜出走，经过同学们四出找寻，半夜才从荒野的河畔找回来，没有造成不幸……

对我的审查，前后竟进行了三年半……

这就是“反审查”——审查者受审查！

诚然，沈震璐等还算是“市革会专案组”成员，命运尚且如此。至于原先红卫兵们成立的那个“姚蓬子专案组”，更是遭到了严厉的“反审查”。

一手遮天，销毁“防扩散”材料

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头上长了几处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扩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对于姚蓬子来说，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如同头上的癞疤。对于成了“中央首长”的姚文元来说，父亲的癞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本来，父是父，子是子。父亲的癞疤，与儿子何干？偏偏在“文革”中，流行“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红卫兵们叫得震天响的口号。显然，照此推理，姚蓬子反动，姚文元混蛋了。于是，姚文元千方百计要为父亲遮丑——其实，也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中央首长”的“光辉形象”。

上海人笑称：江青的“蓝苹”，张春桥的“狄克”，姚文元的“蓬子”，是三块揭不得的癞疤！江、张、姚这伙“上海帮”的三块癞疤，都与上海滩紧紧相连。

江、张、姚既成一帮，也就互遮“癞疤”。为了包庇姚蓬子，江青下过“指示”，张春桥写过“批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出过力气。

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上午九点十五分，上海师院的武保组里火光闪耀。有人清点，有人监视，有人点火，一举烧毁了九份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这是遵照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亦即“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头目徐海涛的“指示”办理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又是一把火，烧毁了关于姚蓬子的“防扩散材料”七十份。

原上海师大清队复查人员何家余，曾这样谈及销毁姚蓬子“防扩散材料”的经过：

> 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五校合并前不久，原师院工宣队政委张某某送来一张已销毁的材料清单，是双线格纸一张，最后有张某某和军宣队负责人刘某某的签名。销毁的是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对象审查材料中剪下来的涉及姚蓬子的材料。通过原清队办公室负责人洪某某告诉我们，在清队复查中也要注意把涉及到姚蓬

子的材料，都要剪下来。说这些材料虽不属“防扩散”，但“不宜扩散”，“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并说，这是一办徐海涛来师院时个别作的“指示”。在清队复查中也照小组办理。在一九七五年清队复查告一段落，我离开武保组时，由洪某某主持销毁了第二批。包庇姚蓬子，就是为了包庇姚文元。

在这两批销毁的“防扩散材料”中，有姚蓬子在“文革”中写的检查，大字报底稿，也有别人揭发姚蓬子的材料。此外，在别人的交代、检查中，凡涉及姚蓬子的，也一概销毁。

于是，在上海师院，再也没有“整”姚蓬子的“黑材料”了。

我追寻着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的材料。

一纸公文，道明了这批材料的去向。那公文上方，印着一行鲜红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文的右下方，盖着这个委员会的红色大印。

公文全文如下：

春桥同志：

十一月九日静安区公检法军管组，送来有关姚蓬子的材料一袋共两本。现送上请查收。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公文的右上方，写着张春桥的亲笔“批示”：“何秀文同志

存，勿扩散。 春桥 十一月十日。”何秀文，即张春桥秘书。张春桥在收到这一袋姚蓬子材料之后，迅即“批示”“勿扩散”，何秀文遵嘱把材料锁进了保险箱。

如今，这锁进保险箱的姚蓬子专案材料，又到哪里去了呢？

甚费周折，在一个重要的档案部门，我总算在一堆“文革”的“核心”材料中，找到牛皮纸封皮的卷宗，上面有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姚蓬子专案”字样。打开一看，却是个空心汤圆，里面放着的，只是几份销毁姚蓬子专案材料的请示报告、销毁材料目录、销毁经办人的签名之类。卷宗中原有的数十份外调材料以及姚蓬子写的自传，全部销毁！

其中的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市委：

最近，我室十四组在清理防扩散材料过程中，发现一份姚蓬子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写的材料。这份材料是这样形成的：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红卫兵小将配合刘少文（引者注：刘少文在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专案组调查刘少文历史问题过程中，通过姚蓬子了介（解）刘少文的有关方面问题，做了笔录，姚蓬子亲手写了这份材料（详见附件）。现请示这份材料如何处理。

附：材料共拾壹页。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

天头上，写着“绝密”、“急”字样。姚蓬子在一九六七年写的一份材料，到了一九七三年有什么可“急”的呢？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也确实“急”。就在翌日——五月十六日，王少庸便在这一请示报告上“批示”道：“天水、景贤、秀珍同志，此件拟销毁，妥否？是否需报洪文同志并请阅示？”

按照当年的习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分别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圈，这叫“圈阅”。一旦“圈阅”了，也就表示同意。

于是，姚蓬子亲笔所写的长达十一页的材料，被销毁了。

又一份请示报告如下：

关于处理姚蓬子有关材料的请示报告

市委：

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在结束专案审查时曾将姚蓬子的有关材料移交给我室文艺专案组（即当时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最近该组在全面清理专案材料时，对这部分材料提出要求处理，鉴于去年我室十四组清理出有关姚的材料已报请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销毁，因此对这批材料，我们意见也予以销毁。

当否，请审批。

（附材料目录一份）

（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六日

王少庸于七月二十八日作了“批示”：“拟同意。请天水、秀珍同志阅报。”

在马天水、王秀珍画了圈圈之后，这批总共三十二份、一百

零八页的重要材料，付之一炬。

这批重要材料中，包括姚蓬子在“文革”中所写的三份交代、周修文写的一份材料，此外还有知道姚蓬子三十年代情况的文艺界人士和原国民党中统特务写的材料。特别是姚蓬子所写《我所知道的叛徒》，长达二十二页，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自己叛变的经过，被化为一团纸灰！

我来到姚蓬子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因为户口档案上有着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被公安部逮捕的记录，竟然也被抽走、销毁！本来，按照公安部门的规定，户籍资料是永久保存的档案。姚文元凭借手中的权力，生怕父亲被捕那一行记录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就来了个销毁！

最令人震惊的是，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那里保存的姚蓬子档案，即《沪公侦二叁［1954］第7315》和《沪公侦二秘［1955］第38140》，只剩下档案卡片，而档案不知去向……须知，这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公安局审查姚蓬子时的档案材料，居然也因属“防扩散材料”而被抽走……

然而，火焰只能吞没档案，无法改变历史。每一个人留在历史上的足迹，如铁铸刀刻一般，无法任意涂抹。

何况众多的历史见证人犹在，何况当年的公安办案人员犹在，何况印在《中央日报》上的《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犹在，更何况姚文元无法一手遮天——他可以在上海为所欲为，尚不能把手伸进公安部，公安部档案室所保存的姚蓬子的档案犹在，姚蓬子在一九五五年写下的《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仍然完好无缺地锁在那里的档案柜里。

姚蓬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第二章　曾经是左翼作家

本是阔少爷

或者像我一样/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二十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来自他的另一个名字“蓬生”。

他的本名叫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字“裸人”。他又名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笔者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前往姚公埠作实地采访。据说，当年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绝代佳人西施的故乡，人称“浙东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二二二年）置县。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这里原本水路四通八达，有了公路之后，交通更加便利。特别是浙赣铁路建成后，贯穿诸暨全境。诸暨盛产大米、黄金、茶叶。一九八九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热闹庆祝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内中军人多，文人多，科学家多，商人少。就以本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

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为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做"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像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笔者在诸暨档案馆见到《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内中记载着姚文元的家谱。那里的姚家宗祠，则是清朝光绪年间重立的，写着对联："红霞晚映，鸢飞鱼跃。"

在姚公埠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像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扩建为上下各为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讳志纯，乃姚蓬子之父、姚文元的祖父，有田一百二十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姚西曜的曾祖父姚杏生、

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笔者注意到姚克先生一篇遗作，题为《“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内中涉及姚文元的祖父。姚克先生是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剧。在“文革”中，《清宫秘史》曾受到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的猛烈“批判”，成为“炮打”刘少奇的一颗重磅炮弹。

姚克晚年客居美国。一九七六年底，他在美国加州会晤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维克多女士，谈起江青，也谈到姚文元。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写成《“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此文在姚克去世后，于一九九六年发表于第十二期《上海滩》杂志。

姚克写道：

>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说他的祖父姚汉章，多年前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我这才发现，我当年认识的左翼作家姚蓬子原来是姚汉章的儿子。
>
> ……
>
> 姚汉章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在我同辈份的弟兄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中举之后科举就废了。他因为是个举人，特别受亲属的重视，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还记得他，别的从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和姚蓬子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互相展问邦族；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是我从堂哥哥的儿子，他也绝对想不到我会是他父亲的从堂弟弟，因为我是先父晚年的儿子，年纪和姚汉章相差至少二十岁上下，而且我说话带一点苏州口音，更不像是他们的本家，如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长久一点，彼此也许会发现出亲属关系来。可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劝告，后来我就和姚蓬子疏远了。若不是最近报纸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父子是我

的本家亲属。

民国初年间，姚汉章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当年中华版的教科书，有不少都出于他的手笔，六十岁以上年纪的人也许曾经读过。

很遗憾，姚克先生没有注明他所见到的那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究竟发表于什么报刊，作者是谁，文章的篇名叫什么。

笔者在浙江诸暨档案馆查阅了《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并复印了姚文元的父亲、祖父那一页，没有见到姚文元的祖父叫姚汉章的记载，只查到他的祖父“名西曜，讳志纯”。姚西曜是否另有名字叫汉章？尚待进一步查证。

就连姚克本人在《“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中，对此也有所怀疑：因为姚汉章之父讳文俊，姚文元倘若是姚汉章之孙，不可能是“文”字辈——岂有曾祖父与曾孙同辈之理？

姚克写道：“姚汉章是个旧社会的人，当然不会替孙儿取一个与自己父亲犯忌讳的名字，姚蓬子虽然曾一度做过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糊涂得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花轿从二十里外盛兆坞抬来，从此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翻译”成公历，也就是一九〇六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又叫蓬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姚张氏却一声不吭，如同鼓槌敲打在丝棉被上一般。姚张氏

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实秋先生于一九七四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从北平逃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做事。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绍兴上中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远走高飞，考入了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十八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伫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变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像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冢，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他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惟此街于他最宜。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来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嶒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

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蓬子西装结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闪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坡、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

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彷徨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颓废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白。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像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悒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泣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迸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像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饿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缘故，他喜爱法国

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碗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像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么，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像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
……
……
……
……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蒂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蓬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徜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二五年的一个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路，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

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像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C——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

半年后，“下部编辑”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了很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他是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C”，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蓬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了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碟躞》、《悼——》、《寄 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 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

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

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闪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 Nietschz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 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

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 Pierre Charron 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 Базаров）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间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

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是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家（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孚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〇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

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像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以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

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

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〇年二月付排，一九三〇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

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 Len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 N.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 Poman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的必要。
>
>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璧，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珂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
>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网络，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
> 一九三一年六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本是活泼、开朗的，由于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脸上几乎没有笑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姚蓬子轻声地商量着。每一次，总是她点了头，姚蓬子去办。看得出，她决断迅速，说一不二，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

这位湖南少妇，便是蒋冰之，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南的显宦门第，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她的中学同学杨开慧，便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丈夫胡也频，是颇负盛名的青年作家；她从二十三岁时以笔名丁玲发表作品，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了文坛……

一九三〇年五月，她和胡也频从济南来上海，潘汉年和姚蓬子便去看望他们。由潘汉年和姚蓬子介绍，丁玲和胡也频双双参加“左联”。十一月初，在“左联”会议上，胡也频当选为代表，准备前往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胡也频去上海东方旅社接头之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二月七日，上海龙华响起一阵枪声，胡也频倒在血泊之中。丁玲陷入痛苦的深渊。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抑制住心灵的巨创。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在上海兆丰公园秘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她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是工作！”

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她出任《北斗》文艺月刊主

编。丁玲在上海文坛上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当然是主编的合适人选。

毕竟孤掌难鸣，何况那时的丁玲尚未入党。于是，冯雪峰和潘汉年给她调来两名助手，一个便是姚蓬子，负责跑印刷厂，也担任一部分编辑事务；另一个是“左联”作家沈起予，懂日文，负责编辑译稿。这“三驾马车”，便成为创办“左联”刊物《北斗》的“开国元勋”。

丁玲在她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这样述及《北斗》的创刊以及她与姚蓬子的合作：

> 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即英文“突击队”译音）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我提出来一个人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由姚蓬子和沈起予（引者注：沈起予，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九三〇年，卒于一九七〇年，现代作家、翻译家。一九二〇年到日本求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一九二九年再度去日本。一九三〇年初回国，参加左联）协助我，由我出面负责。我负责联系作家，看稿子；姚蓬子负责跑印刷所，也担任部分编辑事务工作；沈起予懂日文，他就管翻译……

就这样，姚蓬子与丁玲共事，一起致力于创办“左联”的重

要刊物《北斗》。

一九三一年，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日———九月二十日，一份崭新的大型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书报摊。那淡黄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黑色的天体图，标明着北极星和北斗，上方印着两个黑色刊名大字《北斗》。

二十五岁的姚蓬子非常活跃，不光是热心于跑印刷厂、编稿子，而且居然也写起小说来。《北斗》创刊号就刊载了姚蓬子的短篇小说《一幅剪影》：

> 和一个美丽的女人挽着手，拖着自己底怪长大的影子，穿过了一条小小的潮湿的狭巷，弯到霞飞路上了。夜色是那样好，从马路两边的绿油油的长青树上飘下来的风，拂去了行路人面上的热气，汗，疲倦，以及一切热天里担当不住的天气的压逼，拿凉快掷进你心窝里，使你感到舒服。举首看看天上的星星，正象挨在身边的那女人底微笑的眼睛，颗颗都象漾在水里面，没有一点泥垢，没有一颗不干净，不晶莹。云象深蓝色的天鹅绒，软软的，软软的，铺遍了这无边涯的天。是这样甜美的初夏夜！是这样醉人的夜色！白日的辛苦和疲劳，此刻已飞出了他底肢体，越过了马路上的整齐的列树底软语的枝梢，越过了瘦长的电线木，越过了高高矮矮的砖瓦的屋脊，象一缕柔软的青烟，象一轮淡淡地荡开去的水晕，消失在夜底苍茫里，消失在繁多灯光与人影里了……仅有一种说不出的非忧郁也非甜蜜的东西塞满他底心；一只嫩软的白净的手儿握住他粗黑的手；一阵醉人的脂粉的浓香刺进他的鼻管里……

大抵原先写诗的缘故，他的小说散发着诗的气息。在这篇小

说中，他写了一个“在无可奈何之中想拿英雄的梦想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底女性”。

在《北斗》一卷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版）上，发表了蓬子的短篇小说《一侍女》：

> 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跟着风，卷动着挑在店铺子底檐角上长幡似的市招，影子投射在马路上，被那些闲行在街上的人们践踏着。红红绿绿的电灯晃耀在沿街两边的店屋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内的商品更显出了它们底立体形。毛绒衫，项圈，秋大氅等等，从已经被遗忘的箱子里重新披到人们身上，在黄昏的街头斗着风。在街上消度着夜晚的人们，仿佛全是安闲的，幸福的，无所事事的。
>
> 他们有的进了影戏院，有的进了咖啡馆，有的在绸缎铺里剪裁秋衣……挤在这些人们中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咖啡店的侍女而现在已在贫病交逼中失业了三个月的年青的姑娘，紫英。
>
> 过去她曾经有过光荣的日子，是给过了一些男人梦想的。在她底苹果似的圆润的腮颊上，曾经有人以偷取了一个吻算作伟大的胜利的事情也曾有过，但自从花园咖啡（馆）倒闭后，她底光荣已经离开她，腮颊上的苹果也仿佛萎烂了……

姚蓬子躲在亭子间里写上海。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短篇小说。他写弱女子，写“空虚底女性”，写旧上海的畸形，写十里洋场的暗角。他的作品，仿佛用小小的酒盅，盛着淡淡的哀愁。

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北斗》一卷四期上，蓬子的短篇小说《白旗交响曲（一段暴风雨时代里的插话）》，篇末

注明“十二月初，于上海”。这篇小说与以往不同，写了上海“宝山路上的血”；写了“一簇簇预备出发至南京请愿的学生们”；写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国难临头的时节，我们无论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这一步”：

> 教育局长，公安局长和党部委员等，带了雄赳赳的武装兵士，乘了汽车上车站来劝阻学生进京请愿，叫了学生代表去听训话。他们的意思，以为学生进京请愿，不仅会耗费时间，精神，于事实没有丝毫的帮助，同时学业上的损失亦甚巨，甚大，社会的秩序和安宁也会受到影响。……
>
> 不耐烦地等待着列车，一面又想到白天教育局长他们那一番训话，于是在郑华心里又掀起了一些气愤的，又好笑的感想。是的，连你们也说，这是国难临头的时候了，那末还教我们回去努力读书，这用意到底在哪里呢？如其说，外交你们自有办法，但事实摆在我们眼前，不仅东北的劳苦民众早已水深火热的被践踏在铁蹄下面了，同时日本的刽子手还在到处继续屠杀，日本的军队还在继续向关内开动，预备在华北暴动，日本的兵舰也不断的开到长江上来示威，而你们，除了教民众坐以待毙的镇静之外，又还有半点准备反抗的表示吗？……啊啊，民众是不会再上镇静论的冤枉当的，为要解除他们自己的桎梏，为要避免奴隶的悲惨的命运，他们已经自己起来直接行动了！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篇《白旗交响曲》就艺术性来说，显得粗糙，却迅速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突然进攻沈阳，

炮轰北大营，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国的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上万学生涌向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目击着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烧，姚蓬子感到激动不已。他拿起了笔，在几天之内写出这篇《白旗交响曲》。他不再那样缠绵悱恻，他变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响曲》写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带血的刺刀而发生的一段插曲，使“左联”同仁对姚蓬子留下一个疑问。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见《丁玲文集》第五卷），记载了姚蓬子这段小插曲。

> “九一八”以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过游行示威，左联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这次游行，由楼适夷和杨骚打旗子（引者注：还有张天翼打旗子）。开群众大会时本来内定由沈起予讲演。但特务包围了会场，沈不敢上台，没有法，冯雪峰跑上台去讲演。他本来是不应该暴露的，事后同志们对他这种赤膊上阵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大会开得很有声势。会后，游行队伍包围了张群的房子。我们派人进去谈判。反动军警在墙上架起机枪，并向游行队伍开枪。等逃散的群众再度集合起来，左联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姚蓬子……

姚蓬子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后来，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词，回避了人们的追问。

小插曲很快被人们遗忘，但是这小小的插曲却是一个征兆……

一九三二年，在《北斗》二卷一期举行《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时，发表意见的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张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蓬子。

蓬子的意见如下：

> 中国近来文艺创作果然不振么？不是的。我认为它开始从知识分子的书案移转到大众的眼下了。
>
> 近来广大的反帝剧本的产生，街头剧团的开始活动，大众文艺的逐渐增多，工场壁报的普遍建立，这些，不都是新兴文学的萌芽么？自然，我们至今还没有真正成熟的大众文艺的产生，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
>
> 因此，一个文学必须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到工厂、到农村、到街头，去生活大众的生活，这是为要产生真正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文学的正确的路径。
>
> 同时，我们必须从大众中间，尤其是劳动者中间，培养工农出身的新作家。扩大工农通信员运动已成为文学界当前第一个急迫的任务。

《北斗》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认为一九三一年我国文坛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这个新生的婴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勉强出版了二卷三、四期合刊之后，被迫停刊了。

鲁迅写诗《赠蓬子》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付排，居然在三月十八日就出书了。姚蓬子的中篇小说《浮世画》交给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

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作为第二十九种，飞快地印行了。

小小的六十四开本，定价一角，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这是姚蓬子小说的第一个单行本。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姚蓬子的《浮世画》，画的依旧是上海滩的世俗之情，桃花之运：

> 谁曾想到呢？一个穷教授会和大学校里的一个皇后要好起来。一个是被绅士公子们捧成了金丝雀，红鲤鱼，画眉鸟的摩登女郎，而另一个却是只在私立宏德大学担任了几点钟西洋文学史和西洋哲学史的穷教授。所以在他们最初认识了之后，西音和她通信的消息传到了朋友们耳中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一个熟人不背了面讲他笑话，见了面又寻他开心的。
>
> “老西，听说你新近交了桃花运，真的吗？”一个熟人笑着问。
>
> “老西，看你不出有这一手大本领，连王小姐都会和你讲起爱情来？”另一个熟人狡猾地拍拍他底肩膀。
>
> “朋友，不要寻开心，好吗？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你们不要无中生有的造出风浪吧。”窘笑着回答了朋友们。
>
> 对的，这是句真话，对于这女人，至少西音是不曾发生过野心或幻想的。一，他不是小白脸，没有一个擦满了雪花粉的小旦似的面孔；二，他不会吹牛，没有当着女人面前将她捧上云雾里去的勇气；三，他没有钱。拿教书的钱是只够维持个人生活也还不是顶宽容的，有什么剩余可供一个摩登女郎底挥霍呢？自己底够不上追求女人的资格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要挤进那些体面的绅士们和豪贵的公子们中间去当一名蕙如底候选人，那是

他认识蕙如之后所不曾梦到，不敢梦到，同时也不必梦到的。

正如他自己告白给朋友们，他们底关系只不过随便通通信的一回事。在一个朋友的筵席上认识了蕙如，觉得很媚人，后来就借了一个原因写信给她了。信发出之后心中不无后悔的，不是怕她没有回信，而是怕她当作一个笑话传开去。但出乎意外的不到二天回信居然寄来了，虽是短短的几句平淡的客套话，但仿佛也很尊重自己的，希望自己时常有信寄给她。

西音是被一种单调的寂寞的生活追随着，到如今已有五年了。挟着皮包，从家内搭车到学校，念一些连自己也觉得无意义的讲义，于是又回到家中，在几架旧书中间坐下来，看几本哲学书，或者躺在床上驰骋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到如今已有五年了。

现在，有一个女人能够接受他底信，同时也有回信给他，这不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吗……

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就这样开始展开故事。

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小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姚蓬子抱着自己一岁的儿子，前去看望鲁迅。

他的独生子便是姚文元，生于一九三一年。他用曾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给儿子取名，即“文中魁元”之意。

他去看望鲁迅，一是请鲁迅为他的新作《浮世画》写点评论，二是请鲁迅为他题几个字，三是让自己的儿子见识见识中国当代的大作家——虽然儿子才一岁。

姚蓬子的三个目的，达到了两个：

最容易达到的，当然是让儿子见到鲁迅。后来，当儿子在中

国文坛上崭露头角时，他就不无自豪地说："我一岁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最难达到的是，当然是请鲁迅为《浮世画》写评论。鲁迅收下了姚蓬子送的新作，说道："我先看看。"自然，此后鲁迅没有为《浮世画》写过任何评论，表明他以为不值一评。

既不算容易，也不算太难的，是请鲁迅题字。

鲁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给你题一首诗吧！"

姚蓬子喜出望外，瞪大了眼睛，看着鲁迅提起了毛笔。

顷刻之间，鲁迅走笔如飞，写下了一首风趣的小诗：

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当晚，鲁迅在日记中记述道："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

关于这首《赠蓬子》的释义，颇多争议。诗是最为简练的艺术。惟其简练，往往多义。《赠蓬子》的解释，大抵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按照《赠蓬子》一诗直释，"飞仙"指蓬子（因为蓬子乃"蓬瀛之子"），"灵童"指姚文元。意思是说，蓬子仿佛从天而降，坐着两辆驾云的车子，带着儿子来临，可怜你蓬子并非天子，只不过是逃来逃去喝西北风罢了。

其二，周振甫著《鲁迅诗歌注》，一九八〇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注释中认为：

诗中所说的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找寻丈夫的事情。天子：穆天子，《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故事。这里指穆木天，言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只好逃去逃来喝西北风了……

因为穆木天的妻子到姚蓬子家去找丈夫，所以说：“可怜蓬子非天子”，即可怜姚蓬子不是穆天子。用“天子”来代“穆木天”，因为“穆木天”跟“穆天子”中有两个字相同。又据《唐六典》，称宫廷内阁中的秘书阁叫“木天”，即指天子的秘书阁，所以用“穆天子”来“穆木天”，否则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又这首诗写的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当时住在战区的人都在逃难，穆木天的妻子也在逃难，所以说“逃来逃去”。穆木天的妻子在逃难时找不到丈夫，生活没有着落，姚蓬子不能照顾她，所以只好喝西北风了。这首诗不是写三月三十一日的事，是追溯“一二八”事变时的事。到三月三十一日，战事早已平息，鲁迅也从“一二八”时逃难出来，于三月十九日搬回家去，已经没有“逃来逃去”的事，对姚蓬子来说，也没有“吸北风”的事。再说《穆天子传》记穆天子去见仙人西王母，所以联系到“飞仙”，“灵童”就是仙童，正从“飞仙”来的。倘若就姚蓬子讲，那就不能称“飞仙”，也无所谓“灵童”了。又一月二十八日正在冬天吹北风的时候，故说“吸北风”也符合时令，到三月三十一日，已是吹江风的春天，和“吸北风”也不合了。

这里提到的穆木天（一九〇〇——一九七一），也是“左联”成员，诗人、翻译家。周振甫的依据是：“这首诗的本意，是许

广平在抗战时期对人讲的，她是当时的见证人，所以她的解释是有权威性的，正确的。”

当然，持第一种释义的，其实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姚蓬子还是“左联”执委、共产党员，而姚文元不过乳臭未干的稚童，鲁迅戏称之为“灵童”，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至于三十几年之后姚文元成为“中央首长”，借此自吹，那与鲁迅何干？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笔者在北京访楼适夷先生时，他谈及对于这首诗的解释——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

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

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蓬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

“‘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而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三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蓬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

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北斗》消失了。

不久，一份厚厚的新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上海的书摊上。

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文学月报》。

每一期《文学月报》上，都印着《编后记》，署名蓬子——他是“左联”的这份新刊物的主编。《文学月报》由光华书局发行。

姚主编显示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一连串名作家的作品出现在《文学月报》上：茅盾、巴金、田汉、丁玲、叶圣陶、张天翼、冰莹、艾芜、楼适夷……其中特别是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闷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

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像怒吼的狮子，吼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抽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
的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谈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在担任《文学月报》主编的那些日子里，姚蓬子既要组稿、改稿、编稿，又要自己写稿，还要跑印刷厂，忙得不亦乐乎。

《文学月报》也支持不了多久。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第一期，到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五、六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一九三一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笔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

> 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

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关于特科，夏衍写道："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三十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周恩来亲自决定潘汉年"改行"。

那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瞿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救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一九三一年三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二十五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一九三二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第三章　蓬子转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一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三月二十八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五月十三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七月十四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三卷第八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五十三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线索）、吉鸿昌（线索）、杨铨（后林）、鲁迅（后林）、茅盾（后林）、胡愈之（后林）、田汉（后林）、王造时（后林）等。这份“钩命单”一公布，舆论大哗。

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本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二百五十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

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一个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二十七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涡——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蓬子小一岁，广东潮洲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蓬子在上海相识。一九三〇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南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

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诌诌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恩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瞿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一九三二年九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一九三八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肉，像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诌诌的，笑嘻嘻的。他的话，像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姚先生，你是诗人，你是作家，我拜读过你的许多大作。才华横溢，令人敬佩。"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像姚先生

这样的文人，干嘛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恩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自问：连李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

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邨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唏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

“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引者注：即指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后来，姚克回忆道：“至于姚蓬子，我到一九三三年方才认识。他那时也算是个左倾作家。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世背景，轻易告诉别人，别人也不便多问。我对蓬子当然也不例外。和他谈话时，只听出他似乎有杭州嘉兴的口音，其他就不知道了。鲁迅先生不喜欢他的作风，觉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经劝我少跟他来往。鲁迅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贵同宗’就是指姚蓬子而言。由此可见，鲁迅对姚蓬子

是深恶而痛绝之。”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了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富有远见：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提出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睥睨的冷眼……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

楼适夷迄今还清楚地记得：

一九三四年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忽然响起监狱长嘹亮的声音：“全体肃静，全体肃静……”

两边是铁囚笼，并押着一个个“共党分子”，监狱长站在囚

① 姚克：《“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上海滩》一九九六年十二期。

笼间的“弄堂”里，发表训话：

“姚蓬子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前些天，他关押在这里，你们也是看到的。现在，你们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呢？因为他幡然醒悟了，与共党决裂了。他的悔过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还将委以重任。他是你们的楷模！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像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明：

> 姚蓬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产党经历如次。
>
>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〇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后任组用（引者注：系“组织”之误）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

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至（引者注：系“驻”之误）河北的交通。四年来历任《萌芽》、《巴尔底山》（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〇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和黎明、衰者和少壮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避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废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气氛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激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进，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恼，于是开始在愤激的热情下，转换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展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〇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

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个人（引者注："个人"系"一个"之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脱）离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虽然我竭力严厉的裁制（引者注：即"制裁"）着自己，认为是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而加以诅咒仇视，可是我无法绝灭这一厌倦的细菌的滋长。

现在是我结束过去的生活，开始未来新生的时候。从改换政治立场的长久的反省中，我发现并理性的确定这一厌倦的来源，不是我过去政治的不坚定，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因此作为共产党的组织细胞的共产党员，只要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必然会涌起一种虽说是说不出的茫然的，可是无限痛苦的苦闷。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

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败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〇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飙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间，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

不遭到可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的（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

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对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仅仅“声明”一下自己从此脱离共产党，从此“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而是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广大人民，尤其是“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他谈得振振有词，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报》的社论更能蛊惑人心。因为他曾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共党要员”，如今在“郑重的考虑之后”，说出这番“宣言”，要广大青年“引以为戒”。

一纸“宣言”，成为姚蓬子的卖身契，成为他的人生道路上

红与黑的分界碑、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他有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但他确实属于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变之后，他成了可耻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文坛为之惊心，左翼作家们为之切齿。

如鲁迅所言：

“因为终极的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渣，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

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

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

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

“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

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

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隔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一百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

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

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姚蓬子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

于是，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一卷三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

出“姚蓬子”三字：

>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
>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五月十三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

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

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记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在那里是诗人戴望舒介绍她结织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记得，一九三〇年五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 ……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五月十三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入明瓦廊居住。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

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

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要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

姚蓬子（引者注：据我访问施蛰存先生时，他回忆与夫人陈慧华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前来庆贺婚礼的，除丁玲、姚蓬子、沈从文外，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音等作家、诗人）。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引者注：今上海淡水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难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予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引者注：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一九三三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五月十三日迁往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引者注：即姚文元）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

觉得欣喜非常。这是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像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引者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是他写的。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象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

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子，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

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姚蓬子或冯达再干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

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像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我在国民党的报纸或刊物上发表”；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李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

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欢喜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勃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

“……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〇年中央

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铁锤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他成了徐恩曾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南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像《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〇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 P. 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

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前往上海浦东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
>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
>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
>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
>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

（本书作者注：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当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一九五六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的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邨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杏邨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

邨，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员。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目击者之一，是袁孟超。

袁孟超，本书初版本称之为“中统特务”。这是依据中共中央［1977］10号文件附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关于袁孟超的小注：“中统特务，已宽大。”

本书初版本出版之后，笔者在一九九七年底收到袁孟超亲属的来信，寄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案件复查通报》第九号。《通报》指出：

“袁孟超同志现为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省政协委员，四川资

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被捕。同年十一月释放后，被南京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间曾任俄文翻译、编译股长，从事过文化活动。同时，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参加我党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活动，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

“对他的这段历史，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公安局定为‘叛变，充当文化特务’。一九八一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销了这个结论。一九八六年吉林省委又进行复查，认为袁孟超同志不属中统特务，并批准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作为重新入党，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一九四七年算起。”

袁孟超在一九九一年去世。

据袁孟超生前所写的材料，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

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此外还有袁孟超和妻子傅伯群、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像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中，费侠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的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一八九八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材，有“美男子”之称。
>
>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吴兴姑娘张氏为妻。这个原配妻子后来一直被徐留在湖州，从不带她外出，嫌她是乡下女人。张氏生一女。
>
> 徐恩曾留美归来，又娶中统局宣传处处长王劼夫之妹王素卿为妻。王氏是东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
> 自从徐恩曾见了费侠之后，马上为之倾倒。
>
> 费侠何许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产党员，曾赴苏联留学，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一套布尔什维克理论。她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种健康的女性的美，有点苏联姑娘的气派。
>
> 费侠被捕之后，跟姚蓬子一样，成了叛徒，出入于中统。
>
> 徐恩曾看中了费侠，任命她为中央统计局秘书，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
> 徐恩曾常常带费侠外出兜风，关系浪漫，很快传入王氏耳中。王氏大发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

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与费侠只是同居。一九三八年春在汉口，徐、费正式举行婚礼。从此，徐恩曾一直与费侠生活在一直。解放前夕，徐恩曾与费侠一起逃往台湾。

九旬老人汤静逸的回忆，可以说是对姚文元的“干爹”、“干娘”的面目的最确切的描绘。

费侠成为徐恩曾的夫人之后，加官晋级，当上了中统局总干事、伪立法委员。

姚蓬子跟随主子来到汉口，每月照领中统津贴一百元。他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继续发表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姚蓬子住在汉口交通路。那是类似于上海四马路那样的文化街，书店集中在那里。姚蓬子又混迹于出版界了。

在武汉，人们常常看见费侠带着“干儿子”姚文元去看戏、看电影。姚文元成了联系姚蓬子与徐恩曾、费侠之间的一根“热线”。

大约由于有着相同的经历，加上攀了“干亲”，费侠与姚蓬子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费侠写了文章，送来请姚蓬子“润色”；姚蓬子写了文章，有时署上“费侠”两字加以发表！

两个叛徒，结成了“神圣同盟”。

就在这个时候，楼适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也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社工作。

“天下真小。”楼适夷跟姚蓬子在武汉不期而遇了。先是有点尴尬，马上嬉皮笑脸，姚蓬子朝楼适夷打招呼。

楼适夷心中别扭，脸上也别扭，一转身，走了。

党组织知道后，劝楼适夷还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这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抗战期间，大敌当前，要尽可能多团结一些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茅盾、老舍、阳翰笙、楼适夷、郁达夫、冯乃超等共聚汉口，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决定出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由老舍负责，楼适夷担任编辑，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国民党这边有靠山，在共产党那边有熟人，左右逢源，两边都有“关系户”。他很会经营，袋里常常塞着大把钞票。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意识到金钱的重要，于是想方设法弄钱，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错，在“中苏文化协会”也挂上了个头衔——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

假钞票帮助了作家书屋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这三天，汉口、武昌、汉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

蒋介石逃往“陪都”重庆苟安，姚蓬子“紧跟紧追”徐恩曾，也逃往这座山城。

明里，姚蓬子挂着《新蜀报》副刊主编的头衔。

暗里，姚蓬子依然干着中统特务的勾当，与徐恩曾保持着单线联系。

关于姚蓬子在重庆依然是中统特务，有着两份铁证。

徐恩曾的秘书袁逸之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国府路二八二号，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书，约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币给我，对我说：“姚蓬子明天来家，你把钱给他。”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看门副官王积善上楼来对我说：“姚蓬子来见你，要不要见他？”我说：“叫他上来。”王引姚上楼

来见我。我把徐交的钱给了他，他一副卑躬曲膝的样子对我说："袁秘书，谢谢你。"在抗战这段时期，姚蓬子从汉口撤退到重庆，表面上仍打着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会上闯，而暗里却单线直接和特务头子徐恩曾联系，供特务机关使用。

另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则是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重庆区区长张文，他也还记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在设于重庆川东师范的中统局本部，我曾几次碰到姚蓬子。当时我任中统局第一组第二科长，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笔津贴。

从叛徒到中统特务，姚蓬子的"轨迹"是清清楚楚的。

不过，姚蓬子毕竟是聪明人。这时候，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中国的未来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显的了。姚蓬子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当诗人吧，写诗那点稿酬，如胡子上的饭粒；当作家吧，写什么呢？写左翼作品，徐恩曾不会放过他。写反共作品，会遭左翼作家白眼。办刊物吧，难！在南京，丁玲与徐恩曾那一段对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稳而又妥的，还是开书店。进，可以自己印书出书；退，还可以销售别人印的书。不论进退，都可以赚钱。

他嗫嚅着，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开设一家书店，"独立谋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借给他一笔款

子。

姚蓬子千恩万谢，接过这些新钞票，再三声言：一旦书店站稳脚跟，有所盈利，日后定然连本加息奉还！

于是乎，重庆白象街头冒出作家书屋的崭新招牌，经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这个书屋，兼出版社和书店于一身；姚经理，则兼编辑和老板于一身。

作家书屋既出书，又卖书。

姚蓬子靠着徐恩曾的资助，终于在山城重庆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里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干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只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里。

原来，徐恩曾那时手中的新钞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乐得“资助”姚蓬子，以图日后偿还。

徐恩曾神通广大，他手下的“中统”特务获悉重要情报：“中央银行”的钞票，曾委托上海中华书局代印。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这批印钞票的铜版匆匆运往香港中华书局。香港落入日军之手以后，铜版被日本特务运回上海，在那里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悄然把日军印制的假钞票运往重庆，抢购物资。徐恩曾从中发了大笔横财。自然，从中瓜分一些给日本特务。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钱”。他借给姚蓬子的大沓新钞票，乃假钞票也！

直到一九四三年秋，“中统”的“对头”——“军统”头头戴笠，从浙江缉私处处长赵世瑞那里，获知两艘路过杭州的商船装有大量假钞，而船长持“中统”的证明文件不许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军统”特务截船，把钞票空运至重庆。经中央银行鉴定，证明皆为伪币。

戴笠立即密报蒋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状。

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于假钞票开张的作家书屋却没有倒闭……

姚蓬子毕竟在文艺界人头颇熟，拉稿颇有手腕，从名家手中弄到不少书稿。他算不上一个有实绩的作家，倒是一个会赚钱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书有号召力，易销，也就易赚钱。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重庆的《新民报》上，刊载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在砚台》一文，可以说是当年作家书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动写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问，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
>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草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
>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堪多，底子最奇，四围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象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

为孙悟空就是从这块石头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几声，使之闻之。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八十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一九四一年，被国民

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翘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禺、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冈、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

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这时的姚文元，在重庆南开初中上学。笔者的文友刘兴诗[①]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他送给笔者一帧姚文元的照片，那是姚文元在那里上学时交给学校的证件照。

据刘兴诗说，姚文元是在一九四三年进入南开中学的。一九四四年曾因成绩不好而留级。不过，他的作文不错，在全校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杨汝绸（后来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第二名是姚文元；第三名是刘兴诗；第四名是唐贤可；第五名是马雪生。

当时的语文教师郑学韬曾说：“姚文元的作文，大部分都不错，但并不是篇篇都好。他也学习写小说，但是在他笔下，每一个主人公到最后总是死去。”

每逢星期六，学校里进行卫生检查，姚文元往往不及格。他的耳朵老是流脓，衣服也总是不整洁。

刘兴诗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打电话给笔者，说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重庆南开初中四十周年校庆专刊上，见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也许是姚文元平生最早发表的文章。此外，在专刊上还有白先德的文章。白先德是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哥哥。

①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采访。

第四章　望子成龙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曾任中统局第四科科长、秘书以及内调局主任秘书的孟真，在重庆的时候与姚蓬子常有过从。据孟真回忆，在姚蓬子离开重庆的前一日去看望他，“时已近午，他还高卧不起，原来昨宵雀战（打麻将）黎明方归。我问他：‘走不走?’他两手一摊：‘像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里去?’”①

上海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蓬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

---

① 孟真：《中统与我》，载《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蓬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讦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管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像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地地道道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蓬子，蹩脚的作家，精明的奸商！他比父亲姚西曜盘剥佃农的大斗更厉害，他从作者、读者、职工三方面榨取血汗钱！

姚蓬子之苛、诈，令人震惊。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她一分钱工资！一九三一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有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惟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像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

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地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这时与他常来常往。

据楼适夷回忆，他回到上海，也曾去过作家书屋。在他的印象中，这时候的姚蓬子显得异常忙碌。

这时的姚蓬子，成了地地道道的奸商！

脸阔了，手宽了，姚老板对职工依然那么刻薄。作家书屋的一个老职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脚踢开，什么“抚恤金”，没门儿！

姚蓬子虽说发了财，却成天价双眉紧锁，没有一丝笑脸。每天打开《申报》，愁云便飘上他的心头：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推进，步步得胜，眼看着便可唾手而得中国大陆，上海迟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忧心忡忡。他曾听说，前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搞过肃

反，对叛徒是毫不手软的。

眼下，国民党政府大厦已摇摇欲坠，不能再作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纵然手中有钱，日子也是难熬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般的书店老板，他有着那样一段抹不掉却又令人心焦的历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他就要发一通无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托在独养儿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龙。

在姚文元之后，周修文生过二女一子。

大女儿叫姚文华。

二女儿是在一九三七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军突袭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几个月的二女儿送回诸暨老家。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二女儿死于脑膜炎。

来到重庆之后，周修文生下一个儿子，曾使姚蓬子兴高采烈。这小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染上麻疹，转为肺炎，死了。

于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惟一的儿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

姚蓬子为儿子操碎了心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颇远，但那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从重庆中学转入大同附中，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毫不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子——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不过，作为作家的姚蓬子，为儿子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从十五岁起，姚文元就坚持每天记日记。几十年来，姚文元一直恪守父亲的教导，从不间断地记日记。即便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忙得不亦乐乎，他仍忙里偷闲，写下日记。后来，姚文元成为“阶下囚”，他在牢房里仍每日写日记。不论历史对姚文元如何评价，姚文元毕竟已经深深卷入中国当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姚文元的日记，成了这些重大事件的重要记录，因而富有史料价值。笔者以为，将来在合适的时机，《姚文元日记》会分批出版。《姚文元日记》将成为姚文元一生的重要著作。诚如周佛海，人生道路崎岖，但是此公也数十年坚持记日记。如今，分卷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现代史的重要史料。追根溯源，姚文元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姚蓬子的引导。一九四八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一月十八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一月二十九日，上海二十七个学校五千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三千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二百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二十七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一月二十九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

筋怒张。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十七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确实，大同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学。据记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组织。一九三八年校内已有中共党员。一九四〇年重建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有学生党员三十一名……”①

当儿子在大同中学念完高中一年级，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是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生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

① 陈佐辉、董生甫：《大同中学地下党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片断》，《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在开学的那一天——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姚文元向父亲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又过了几天，姚文元告诉父亲："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不过，姚蓬子这一回并没有反对儿子跟那个地下共产党员来往。不言而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姚文元喜欢看书。他的书包里，装进了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堂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

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曰“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姚文元披上了革命外衣

“你有《三S平面几何》吗?”一个方脸、白皙、戴眼镜的二十四五岁的男青年，穿一身旧西装，左手拿着报纸，问姚文元道。

“没有。”姚文元答，“我只有《范氏大代数》。”

按照崔震教给的联络暗号，那位男青年跟姚文元对上了号。

男青年名叫郭坤和（又名郭民），是上海南中区的分区委书

记。

他向姚文元讲明了对党、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然后，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他问及了姚蓬子。姚文元如同对崔震说过的那样，又重述了“进步作家”姚蓬子的身世……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无法对入党对象进行外调。由领导出面，这样找发展对象谈话，就算是一种审查手续。

由于姚文元的隐瞒，当时的党组织不知道姚蓬子的严重问题以及姚文元和徐恩曾、费侠的关系。何况姚文元只是一个中学生，他的入党申请只是报到分区委。

一位当年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后来曾不胜感慨地说：“因为姚文元当时是个中学生，所以他的入党报告，只是送分区党委郭坤和同志审批。限于当时的条件，审批手续不过是郭坤和找他谈话。问及他的父亲时，姚文元说是鲁迅的战友等。如果当时上报市委的话，姚文元的入党报告就不会马上批准，起码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因为姚蓬子是叛徒，当时地下党上海市委是掌握的，是绝不会被姚文元所说的那一套‘鲁迅的战友’之类话骗过去的！”

感慨只是感慨，历史毕竟已经过去。

崔震成为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只需一个介绍人）。经过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讨论通过，经过分区委批准，顺顺利利，姚文元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便举行入党宣誓。

“忠于组织，严守秘密，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郭坤和念一句，姚文元跟一句。念完誓词，姚文元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

姚文元入党之后，作家书屋二楼便常常成为沪新中学地下党开会的场所。

每逢这种时候，姚蓬子便知趣地回避了。看到儿子披上了一件“革命”的外衣，姚蓬子心中暗喜：这一步棋走对了！

沪新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扩大，地下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姚文元由于工作“积极”，入党不久便担任了党小组长，然后担任支委。解放前夕，姚文元已是支部之下的“分支书记”。

后来，姚文元在履历表上写“担任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那是给自己提了“一级”。

我在访问当年沪新中学地下党的好几位老同志时，他们一致严肃地指出：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孙志尚同志，后为冒金龙同志。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由于新党员不断增加，沪新中学地下党成立了总支，总支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分支部。姚文元是高二年级甲、乙两班的分支部书记。姚文元在解放后填表，自称是“沪新中学党支部书记”，显然不符合事实。

姚蓬子到底老奸巨滑深谋远算。不出他的所料，国民党果真保不住“大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攻下上海城。

入党不过七个月的姚文元，年纪不过十八岁，学历不过高中二年级，从此却有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曾经是地下党员。

在“文革”中，在大庭广众之中，姚文元曾不止一次吹起了自己的“光荣史”……

令人寻味的姚文元道路

解放以后，姚文元走过了怎样的道路？

下面两个姚文元的镜头，时隔二十年，反差是那么的强烈：

一九四九年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个穿着蓝得刺眼的干部式棉衣的剃平头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车后的书包架上，捆着一大包刚刚印出的《青年报》。

此人便是姚文元。当时他还在继续念高中，课余兼任上海《青年报》的发行员。由于这一职务不属国家干部正式编制，他

没有领到国家供给的棉干部服。可是，那象征着“革命”的棉干部服，对他的吸引力未免太大了。他自己花钱，请人照样仿做了一件。只是所买的蓝布颜色太艳，叫人一看便知道是“冒牌货”。

二十年后——一九六九年，姚文元穿一身崭新的军装。这军装在当时是“革命”服。虽然姚文元穿的军装并非“冒牌货”。可他却是个冒牌军人。他以一个“武化文人”的姿态，出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当年的新闻公报这样报道大会开幕式：“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了闭幕式时，新闻公报则这样报道：“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新当选的三十八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

从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高中生，到二十年后成为党的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道路是令人寻味的。

其实，姚文元开初并没有坐上“火箭”，而是骑着“自行车”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他甚至一度车翻人仰，跌进沟里。

在档案里，我看到姚文元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一九四九——一九五五．二	南二区工作
一九五〇．二——一九五〇．七	因病在家休养
一九五〇．七——一九五一．九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干事
一九五一．十——一九五一．十二	团校学习
一九五一．十二——一九五二．五	三反工作队队长
一九五二．六——一九五二．九	团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一九五二．十——一九五三．三	团校学习
一九五三．三——一九五三．四	卢湾区团委
一九五三．五——一九五三．八	卢湾区团委宗教办公室
一九五三．九——一九五六．六	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职工教育科科长

……

也就是说，解放后七年，姚文元也不过是个科长。

也许由于太简略，有几处我不知道何意，或者不知其详。

比如“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二 南二区工作”，这“南二区”是什么意思？请教了姚文元当年的老同事，方知这是指他在团的南二区担任《青年报》的发行员、通讯员，“白天来来，跑跑基层，分分报纸”，如此而已。当时的“南二区”由上海的卢湾、蓬莱、邑庙、嵩山地区组成。姚文元在团的南二区委里只有一个抽屉罢了，并非正式工作人员。

所谓“因病在家休养”，这病，据说是心脏病。

令人不解的是，“因病在家休养”的姚文元，在那五个月里，两度跟随父亲姚蓬子前往北京。

坐落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有一家以涮羊肉名闻遐迩的“东来顺”饭馆。一位有着跟姚蓬子差不多的叛变经历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在那里宴请姚氏父子。

老朋友跟姚蓬子沉缅于往事的回忆之中，姚文元只顾自己涮着羊肉，一块一块送往嘴巴里。

突然，那位姚蓬子的老朋友把脸转向他：“文元，你还记得你的寄娘费侠吧？”

“记得!”姚文元立即点头道。

“你还记得你的寄爹徐恩曾吗??

“记得!记得!都记得!特别是寄娘，待我特别好。”姚文元连连说道。

这时，那位姚蓬子的老友压低了声音，姚氏父子把耳朵伸了过去：“你们知道吗，文元的寄爹、寄娘都跑到台湾去了!”

姚文元的神色陡变。

姚蓬子双眉紧皱，当即说：“这件事今天说到这里为止，不要再提了!”

姚文元马上附和道：“对，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他在“因病在家休养”前夕——一九五〇年二月，总算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论他在入党或转正的时候，都从未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与徐恩曾、费侠的关系。眼下，他更是守口如瓶，就连两度随父去京广访父亲故旧，他也从不对党组织提及一句。心中有鬼，惟独他自己明白。

至于“一九五一．十二——一九五二．五　三反工作队队长”，姚文元言过其实。不论是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还是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一致证明：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分局组织的“三反工作队”的一名“打虎队员”，担任过联络员，从未担任过队长。

留存在当年的老同事们的记忆屏幕上的姚文元形象，大抵是这样的：

独来独往。他住机关集体宿舍，总是要一个人独住。很少跟同事来往，也从不向组织暴露思想。

懒得出名。那件鲜蓝色的棉干部服，穿了几个冬天，已经油光可鉴了，他照穿不误，不洗也不刷。同事们称他为“卖油条的小贩”，他也笑笑。臭袜子、脏衬衣之类，要等星期天带回家去，叫保姆冯金芸洗，他自己连块手绢也不洗。头发总是到了不得不

剃的时候，才进理发店。每天早上，他总是机关宿舍里起床最晚的一个，从不参加做早操。午睡时懒得连鞋子都不脱，斜着躺在床上。

惟一的爱好是看书、写稿。他的宿舍里放着个藤书架，他不时从家里带来书。别的书经常换动，但是姚蓬子著的《论胡适实用主义》小册子一直在书架上……

长篇《百炼成钢》成了“废铁”

穿着棉干部服，做着作家梦。

如果不把姚文元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南开初中校庆专刊上发表的文章算在内，姚文元平生第一篇公开见报的文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处女作”，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作为“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征文发表的，题为《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署笔名“志毅”。当时，姚文元十八岁。

另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的《大晚报》上，查到《老城隍庙一瞥》，署名“文元”。是否系姚文所作，待考。但是“志毅”写的那篇书评，确系姚文元所作。因为那篇文章收入姚文元所著《细流集》一书，列为首篇。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青年报》的“读者之声”专栏里，刊出一位读者的千把字短文，题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署名“沪新中学姚文元”。这时的姚文元，是《青年报》的通讯员。

此后将近两年，姚文元没有发表过文章。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读者来信”专栏里，终于冒出“姚文元”的大名，他的来信标题为：《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

这年秋天，姚文元步入上海天宫剧场，看了滑稽戏《活菩

萨》。这时的姚文元虽然只二十岁，已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左”派精神，在剧场里坐不住了，认为这样的戏太“庸俗”。他感到惊讶，竟有那么多的人观看《活菩萨》！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文艺报》的“读者中来”专栏里，发表了《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认为《活菩萨》拥有那么多观众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文章虽然不过千把字，批评的调子却唱得很高。此文署名：“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姚文元”。

写这样的文章，姚文元觉得顺手，就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写了《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写了《错误的了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第十六期《文艺报》上，又在“读者中来”专栏，发表姚文元的《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文，批评了“由于出版者惟利是图，有的集子编进了一些不健康的‘冷门’歌曲，以示其‘突出’……”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六年时间里，姚文元总共只发表八篇“豆腐干”文章，要么“读者之声”，要么“读者中来”，要么“读者来信”，一会儿批滑稽戏，一会儿批歌曲出版工作……姚文元意识到，这几篇“豆腐干”文章，离“大作家”太远了！

在他调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当宣传干事之后，一心一意要写长篇小说——“大部头”。他要写的小说，据说是受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启示，名曰：《百炼成钢》！

这是一部“史诗”般的煌煌巨篇，从红军长征、土地革命，从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直写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写到“三反”、“五反”运动……

用姚文元自己的话来说：“我花费了不知多少个星期日和夜晚，查资料，写作……”

当红军进行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姚文元不过

是个三岁娃娃。他只能靠着查资料来写“史诗”般的小说。

足足写了四大捆稿纸，姚文元终于把《百炼成钢》写出来了。

他以为这一炮足以使中国文坛震动，可是，一纸退稿信，把这部巨著打入了“冷宫”。

整整一个月，他闷闷不乐，一下班就躺在床上。哦，《百炼成钢》成了一堆废铁！

他终于从退稿中醒悟，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

他毕竟是从作家书屋里出来的。他从小就见过许许多多作家，他读过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他铁了心，要当一位作家。

他在思索，他在寻找文坛捷径。忽地，他的眼前一亮，藤书架上的几本书吸引了他：那是作家书屋出版的胡风著作……

他想，不写小说，专搞文艺理论，不也能够成为大作家吗？胡伯伯不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第五章　对胡风“反戈一击”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过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样、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

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敝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

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引者注：应为棵）墙头草，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晃晃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

一通：

>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是“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

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

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党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会场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

“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曰“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通，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不时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弢、王若望。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弢和王若望对姚文元其人，都眼生得很——虽然他们都认识姚蓬子，却并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的公子。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唐弢主管理论文章。他已一次次给姚文元退稿。他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个通病：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缺乏理论深度和独到的艺术见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六七五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

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原名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弢。

这一回，唐弢仔仔细细地又“拜读”了一遍，唉，满篇枯躁的政治术语，哪是文艺理论文章?!

“还是退稿!”唐弢实在挑不出一篇来，也无法“并”出一篇，只得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退还给了“青年作者”姚文元。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的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

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

结识张春桥

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林荫夹道，闹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九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九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像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几颗淡黄色的棕子糖。处处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觉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有点“资产阶级”气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征着“无产阶级”的“风格”。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

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不过，张春桥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姚文元一派“左”言，显然是做“棍子”的好料子。不过，要找几个这样的青年并不难。张春桥所需要的是“听话”的“棍子”。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桥，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棍子”时，在一次小的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白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人，杀一双。后来，改变政策，诱逼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叛变，再放回去。这些叛徒就成了白蚂蚁，从内部蛀空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蚂蚁政策’，是从姚蓬子开始的……”

讲到这里，张春桥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见姚文元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后来，姚文元即便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名震全国”，即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始终对张春桥俯首贴耳，成为张春桥的“亲密战友”。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那天，张春桥言语不多。留在姚文元脑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家。要随时随刻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这儿消息灵通。有空，过来坐坐……”

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破天荒，一辆小轿车停在中共卢湾区委门口。说是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社开批判胡风座谈会。

姚文元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宣传部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姚文元的大名赫然印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而是整整一大版。那文章的标题，显得颇有气派，十足的“革命”味儿：《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

这是姚文元从发表“处女作”以来，惨淡经营了六年之久，第一次发表的“有分量”的文章。

当天晚上九点多，姚文元就来到张春桥家里，说了一番出自心底的感激的话。确确实实，没有张总编的支持，当时的无名小卒怎能在堂堂的《解放日报》上打响这一炮？

“吃，吃，吃粽子糖。”张春桥又一次端出了搪瓷碗。

“粽子糖真好吃。”姚文元又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粽子糖，塞进了嘴巴。

“跟胡风的斗争，还会‘升级’。”张春桥吞云吐雾，透过袅袅青烟，把重要的动向告诉了姚文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央会有新的部署。在上海，敢碰胡风的人不多，尤其是硬碰、真碰的人不多。你还可以给《解放日报》写几篇！”

铭心刻骨，姚文元感激张春桥的“栽培”。

张春桥果真对来自中央的消息非常灵通。经过他的亲自安排，姚文元以反胡风的“英雄”的姿态，在五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了：

五月七日，刊出姚文元的《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

五月九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

五月十一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

如此隔日一篇，姚文元名声大振。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早不晚，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几整版的篇幅，刊出关于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所写的那著名的《编者按语》。批判胡风，不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提高到“反党集团”（自六月十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

多亏张春桥提供了重要信息，姚文元能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的前夕，抢先抛出三篇批判文章，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

紧接着，五月十七日，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登出《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那是“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活动的材料”，姚文元“感到愤怒”，于当天深夜赶写此文。姚文元写道：“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更可以看到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无耻的灵魂，一个被狂热的唯心主义和最下贱的政客手段所养育着的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对胡风泼尽污水，最后，发出如此“誓言”：“我表示：我要尽一切力量继续投入斗争，我也希望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的罪恶行为，两面派恶劣手腕，给以十倍的还击。”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同时刊出毛泽东写的《驳“舆论一律”》。

又过了一星期，六月一日，姚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的文章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这篇文章是经张春桥审定、推荐而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当《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张春桥当即嘱令《解放日报》于六月三日转载。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的调子唱得更高了：

>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目的，他们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和使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阴谋，现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来了……
>
> 我要求把胡风反党集团全部阴谋活动彻底追查清楚。
>
> 我要求对党的死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胡风依法予以惩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他发表了十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作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于是乎，他给自己插上了一根美丽的羽毛，曰：“青年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就这样，姚文元靠着批胡风起家，靠着张春桥往上爬。他所写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竟奇迹般变为他批胡风的“资本”。

从此，他把见风使舵当成看家本领，把“反戈一击”当作“成功秘诀”。他成为文坛上的投机商。

跌入了泥泞的路

反胡风运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达到了高潮：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

照理，作为反胡风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时此际应当鼓噪而进，再发表一批讨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从报刊上消失了：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连“豆腐干”文章也未曾发过一篇。

意气正盛的姚文元，怎么会一下子收声敛息？

哦，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谚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反胡风斗争，反到了“英雄”头上来了！

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他正在机关写批胡风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诉他，说是他的母亲来了。

脏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经带回家洗掉了嘛，母亲来干什么？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楼，只见母亲周修文神色紧张站在大门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边说：“你爸爸给抓去了！”

姚文元一听，脸色陡变。略微镇定了一下，他说：“你赶紧走。我下班以后回家。这消息对谁也别讲！”

“你放心。”母亲说，“我怕别人知道，才来机关找你。我怕打电话会被总机听见……”

周修文说罢，急急走了。

下班之后，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无其事地回到机关宿舍。

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解放之后，姚蓬子仗着有二十三万元（即旧人民币二十三亿元）的资本，仍然开他的作家书屋，当他的老板。

不过，他没有宣铁吾那样的靠山，不能再做纸张投机生意

了，收入远远不及纸贩子的年月。

令人头痛的是，作家书屋里的职工成立了工会。工会成了他的对头。

工会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

姚蓬子总是打“太极拳”。实在没招儿了，才像挤牙膏似的，增加一点工资、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作家书屋并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书屋的职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料员——不过她实在干不惯，做了一年就辞职不干了。

姚蓬子在作家书屋关闭之后，干脆，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

他倒有点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着叛徒历史和奸商劣迹，又是地主、资本家“双料货”，在共产党手下别指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他庆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经济上捞了一把。如今，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笔可观的存款。即使夫妻双双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维持生活。

他乐得在家逍遥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当一名编辑。他也庆幸在解放前夕，让儿子姚文元挤进了共产党。从此，儿子有了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党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资本。

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点课，讲讲中国文学史，讲讲《水浒》研究，拿点讲课费。

不过，他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他并非该校正式职工，可以不参加该校的政治运动，依旧十分自由。

他的算盘打得蛮不错：有了钱，生活无忧无虑；有了自己的房子，像蜗牛有了硬壳，政治风浪来了，可以躲进“避风港”；

成了兼课教师，对外人可以自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会像“无业游民”那么叫人瞧不起。

万万想不到，冰凉的手铐会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胡风事件：当反胡风运动的调门越唱越高，胡风被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姚文元成了反胡风的“英雄”时，姚蓬子却大倒其楣。由于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著作，他曾跟胡风有过许多交往，在清查“胡风分子”的时候，便查到了他的头上。他被列入“胡风分子”嫌疑名单之中。

原因之二在于潘汉年。潘汉年是姚蓬子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对姚蓬子的叛党经过一清二楚。姚蓬子每当看见报上登着“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字样，便触目惊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里对人说：“只要潘汉年在上海，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汉年突然在北京饭店三〇三室被捕，罪名是极为可怕的“内奸”！后来，潘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革”中死于监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宣布“潘汉年事件”乃是一桩冤案。

潘汉年的被捕，也牵涉到姚蓬子。因为当年姚蓬子担任中共特科联络时，顶头上司便是潘汉年。潘汉年既然是“内奸”，那么姚蓬子也有“内奸”之嫌——唉，不论潘汉年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过得不安宁！

于是，姚蓬子作为“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分子”的双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审查，押往北京。

经过审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风分子”，也够不上“潘汉年分子”。不过，七审八查，却查出了他的叛变问题。《中央日报》上那《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白纸黑字，姚蓬子无法抵赖，不得不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长篇交代，交给了公安

部……

姚文元是党员。家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他理应向党组织汇报。他却不声不响，想瞒天过海，因为反胡风的“英雄”有着这么一个父亲，锦绣前程将付诸东流！

隐瞒毕竟无济于事，党组织找姚文元谈话了。本来，直至解放后，姚文元还在组织前宣称父亲是“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这一回支支吾吾，咬文嚼字。半晌，才说出一句：“我父亲是革命低潮时的脱党分子。”仅仅是“脱党分子”，而且是在“革命低潮”时才“脱党”的，姚文元的每一个字都注意了“分寸”！

“我早就跟父亲划清界限！”姚文元马上又补充说明，“我一向住机关宿舍，就是为了跟家庭划清界限。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母亲给我吃白米饭，我很生气。我对她说，现在大家都吃红米饭，我们家里怎么特殊？我批评了家里，连饭也没有吃！”

他瞪着一双金鱼眼，说罢，习惯地用右手衣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党组织没有当面戳穿他的西洋镜。

没多久，机关里开展肃反和清查“胡风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泞的路。

起初，区委宣传部里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来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着，有人检举说，姚文元“宣扬过胡风文艺思想”。

紧接着，姚文元被列为清查对象——清查他跟胡风的关系。

最使姚文元伤心的是，对象吹了！

那时候，姚文元热恋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英，而金英正举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连发表那么多反胡风的文章，有点动心，可是她又觉得组织部里另一位男青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材，远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学地下党员，一九四八年一月入党。她在党内职务比姚文元高。在肃反运动中，金英成为区委机关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面孔，代表组织找姚文元谈话，要姚文元交代跟父亲姚蓬子的关系，交代怎样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

望着金英铁板般的脸，姚文元心似刀绞。

完了，完了。父亲被捕了。不能发表文章了。受到审查了。恋爱告吹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姚文元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得了中耳炎，从右边的耳朵里不住地流出脓水。他只是用手帕擦一擦，根本没有心思去医院看病。

他常常在宿舍里默默地看天花板，吃不下饭，看不进书，写不成文章，睡不着觉。他的心灵受着难言的折磨。本来，有一段时间，他生怕金英嫌他脏，曾勤洗勤换过衣服、枕巾、被单，如今“复辟”了，一如往常那般懒、脏、杂、乱。

终于，一天晚上，在上海南昌路一〇二弄十号——当年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所在地的小天井里，召开了一个帮助姚文元端正思想的会议。

姚文元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住地用手绢擦着从右耳流出的脓水。

按照那时会议的程序，末了当然要被帮助的人表态。只见姚文元低垂着头，长叹了一声：“我有病，但是我不想去看病。我今天二十四岁，能够活到三十岁，也就差不多了……”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宿舍，叹气已毕的姚文元却又对人说：“我在死以前，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卢湾区区委肃反审干领导小组正式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以为父亲是‘三进步’——进步作家，开进

步书店，卖进步书籍。父亲的问题，是在他被公安部逮捕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受父亲的蒙蔽。我，我，我今后保证跟父亲划清界限……”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卢湾区区委审干办公室写出了关于姚文元的审查报告。现摘录这个报告原文于下。虽然这个审查报告是用当时的政治语言写的，现在用历史的目光审视并不见得准确、正确，但却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反胡风“英雄”姚文元当年的尴尬和狼狈：

>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
>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张芝田），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
>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
>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

认为是对的。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区委还是要他交代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跨进《萌芽》编辑部

九五六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钉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七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适合。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区委职工教育科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要叫我当，我会高兴得跳起来。我像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了，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这样，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他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

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他露出了“锋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露“锋芒”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乱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

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所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柯庆施，由于鼻子格外大，人称“柯大鼻子”。解放后，坐镇南京，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本属陈毅领导。一解放，陈毅便成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长。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外交部部长——虽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连任上海市市长，但是他工作的重点已移往北京。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庆施便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成为上海的首脑人物。柯庆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称赞了他，于是“柯老”之声鹊起——其实，那时他并不老，不过五十六岁。他突然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三岁，讣告上开列了他的一系列担任的要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后来，他的这一系列要职，逐一被张春桥所继承……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了姚文元其人。

本来，一九五五年秋，张春桥调离上海《解放日报》社，是因为北京来了调令，准备任命张春桥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收拾细软，正打算进京赴任。恰巧在这个时候，已明确柯庆施将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当即要张春桥留下。

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彼此觉得意气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庆施要到上海走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张春桥是极合适的人选。

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让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并不分管具体部门，人称“不管部部长”。其实，张春桥的“实职”，乃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成为柯庆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庆施打听清楚了，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蓬子，却并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

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惟有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三月四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

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一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六日，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倍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地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然发表了一系列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着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

“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敌友之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

“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

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同上）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

“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论“知音”》，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艺月报》）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摔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动"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那"早春天气"中，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五月七日、八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

"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

"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方便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名震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

突然跃为“新星”

六月十四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六月十四日下午，一辆轿车驶往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楼”。车上坐着张春桥和“新星”姚文元。

海格大楼原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因而得名“海格大楼”，也就是现今的静安宾馆，当年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办公的所在地。听说“庆施同志”召见，姚文元搓着双手，兴奋得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唷，那么年轻呀！”柯庆施一边握着姚文元的手，一边问，

“多大啦?”

“二十六岁。”姚文元赶紧答道。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哪!”柯庆施连声说，“你的文章，很老练，不像二十几岁的人写的。”

姚文元一听，有点紧张，马上说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哈哈哈哈，”柯庆施大笑起来，“请坐，请坐。我是说，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来，他赶紧掏出笔记本，飞快地用笔记着。这时，他的双手才找到最适合的位置。

“你的情况，春桥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柯庆施收起了笑容，开始了正式的谈话，“你的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这一点很不错!”

姚文元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我们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当前，反右派斗争刚刚打响，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争取成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断写出《录以备考》那样的好文章……”柯庆施用作大报告的口气，说了一大通。

姚文元忙于记录，仿佛在听报告，忘了这是在跟书记谈话。

“以后，你常跟春桥同志保持联系。要随时了解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只有消息灵通，才能写出好文章。”柯庆施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张春桥。

“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

谙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像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柯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

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六月十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尽管新华社的这条电讯很短，但是非常重要。毛泽东的话，一共只有四句。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出的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十三天后，“反右派运动”的狂飚便席卷中华大地。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此后二十年——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得到印证：这几句话作为单独的一篇文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然，不论是十三天后发生的事情，还是二十年后发生的事情，都只是事后才证明新华社那条消息的重要性。然而，在当时，这条简短的新华社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姚文元却凭借着他特殊的政治敏感性，立即注意到这条不寻常的新闻。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

录 以 备 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两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或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

“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以敏感的目光，注意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亲笔写下一篇重要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然而，毛泽东没有在文章上署“毛泽东”三字，却是写上“本报编辑部”。

“本报”是什么报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毛泽东还指示，把姚文元的文章与《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起刊出。

毛泽东的文章，是怎样交到《人民日报》社呢？这件事，恰巧与《人民日报》“换帅”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卧室召见吴冷西。当吴冷西到达那里时，胡乔木已经在那里了。

毛泽东早已不满于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尖锐地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晚上，毛泽东紧急召见吴冷西，宣布《人民日报》“易帅”，由吴冷西代替邓拓。当时，吴冷西极感突然，脱口而出：“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说，给他十天考虑的时间。

翌日——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奉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改定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

还没有到十天，毛泽东便在六月十三日晚召见吴冷西，要吴冷西马上到《人民日报》去主持工作。毛泽东随手把自己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当面交给吴冷西，嘱他翌日见报。

吴冷西这么回忆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这时又回过头来就调我去《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对我说，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这时，毛主席递给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的文章，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一九五六年四月和十二月）先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在我们起草时不是用这个题目，也不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时由毛主席提议修改并经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着说，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①]

吴冷西当即和胡乔木一起赶往《人民日报》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同时一起刊出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按照中国新闻界的习惯，凡是重要的文章，必须以新华社电讯发出，这样全国各地报纸都会马上加以转载。为了扩大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毛泽东还指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

毛泽东甚至为新华社转发这两篇文章，亲自写了电讯的新闻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四十四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导语！

毛泽东所写的导语全文如下：

［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①

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全文播发。

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全文如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止文汇、光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第五〇九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①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第五〇八—五〇九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为之震动。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跃上苍穹，万众瞩目，名噪一时。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成为姚文元一生中里程碑式的日子。从此，姚文元奠定了他的“左派”地位。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到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六月八日，毛泽东就以中共

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身价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　（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　（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　（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　（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　（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　（六月二十六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　（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　（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

“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像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
>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

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九五七年第八期《文艺月报》）

后来，王若望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三十年代，十八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上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便有这么一段话：

“……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话，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不料，二十二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喻今，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

曲曲，象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

（《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艺月报》）。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

……刘绍棠指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一九五七年八月第十八期《文艺报》)

他揍徐懋庸——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

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文艺月报》）

他向《新观察》开火——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新观察〉放出一支毒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他向《文艺报》猛攻——

> 我过去喜欢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喜欢”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

二十六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惟有其父姚蓬子。当姚文元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线”。

第七章　文坛恶棍

“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

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八十五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囍”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建树丰功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话语非常刻毒：

“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二月第四期《文艺报》）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五期《学术月报》。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

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

“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十五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二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上线上纲”，成了“反革命作品”：“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干部诬蔑成冷酷无情的人。反之，对于敌视革命队伍、内心黑暗、抱着顽强的反党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他们粉饰成善良的受屈的羔羊，企图引起人们对他们反革命思想的同情。很明显，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描写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生活的，这个立场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反动立场，因而作品本身也就带着露骨的反动性……”

惟我独左，惟我独革，惟我先知，惟我先觉。二十七岁的姚文元如同一颗扫帚星，在中国文坛上扫荡着。

姚文元的“诗传单”

姚文元的棍子，居然打到古人欧阳修头上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版的第十六期《读书月报》上，姚文元发表了《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

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黄公渚的《欧阳修词选译》。用白话文翻译欧阳修的名作，这本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古典文学的好事。然而，姚文元却不。他首先提醒人们，今日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他说：

“全国人民正投身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干劲无穷尽，跃进再跃进，上游再上游，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进！六亿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接连不断地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

在如此“热火朝天”的年月，姚文元以为出版《欧阳修词选译》，会削弱人民革命的积极性”，“大多数是表现着露骨的颓废厌世的倾向”，“特别是广大青年，尤其有着毒害作用”。

姚文元危言耸听地说，古典文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大抵因为当过《萌芽》杂志的诗歌编辑，大抵因为父亲姚蓬子喜欢写诗，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让诗传单飞遍全市》。

姚文元力主诗歌应当“赶任务”，“通过几万、十几万宣传员的口，广泛地传播到工厂、学校、里弄里去，有力地发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姚文元说，诗歌是“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

他批判道：“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摹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这样，当然就不可能用满腔热情来写诗传单了……”

在“满腔热情”鼓舞之下，为着“赶任务”，为着“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姚文元居然也成了“诗人”！

论“棍”才，姚文元远远胜过他的父亲！可惜，论诗才，姚文元则远远逊于其父。

如今，读者们读着姚文元的“诗传单”，会笑问：这是诗？

请看，“诗人”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街头文艺》创刊号上写的诗，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

我们工人骨头硬，
　刺刀底下夺江山，
拔白旗，插红旗，
　干劲要叫天地翻！
钢水滚滚火光闪，
　定叫英美吓破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的《诗传单》栏目里，又一次刊出姚文元的“大作”，题为《和平出在斗争里》：

美帝英帝，是纸老虎，
外强中干，见风转舵，
你若怕，就欺你，

坚决斗争，一定胜利。
全体同胞，斗争到底，
哪里逞凶，哪里粉碎。
同志们！
奋举宝刀斩毒爪，
掀起怒潮葬狂贼！
从来光明胜黑暗，
和平出在斗争里！

呜呼，一时间，古之词人欧阳修被批判，今之诗人艾青被打倒，剩下只有“棍子诗人”姚文元，剩下只有“诗传单”！

就连曾经出版过诗集《银铃》的姚蓬子，“拜读”了儿子的“大作”，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对老伴说：“文元写的是诗?”

一度“失业”的“棍子”

林村，姚家三楼，老保姆冯金芸在忙着粉刷墙壁。

冯金芸是姚蓬子的诸暨同乡，在姚家干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粉刷墙壁。

白墙，绿窗纱，花窗帘，三楼显得格外幽雅、整洁。

那是一九五九年春，金英要做妈妈了，姚文元就以此为借口，搬到父母那里去住。这时候的他，已是“铁蛋掉在铜碗里——响当当”的“左”派，已经不在乎什么“划清界限”之类忌讳了。父母那里有保姆，母亲又闲在家里，住到那里自然要舒适得多。

金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小红。

姚蓬子当上了爷爷，扫去了这几年心头的不快，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笑了没有多久，脸又拉长了：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的领导考虑到金英是那里的组织部负责人，住在姚蓬子家毕竟诸多不便，要她搬出去。

虽然姚文元拖着不搬，但是卢湾区委已一再提醒金英，姚文元这才不得不与金英迁入机关宿舍。

他们把女儿留给姚蓬子、周修文抚养。直至“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那群年轻人来抄姚蓬子的家，小红和她的妹妹还住在姚蓬子家里。

“棍子”是吃“阶级斗争”的“饭”的。姚文元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大打出手，到了一九五九年，“棍子”竟渐渐“失业”了。

他仍在不断地发表文章，只是不大容易捞到整人的机会，——因为毕竟要等“上头”有了“阶级斗争”的意图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棍威”。

姚文元写些什么呢？

他称赞“退休工人闲不住”——《发扬“闲不住”的精神》（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他说说“认真读书”——《漫谈读书》（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文汇报》）。

他对废物利用发生兴趣——《废物中有奇珍异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他谈业余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一九五九年七月第十四期《支部生活》）。他写起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他发表“美学笔记”《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

他甚至对江河、红绿灯、相片之类产生兴趣，写了《咏物杂感》之类。

这时的姚文元，像刺猬失去了一身硬刺，成了温和的兔子。

偶然他也发出几句批判之声，不过，那是批判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什么“人道主义”?》），批判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的“拿着吧”》）。

一九五九年盛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亦即“庐山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收紧了。

本来，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正是挥刀跃马、杀上“阶级斗争”战场的大好时机。这一回，他却心中一阵紧张。

姚文元紧张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好在一年之前，他为作家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了一本评论小册子，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之一。那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评小册子会给他惹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保卫延安》中作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德怀！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姚文元重读自己一年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脸色都变了。

那本小册子，印行了八万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他的评论：

“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时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敌人的主力被彭总巧妙地引向绥德地区，蟠龙镇这个老巢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他好像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丝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岁，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了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一九五〇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写完，《文艺报》在一九六〇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二月十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像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一百六十

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授一棒——在一九六〇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一九六〇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一九六一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

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粽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是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

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他，已成为高踞于作家头上以鸣鞭为职业的总管！

“姚文元＝棍子”，不仅许许多多作家如是说，而且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如是看。

半是讽刺，半是忿懑，人们称姚文元为“摇棍子”！

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是姚文元，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指挥是张春桥。

偶然，姚文元泄露了天机：

姚文元到《解放日报》上任之后，在“朝花”副刊版上开辟“文坛漫步”专栏。积极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接连在“文坛漫步”专栏里发表了《冷酷的观众》和《摇头派》两文。石铮则写了《可惧于摇头》，对徐景贤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姚文元见到石铮，用近乎恫吓的口气说道：“‘文坛漫步’有个作者座谈会，景贤也参加的。春桥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示，对我们很有帮助。景贤写的短文，春桥同志是看过的。”

姚文元的话，明明白白地把后台老板说了出来：张春桥不仅给他们“指示”，而且还审看文章！

第八章　几番论战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三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指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

冕”。

四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是“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

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璧。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愠怒：

>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

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骂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惟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

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人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〇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邨。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邨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

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像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姚文元举目望去，此人中等个子，前庭开阔，肥头大耳，一口山东话。姚文元认识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罗竹风爱写点杂文，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过，在姚文元“左”眼看来，罗竹风虽是老革命，但言谈颇“右”。

罗竹风向来谈锋甚健，他随口而说：“办报纸，要像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的那样，要会弹钢琴，十个手指头都动。可是，我们上海的报纸有点像敲锣，嘭、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罗局长，你就带头写一篇吧，题目我都给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时的姚文元，突然插话道，“题目就叫《敲锣说》，你看好不好?”

罗竹风哈哈一笑，只是说道：“大家写嘛，我算一个!”

杂文创作座谈会开过不久，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冒出一篇杂文，题曰《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署名“骆漠”。

姚文元凭着他“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仔仔细细地咀嚼着这篇杂文：

> 窗外下着毛毛雨，春雨贵似油呀，但这天气却总有点使人腻烦。
>
> 工作了一天，正应该“逸”一下子，便顺手拿起一本《史记》来，想查清“左袒”这个典故的出处，也算是一种消遣吧?
>
> “笃，笃笃……”有人敲门，却原来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

多日不见，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没话找话说，两人都显得吃力。不知怎么一来，话头转到编辑业务方面，于是松动活泼起来了。

“人都要有一行，没有一行，就会变成二流子。”编辑同志是这样开头的，“其实，二流子也应该算是一行，不过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却是‘编辑’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会分工，不能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编辑就是编辑。如果硬要追问属于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杂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好一个杂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个作家成名，谁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所重视，这当然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然而这其中也有编辑的一份心血。编辑的不平，正是他年年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远坐不上‘花轿’。这些年来，领导颇重视演员、作家，似乎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儿，而编辑却有点‘广文先生’的味道。难道你听说过有什么领导同志接待过编辑这一行么？哈哈……‘杂家’，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定该坐冷板凳……”

……

为什么这位编辑同志有一肚子苦水？个人主义么？名利思想么？不甘心作无名英雄么？都或有之，但也不尽然。如果帽子什么的能解决问题，那未免太简单了。凡是自以为不好解决的工作，最好是从两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负责同志专门接待一次编辑工作者，同他们谈谈心，对编辑工作的情况多了解一点，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岂不皆大欢喜？

我常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样在

无限中求有限，这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学问。明乎此，领导者的天地就广阔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骆漠”是谁。文笔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显而易见，十有八九是化名。“骆漠”者，作者自比“骆驼”，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这般的“笔名分析”。这个“骆漠”，“名不正”，所写的文笔亦“言不顺”，满腹“牢骚”，而且图穷匕首见，把矛头指向领导……

他，实在手痒难熬，终于提棍跃马，朝那“沙漠”中的“骆驼”袭去。

《杂家》事件

五月十三日《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五月六日，在《杂家》一文见报的当天，姚文元连夜写成，掷往《文汇报》。

写文章向来“直、露、多、粗”的姚文元，这一回改换了笔法：

“做文要有对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骆漠同志很懂得这个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观点，却用了主客对话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胜。我也想学一学这方法，来做一回骆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观点的对立面。为了讲究作文的艺术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亲切感，也摹仿骆文，从‘毛毛雨’开始：——

“窗外下着毛毛雨，越落越密。我开窗看了看天色，却不料看见老赵拿着一包书兴冲冲地走近来……”

骆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编辑的苦衷，希望领导能够重视编辑工作。姚文元却逐点予以驳斥：

我自己也做过几年编辑工作，也尝到一点编辑工作的甘苦。我觉得做编辑实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总是够不上，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凄凉感。

提起“广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时歌》中那几句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为什么他把自己同广文先生连在一起呢？

我干文学编辑的时候，北京就专门开过一次很大的杂志编辑会议，我也听说有负责同志接待过《辞海》的编辑同志。“从未有负责同志接待过编辑”之说不知是否属实。

编辑待遇问题确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

……

大抵因为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趋于温和，不像反胡风、反右派那样的寒风萧杀，姚文元未敢给骆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讥，把那个“老赵”当成骆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阵。

姚文元这么一批判，骆漠的《杂家》益发受人注意了。

过了四个月，中国的政治气温骤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康生诬陷七八月间在《工人日报》上连载的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

柯庆施回到上海，马上发话了：“现在，很多人伤风、感冒，

这可不行呀。老罗哪，你写那篇《杂家》，就是伤风、感冒，要注意！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

柯庆施这么一点，许多人才明白：原来，《杂家》是罗竹风写的！“以后，你要写点好文章”，言外之意，《杂家》是坏文章。

在一次会上，柯庆施当众又点了罗竹风的名：“罗竹风，你别老是以出版局局长自居，代表出版界向党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记，你是共产党员，你代表的是‘共产界’，而不是什么出版界！”

不久，一纸调令下达：撤去罗竹风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职务，调任《辞海》副主编。

怪不得，人们传说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见到罗竹风被“罢官”，人们领教了“姚棍子”的厉害！

“杂家”风波，至此本该画上休止符了。

不料，当“文革”风云涌起，《杂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进行“批判”。飞来横祸。邓拓被打成“黑帮”，他的《燕山夜话》成了“反党大毒草”。邓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里，发表过《欢迎“杂家”》一文。这下子，把罗竹风跟邓拓相联系，成了“北呼南应”；“杂家”风波升级为“杂家”事件。罗竹风在牛棚中，受尽折磨……

罗竹风无端受冤。他，三十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投身革命，打过游击扛过枪。“骆漠”，本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用的笔名。虽然那时的环境如同沙漠一般艰苦，但他要以骆驼般的坚韧精神投身战斗，这便是“骆漠”的由来。姚文元并未读过骆漠当年的激扬文字，望文生义，歪批“骆漠”。

那天罗竹风从华侨饭店开完杂文座谈会，回到家中，细思量，却觉得姚文元命题的《敲锣说》难以落笔，无法成文。

数日后，潇潇春雨，绵绵不绝。住在六楼的罗竹风，望着低垂着的铜灰色云层，仿佛天也矮了半截。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细雨不时飘洒在脸上，倒觉得头脑清醒许多。

“笃，笃笃……”响起敲门声。

妻前去门。来者拿着一把湿漉漉的黑布伞，腋下夹着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来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勋，老编辑也。他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时，写过短篇小说，翻译过《续西行漫记》，也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献身于编辑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担任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时，他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一个局长，一个社长，闲聊也离不了本行，谈起了编辑的苦经，编辑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光在会上“出气”，在会外也“出气”！

蒯斯曛给罗竹风送来了“灵感”。

当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飘飘洒洒的牛毛细雨之中，罗竹风乘着电梯，回到了六楼家中。他站在窗边，望着绵绵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宽大的写字桌旁，挥笔疾书。于是，稿纸上便出现了一行标题：《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他作为出版局代局长，感到写上真名实姓诸多不便——这篇短文会被读者看成是局长的呼吁。于是，他写上了他过去用过的笔名“骆漠”。

写罢短文，他提笔给多次前来约稿的《文汇报》女编辑余仙藻挥就一函：

仙藻同志：

这几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编辑交谈，引

起了写作的冲动，草作《杂家》一稿，请阅处。

罗竹风

《杂家》一文很快就在《文汇报》上披露。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篇千把字的短文会惹出一桩“《杂家》事件”。在“文革”中，责任编辑余仙藻因此被没收了记者证；为《杂家》写了《编后记》的《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多次检讨，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给打烂”；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斗台；对《杂家》一文表示过赞同的几十个人，受到株连……

迄今，仍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汇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关于《杂家》的寒光闪闪的文字：

>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网，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引者注：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一九六二年，更达到了高峰。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竹风，在报上公开抛出一篇反党杂文《杂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写文章予以回击。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庆施同志几次在会上点名批叛了反党分子罗竹风。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也明确指出：《杂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矛头指向党的。可是陈其五呢，他一面勾结党内党外的反动“权威”和黑线、黑网人物，对姚文元同志进行反革命围攻；一面拼命给这个反党分子

> 鼓气："老罗，我是支持你的。"同时还赤膊上阵，专门找姚文元同志谈话，对他施加政治压力。正是在陈其五之流的策动下，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亲信，纷纷行动起来。文艺黑网上的小爬虫刘金，就更为活跃，赶写了一篇黑文给报社，恶毒咒骂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贼心虚，还加了注解，说是"文章估计不会用，但一吐为快"。请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多么仇恨啊！他们把无情地批判他们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铁扫帚"。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这篇以"造反派"口气写的文章，把话说得明白不过了：原来，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着强大的后台——"一直坚定地支持"着的柯庆施和张春桥，亦即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随着《杂家》挨棍，很快的，刚刚复苏的杂文之花，又被寒风吹得七零八落。罗竹风在"文革"后复出，担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名誉主席、《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四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八十五岁。

"大写十三年"的吹鼓手

巴金、熊佛西、丁玲、丰子恺、郭绍虞、刘大杰、黄佐临、张骏祥、沈浮、瞿白音、应云卫、王个簃、林风眠、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叶以群、吴强、孙峻青、任桂珍、瞿维、唐耿

良、蒋月泉、张乐平……上海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聚集在延安西路二〇〇号文艺会堂。那是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元旦联欢会在那里举行。

元旦联欢会年年举行，而这一次上海文艺界头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齐了，却是空前的。因为事先接到通知，说是“会议重要，务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联欢会，怎么忽然变得“重要”起来？

一月六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的报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 最使大家高兴的是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也应邀来到，和大家一同联欢、共迎新春。陪同柯庆施同志参加联欢会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等。当柯庆施同志出现在演出大厅中时，全场热烈地鼓掌欢迎。主持联欢会的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熊佛西当即代表大家邀柯庆施同志讲话……

原来，“会议重要”，全然因为柯庆施要发表讲话。

这一回，柯庆施确实说了一番至为重要的话，以至上海文艺界为此“学习”了多日。

柯庆施说：

>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的讲话，概括为一个崭新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这是一个充满"左"的色彩的口号。所谓"大写十三年"就是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一月六日，《文汇报》报道了柯庆施的讲话，顿时在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实，"大写十三年"这口号，与其说是柯庆施提出来的，不如说是柯庆施和张春桥一起提出来的。姚文元"紧跟紧追"，成为这一口号的最积极的鼓吹者。

你一点，我一条，在张春桥的家里，姚文元跟张春桥拼凑着"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姚文元是个从"左"如流的"理论家"。虽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说过跟"写十三年"背道而驰的话：

> 今天写作的题材是应当广阔的——限定在工农兵之内是不够的。从古至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从五四到解放，从神仙到精灵，从官僚到资本家……各种人、各种题材，只要有社会意义和美学内容，都可以。(《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
> 我们主张创作的题材不受任何限制。(《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
>
> 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是异常广阔的，决不能机械地说只有描写生产的戏才能教育工人，描写战争的戏才能教育战士，凡是用进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和某个角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艺术，都能对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欢《董存瑞》，也喜欢《天仙配》，就因为那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

然而，这些理论眼下已显得过时了。就像磁带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赶紧顺应风向，为了“写十三年”大声鼓噪——作为“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向来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一切为了“紧跟”，“紧跟”便是一切。

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谈一谈。”

当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

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三十二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谈’，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提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吧：

“一、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德彪西，怎么会“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国弗兰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钢琴音乐》一书中所言：“德彪西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通过声音与清晰的幻梦打着交道。”德彪西的强烈的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乐坛。他的歌剧《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曾被推崇为印象派音乐的颠峰之作；他的钢琴曲《版画》、《欢乐岛》、《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则被视为印象主义精品。

德彪西也写音乐评论，署笔名“克罗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绍他的小册子就用《克罗士先生》作为书名。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评论，德彪西都充满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他不是一个鹦鹉学舌式的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他，在音乐王国独树一帜——这一点，不论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敢于创立自己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本来，姚文元与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个今人，一个古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一个“金棍子”，一个音乐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着德彪西的。

原来，柯庆施到北京去，见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柯庆施回到上海，把毛泽东的话，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马上把“行情”告诉了姚文元。

善于看“行情”写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脑袋，觉得有点麻烦：毛泽东并未讲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译的西方著作！

怎么办呢？姚文元来了个持箭找靶！

好在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一系列特定的条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说明那些书大约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于是乎，姚文元抱来一堆最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一审视着。

蓦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克罗士先生》，成为他的理想的箭靶——该书编者所写的“内容提要”，正是“没有阶级观点”！

尽管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到过德彪西，惯于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却已在那里向《克罗士先生》开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翌日，《文汇报》编辑部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耳机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不懂装懂”，并要求约见《文汇报》记者……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谁敢如此大胆地向姚文元挑战？

上海乐坛主帅贺绿汀也！

贺绿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是由革命与音乐二重奏所组成。他的音乐造诣，使他一读姚文元的文章，便斥骂姚文元“狗屁不通”；他的革命生涯，炼就他一身硬骨头，敢怒敢言，不把棍子放在眼里。

贺绿汀，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他本名贺楷。后来，他的三哥贺培真为他改名贺抱真。贺培真即贺果，毛泽东当年的中学同学。

笔者多次采访了贺绿汀，曾问及“贺绿汀”名字的来历。据云，那是他一九三一年二月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取的假名，后来竟一直沿用下去，弄假成真。他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我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他，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便化名贺如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创作了《暴动歌》。此后，他的名作《牧童短笛》、《游击队歌》以及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写的插曲，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接到贺绿汀的电话，《文汇报》记者萧庆璋便应约前往上海市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揿响了贺宅的门铃。

萧庆璋曾作如下回忆：

“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把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了笑话。’”

萧庆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贺绿汀的话：

“姚文元摆下了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因为他所引证的书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有的是没有把原意弄懂，有的原意是反面的、讥刺的，而他却当成是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大大加以驳斥，这岂不贻笑大方！对于外国的音乐作品、音乐书籍，我们应该多介绍、多研究，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太少了。刚出一本新的书，还没有看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劈头盖脑的一棍子打下去，实在对我们

不利。此风绝不可长……”

贺绿汀还对姚文元作了很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而德彪西的东西，欧洲已有许多人研究，也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看见我们这样的文章，会觉得我们学术研究肤浅，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是这样。这影响不好……”

如同竹筒倒豆子，贺绿汀是个痛快人，向记者说出了心底的话。

萧庆璋听罢，建议贺绿汀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贺绿汀爽快地一口答应。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刊出了《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署名“山谷”。“山谷”是贺绿汀的笔名。

贺绿汀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不懂装懂的“批评家”：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文元同志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贺绿汀毕竟是音乐的行家里手，一口气指出姚文元的十几处错误，诸如：

“姚文元同志对书中题为‘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不能不使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姚文元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见……”

贺绿汀在指出姚文元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一针见血地正告这位“批评家”：

“我们知道，姚文元同志是有影响的批评家，我虽然对他的文章读得不多，他的批评文章是有定评的。不过我认为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姚文元同志对一九〇

〇年前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活动不很熟悉，对印象派音乐与绘画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恐怕也不见得完全清楚。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下一点研究功夫，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批评是起指导作用的，所以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力求正确。”

贺绿汀的骨头是硬的。在发行量甚众的《文汇报》上，指名道姓地批评“金棍子”，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

消息飞快地传进柯庆施的耳朵里。他拍着桌子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在报上狠狠批判！要抓住他，他是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有着后台的撑腰，姚文元挑起了音乐界的一场大论战。

于是乎，贺绿汀被用绳子跟德彪西捆在一起，同受批判。在《文汇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这场论战的文章；一九六四三年六月，两篇；七月，三篇；八月，三篇；九月，四篇；十月，四篇；十一月，两篇；十二月，两篇；一九六四年一月，一篇。

这场“大批判”，还从《文汇报》扩大到《光明日报》、《人民音乐》。

诚如贺绿汀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姚文痞与德彪西》一文所言：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大批判’，首先把我当活靶子来打，同时还想钓出一大批‘鱼’来批，为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开路。

“文章大都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姚文痞还亲自上阵指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汇报》上，他写了一篇化名‘群山’的臭文，除了替打手们打气之外，自己无法进行回击，真是‘银样蜡枪头’。九月九日，他又化名‘铭人’在该报上登出《从

德彪西想到星海》的文章，把冼星海的文章抬出来作为炮弹……”

贺绿汀痛斥姚文元，被张春桥称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在“文革”刚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以整版篇幅刊载长文：《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

从此，贺绿汀受尽折磨，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监狱。他的爱女贺晓秋，年仅二十八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夜被逼自杀。贺绿汀在狱中度过了五年多。直至一九七三年，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去北京找毛泽东，要求释放贺绿汀。尽管张春桥曾扬言：“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毛泽东还是下令解放贺绿汀，张春桥不得不照办。直到贺绿汀出狱，回到家中，问起怎么不见爱女贺晓秋，才知她早在五年前已愤然离世……

“女客人”把上海作为“基地”

差不多就在进行德彪西大论战同时，姚文元又和张春桥一起，投入“大写十三年”的论战。

在一九六三年初，当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北京保持着沉默。

这沉默并不意味着默认。恰恰相反，沉默意味着反对。

大战前的沉默。张春桥手中握着《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却并不急于抛出。

就在这时，从北京来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于上海第一流的高级宾馆——锦江饭店，并不抛头露面。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红都剧场的灯光渐渐暗下来，大幕

徐徐拉开。

这时，一个戴着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镜的五十岁的女人，在一个也戴着眼镜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剧场。坐了下来。

舞台上，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没有上台祝贺，没有接见演员，没有呱啦呱啦发表讲话——未等谢幕，那女人便又悄然离开了。

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众场合惟一一次不露面的露面。

“女客人”——这是张春桥规定的江青的代号。

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张春桥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转达了“女客人”的话。姚文元不断地思索着：“基地”意味着什么？

四月，乍暖还寒的北京。在新侨饭店的会议室里，终于打破了沉默，开始了一场大战前的前哨战。

中宣部在那里召开文艺工作会议。

弥漫在会议室里的烟雾，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烟，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烟。

两军对立，气氛显得那么紧张。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开火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击着。

他们齐轰“大写十三年”。他们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

张春桥“后发制人”。等到排炮过去，这才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为“大写十三年”辩解。他，一条又一条，不厌其详地列举“大写十三年”的“好处”。不多不少，正好十条！他终于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肠凑成的《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

虽然张春桥振振有词，却处于“光荣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宣部不买他的账。要想让周扬、林默涵等俯首听命，谈何容易。

当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向柯庆施汇报了在新侨饭店遭到的“围攻”。姚文元在侧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着瞧！”柯庆施青筋怒张，用手拍着桌子——这向来是他激怒时的习惯动作。

几个月之后——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柯庆施的一份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据。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成为“最高指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十多天，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张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在会上响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一回，柯庆施、张春桥的腰杆挺得笔直。因为毛泽东的批示说“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而柯庆施、张春桥立即在上海推出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喊出“大写十三年”，实实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紧跟”。他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了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轻的一代〉》。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是这样谈及的：“一九六三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江青则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第九章　评《海瑞罢官》

江青南下物色“棍子”

九六五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

冒着黑烟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列车，在漫天皆白的银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车厢里达到了“过饱和”状态。处于一年一度的客运高峰之中的列车，连过道里都像筷子笼一般站满了旅客。

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里，门窗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白色窗帘。室内温度按照“指标”，保持二十七摄氏度。整节软卧车厢，只住着一位旅客和她的几个随从。

那惟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从不坐飞机。她生怕会从天下突然摔下来。她总是坐“公务车”来来往往，每一次都要独占一节软卧车厢。

她斜靠在舒软的床上，顺手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艺》，又一次看了起来。她细细捉摸着上面登着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作者为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

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这次上海之行的经过：

“首先，我要向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庆施、江青的组织下，五月六日的《文汇报》，发表了梁璧辉（即俞铭璜）的长文《“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编剧为孟超，剧本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剧本》杂志。上演之后，廖沫沙（署笔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热烈赞扬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于柯庆施，发表了批驳“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打响了“大批评”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标便是眼下放在茶条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艺》。她不由得记起那不愉快的一幕……

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

就认为问题严重。她在观剧过程中，紧绷着脸。看完之后，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

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

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就绝不会轻轻放过。

当然，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起初，想在北京就近找“笔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风云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个。出乎意料，他竟没有答应。

于是，她又求助于上海。如她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发言中所言：“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

她，对上海确实怀着特殊的感情。来来去去，多少次奔忙于京沪道上。说实在的，她该算是个“老上海”。她永远不会忘记自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过的岁月：山东姑娘李云鹤，在十里洋场腾飞，成了电影演员蓝苹……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她把上海当作了“基地”：“样板戏基地”——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剧《白毛女》这三块“样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经对《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以《海瑞罢官》开刀。“样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张春桥成为架在她与柯庆

施之间的一座“桥”。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张春桥时而在北京、时而在上海见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张春桥研究上海京剧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张春桥来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张春桥一起接待山东《奇袭白虎团》剧组，指定“张春桥挂帅”，修改此剧；

十一月，江青来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剧团改编为京剧，指定“张春桥负责组织工作”；

……

火车急急南行。上海已在准备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声称，此行是为了观看上海京剧团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海港》）。惟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担风险”批《海瑞罢官》

上海香山路九号那幢小洋楼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灯光。

姚文元从底楼来到二楼。那里本来住着张春桥，如今住的是《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

“王维同志，向你请个假。”姚文元对王维说道，“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并没有说明写个什么东西，也没说清楚要多少时间。

“你去好了。”王维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知道，姚文元说的“市委”，就是指柯庆施。既然姚文元不愿说写什么东西，他当然也就不便多问。

姚文元下楼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从此，半年多光景，他几乎不去《解放日报》社。虽说王维跟他同住一幢楼，平常也很少见到他。即使见到他，他从不说起在写什么，王维也就不问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惟有江青知，柯庆施知，张春桥知。

自从柯庆施和张春桥确定了姚文元的“笔杆子”，自从“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给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这一回干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虽说他的“棍艺”已经颇为娴熟，无奈只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于明史一窍不通。他暗中调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为他查阅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于钻营，竟由此发迹，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负责人。“文革”中跃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尽管此事“对外保密”，姚文元却多次骑着自行车在夜间来到林村，求教于父亲姚蓬子。姚蓬子正闲得无聊，自然尽力为儿子翻查海瑞资料——虽然开初姚蓬子曾数落过儿子“多管闲事”、“海瑞有啥批头”，但是听儿子透露了此事的“来头”之后，姚蓬子立即“急转弯”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节空荡荡的软卧车厢北去不久，柯庆施南下广州疗养。他在一九六四年春发现肺癌，作过切除手术。

三月二十三日，柯庆施来到成都，跟朱德、贺龙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宴请朱德、贺龙、柯庆施。

柯庆施吃得较多。临睡前，又吃了花生米。当夜，腹部剧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然成都医生全力抢救，上海医生坐

专机赶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带来名医从北京赶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江青闻讯，大为震惊——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从此，张春桥成了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七日，张春桥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庆施之死。她反反复复说道："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明里搞样板戏，暗中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写作，仍处于"绝密"状态。写了一稿又一稿，为了保密，不能在长途电话中交换意见。借着讨论样板戏，江青和张春桥南来北往，一时间是那样的频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头"之后：

五月二十九日，张春桥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谈《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加工问题"；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剧《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海港》剧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

……

惯于吹嘘的江青，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的面（陈毅也坐在下面），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如此"光荣而艰难"的"历程"；

"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

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

江青的逻辑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阴谋，不可告人，才“对外保密”，却故弄玄虚，仿佛在搞“地下工作”！

“火力侦察”

一辆小轿车驶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门，沿着淮海中路，朝外滩飞奔。

车上坐着四位乘客：张春桥，姚文元，《解放日报》社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

张春桥绷着脸，不发一言。

姚文元虎着脸，一本正经。

魏克明前几年开过刀，身体瘦弱，显得疲惫。

王维虽然爱聊天，此刻见众人不语，也沉默着。

张春桥吞云吐雾，车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一片寂静，惟有发动机在轰鸣。

两位“老总”（总编）应召而至康平路，只听张春桥说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报》社排印。要求是“绝对保密，不许排错一个标点”。“老总”并不知道要排印什么绝密文件。不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出马，足见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维猜想，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时间写的。要不，他为什么坐在车上？

突然，张春桥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问道：“老魏，你们《解放日报》为什么登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

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时竟讲不出话来。王维也为之一怔：张春桥为什么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报》社的印刷厂，经过专门挑选的排字工人已在那里恭候了。

姚文元从拎包里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两位“老总”掠了一眼文章的标题，不由得一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哦，怪不得刚才张春桥在车上问起了《解放日报》上关于海瑞的文章!

两位“老总”亲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纪律和要求。

第二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十六开本，用上等道林纸精印，确实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印错。

张春桥从抽斗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名单，交给秘书。名单上方天头，有张春桥用铅笔写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两天之后，名单上的人物全都应约而来。来者大都白发苍苍，皆为史学教授、专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

张春桥笑容可掬，在门口迎候，极尽谦卑之态。

会议准时开始。张春桥首先致词：“今天，诸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

张春桥仿佛成了谦谦君子！为了使与会者畅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专家们真的以为是征求意见，也就直言不讳，几乎异口同声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学富五车之士，成了张春桥的网中鱼。

两位记录员刷刷地记满了一页又一页横格纸。任凭专家、学

者们指着鼻子骂，张春桥依然保持一张微笑的脸。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指出："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本来有点顾虑，看到大家都"畅所欲言"，也就对"清官"问题直抒己见，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

与会者反映最为强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类"挂钩"，生拉硬扯……

张春桥满脸堆笑送走学者们之后，手里拿着厚厚的会议记录，对姚文元说："'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来之后，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据姚文元自称，已是第九稿了！

不过，张春桥的说法与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在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谈话时，说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的经过：

"姚文元与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无关。从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两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给市委。当时主要是为了搞好市委内部关系，也为了我不搞个人突出，谦虚。

"其实，《评〈海瑞罢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体的是江青同志指导我们搞的。

"至于《评"三家村"》，我一手经手的，与姚文元一起搞，

最后的稿子才送市委。……”

陈伯达在晚年则这么谈及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

> 我至少有两次听到江青公开大肆吹嘘姚文元，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着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这是真的。因为在姚文元的文字发表之前，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好像别人都不知道。
>
> 据江青说，开始她并不和姚文元见面，只是通过张春桥和姚联系。她和姚文元见面是较后的事。
>
> 江青替姚吹嘘，表明姚的文字内容就是她授意的。开始吹嘘姚文元的时候，总会有点顾虑，因为姚文元的父亲是著名的叛徒、特务。当姚蓬子死后，吹嘘就变得大胆，说姚跟姚蓬子没有什么关系。姚是他母亲带的。
>
> 江青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同人们的来往，我没有打听过。在柯庆施死前，我只隐约知道他们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设想的许多事，主要是文艺界的，但这并不排斥他们议论其他问题。

“歪批《三国》”

就在“火力侦察”之后的几天——十一月十日，上海莫有财饭店里，人们手中拿着当天的《文汇报》，宴会成了讨论会。

这天，吴晗的老朋友、中山大学的梁方仲从北京路过上海回广州。上海史学界人士聚会于莫有财饭店，为梁方仲洗尘。

非常凑巧，这天的《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席间中心话题。因为参加宴会的好多位教授，都曾出席前几天张春桥主持的“征求意见会”。

“真是岂有此理，一字不改！你一字不改，开什么‘征求意

见会'?"

"强词夺理，歪批《三国》!"

"胡闹!"

饭店里一片斥责之声。

梁方仲没有看过大字本，匆匆阅毕《文汇报》，失色道："这下子，辰伯兄（即吴晗）要吃苦头了！前天，我们在北京握别时，他还喜笑盈盈，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即将临头，真是'自古经纶足是非，阴谋最忌夺天机'!"

"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途穷天地窄，世乱生死微!"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诗句，道出古往今来的真理!"

……

岂止是莫有财饭店里众书生议论纷纷，怒火中烧；凡是这天的《文汇报》所到之处，唾骂之声四起。

姚文元挨骂活该，《文汇报》无端蒙尘：就在见报的前一天——十一月九日，张春桥突然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交给一册大字本，指定明日全文见报。陈虞孙，上海资深的老报人。在《文汇报》，上上下下都尊称他为"陈虞老"。笔者曾为写作本书采访过"陈虞老"。他还写一便条，介绍笔者去采访《文汇报》社的全一毛先生——因为全一毛先生当时是他的助手，经历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全过程……当陈虞孙接过大字本之际，尚不知要登的是什么文章——诚如那天张春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排印大字本之际，魏克明、王维不知姚文元的拎包里装的是什么稿子。

大字本在《解放日报》排印，而公开发表却在《文汇报》，曾使许多报人费解：《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姚文

元的文章既然“来头不小”，为什么不在《解放日报》刊出？

张春桥看中《文汇报》，恰恰是因为这张报纸历来有着“民间报纸”色彩，“便于展开讨论”！

“《文汇报》是一张民间的报纸，发扬民意是我们神圣的责任……有话大家来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论男女老少，人人可以投稿。”早在解放之前，《文汇报》便用这样的办报宗旨取信于读者。

在一九五七年那不平常的春天，《文汇报》又以“资产阶级方向”闻名于全国。

正因为这样，江青和柯庆施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便选择了《文汇报》发表。这一次，江青和张春桥又一次看中了《文汇报》。虽然这时的《文汇报》早已不是什么“民间报纸”，但是它毕竟在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影响。

十一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对《解放日报》来说，几乎是破例的：历来是《文汇报》转载《解放日报》的文章，而颠倒过来的转载惟有这一次。张春桥处心积虑，每走一步棋都别出心裁，玩弄权术是他的专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历史性著作”。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一不反复“学习”过这篇“宏文”。然而，岁月的流逝毕竟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何况年轻的一代很少有机会从尘封多年的报纸上翻阅此文。原文过于冗长，无法全文照录。现摘录此文的一头一尾，也算是“录以备考”。

摘录此文的开头一段，便于今日的读者了解一些背景材料；摘录此文的末尾一段，因为那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争论最激烈的所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中略，下为结尾）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

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如果说，在反胡风的时候姚文元不过是个小棍子，在反右派时是棍子，那么，此时已成了江青、张春桥手中的“金棍子”了！

当姚文元还只是“小棍子”、“棍子”的时候，并未引起海外

的注意。然而，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随着他成为“无产阶级金棍子”，海外才注意起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位新角。

当时香港报纸称姚文元是“姚苏凤之子”。姚苏凤乃当年鸳鸯蝴蝶派作家。这表明海外最初对于姚文元其人十分陌生。

后来，香港报纸才披露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然后大登姚蓬子当年叛变中国共产党之事，使正在非常得意的姚文元变得十分尴尬。

《文汇报》的太上皇

唐朝诗人陈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诗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自从《文汇报》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张春桥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发号施令，规定了六条“纪律”，把了解各界人士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为“绝密工作”。

于是，《文汇报》社印刷厂里，忽地冒出了个闲人莫入的“第二车间”——保密车间。

于是，《文汇报》社指定了专门班子负责“《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于是，《文汇报》社奉命逐日向张春桥报告：

一、哪家报纸在第几版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二、各地、各界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必须随时报告北京动向）；

三、把重要内容编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

于是，《文汇报》奉命执行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编辑方式：凡是准备发表的有关《海瑞罢官》的

文章，必须事先由“第二车间”用老四号大字排出，送张春桥阅定，再退回报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样后，再送张春桥，待他签字后才付印。

于是，张春桥完全控制了《文汇报》，成为《文汇报》总编的太上皇。什么“民间报纸”，那只是张春桥借以蒙骗读者的幌子！

据陈虞孙回忆，当时张春桥几乎每天都要他去汇报情况，然后对《文汇报》的工作作出一条条指示。可是，张春桥又不允许陈虞孙作记录。

据全一毛回忆，当时陈虞孙一回到报社，马上找他，把刚才张春桥的指示复述，由全一毛记录下来。

所幸陈虞孙的记忆力不错。所以，他能够把张春桥的种种指示，一一复述，记录在案。因为倘若没有文字记录，很容易疏漏，张春桥怪罪下来，那就麻烦了……

关于陈虞孙这种凭借记忆复述上级指示的“本事”，《文汇报》唐振常先生所写的悼念“陈虞老”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传达市委领导讲话的本领。那些年，市委抓报纸极紧，他常被市委叫去谈话，回到报社，总是立刻召开小型会议传达贯彻。他从无笔记本，依然如作报告一样，不过一两张纸，记了几条，然后原原本本传达。作报告是抒发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难。传达则是讲述别人的话，只那么几条杠杠，他照样长篇大论，讲起来活灵活现。这不单是记忆力好的事，实已将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脑中，用办报纸的行话讲，叫做吃透领导意图。当然，所说当非原来词句，但其内容则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传达完，然后发表他自己的贯彻意见，提供会议讨论。陈虞老的冰雪聪明，大多类

此。”①

作为《文汇报》多年的总编辑，经历过多少沧桑。他手下记者如云，却几乎不接受采访。笔者不顾浅薄，在一九八六年几度访问年已八旬、资深的“陈虞老”。

步入他的家，见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幅字：

“结缡六十春秋，历经家难国难党难，正老境如蔗，忍撇我先归；

“抚育八个子女，欣看自立自强自爱，恰青山满目，应知君无憾！”

落款是“八十孤叟虞孙”。

他说，这是纪念他的故去的夫人而写的。

他的床头，挂着一帧周恩来的照片。

他说，《文汇报》处于风尖浪口，总编辑这把椅子是很难坐的。他说起他的前任徐铸成，在一九五七年下台。他在这样严峻的历史关头，接替徐铸成，出任《文汇报》总编辑。

他说，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是柯庆施。柯庆施这个人如何评价？如果没有柯庆施，江青未必能够把上海作为她的“基地”。在这中间，张春桥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说，江青第一次用“开炮”，是关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他说，姚文元本来只是《文汇报》的普通作者。后来就不得了了，碰不得。沙叶新只“碰”了他一下，“棍子”就朝他打过去。

我问起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经过。他摇头。他说：“那稿子交到我手里之后，第二天就一字不易在《文汇报》上全文发表。我不知道这稿子怎么来的，改了多少次。我只知道‘来头’不小。我是‘奉命发表’。”

---

① 唐振常：《漫谈陈虞老》，《上海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他说，关于这一“公案”，在《文汇报》，除了他之外，要算全一毛最清楚。他为我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全文如下：

——面致《文汇报》全一毛同志

一毛同志：

叶永烈同志来找我几次，为的是准备创作有关海瑞罢官前后的小说。

我确实有点爱莫能助。因为我无法原原本本地讲这场故事。特别无法像“文化大革命”中作交代那样，经得起推问。

因此我就推荐了你去承当这个差使。你有大量笔记，特别是你有惊人的记忆力。

当然，这篇历史小说，到底应如何写，还是有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决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可以来找我。

我绝无“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之意。

专此即颂

撰安！

虞孙

九月五日

有了“陈虞老”这一“手喻”，全一毛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讲述了当年的深层内情……在“太上皇”张春桥的控制下，《文汇报》成了张春桥的耳目，张春桥的喉舌！

张春桥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战略”；

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写作过程中，曰“对外保密”；

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开“征求意见会”，曰“火力侦察”；

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初，曰“引蛇出洞”。

怎么个“引蛇出洞”？

张春桥“指示”：在《文汇报》上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以便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虽然张春桥打起了“百家争鸣”的旗号，虽然《文汇报》编辑奉张春桥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动约写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非常令人遗憾，一开始无人出马“争鸣”。大抵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阴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那场运动，已有了前车之鉴。在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人们只是在莫有财饭店的场合那样私下议论，未敢落笔写批姚文章。

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响。没有反驳文章，难演“争鸣”这场戏，无法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张春桥居然为没有人写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见《文汇报》总编陈虞孙。

“你们把读者来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个‘反对者’？”张春桥出了新主意。

于是，编辑们奉命逐封检查最近的读者来信。查来查去，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两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骂姚文元，没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请公安局帮忙才能找到写信者；另一封倒不错，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但是“理论水平”不高。最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资历”未免太浅。

不过，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张春桥交账。《文汇报》的编辑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那封中学生的来信，送往“第二车间”，用大字排印出来。

出乎意料，张春桥见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找来，对他进行“辅导”，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

那位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的被请到《文汇报》社，真的受到“辅导”。

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没有吃过一九五七年的苦头，不知道什么“阳谋”、“阴谋”，马上根据“辅导”意见，写出一篇言词激烈的批姚文章……

中学生马捷成了批姚先锋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采访了马捷。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写那篇批姚文章时，他不过十七岁！

马捷的真名叫马以鑫。

既非高干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他原先住在南市区斜桥附近大林路。父亲在某水产供销公司当职员，母亲则是居委会干部。

当年，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大约从初三开始，他对文学产生兴趣，课余不仅喜欢看文学作品，而且广为浏览各种报刊、杂志。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的“雄文”在《文汇报》上冒出的当天，马以鑫就细细地“拜读”了。对于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坛上东征西讨，颇有背景。不过，读罢那篇“雄文”，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问号：海瑞向来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么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对象？再说，批判吴晗

的《海瑞罢官》，怎么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简直在那里“歪批《三国》”！

他思索着。忽地，他产生一个念头：写一篇稿子给《文汇报》，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见！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十一月十四日，他一早就赶到上海图书馆去。他那“注释”中所引用的许多学术论文，就是这个星期天查到的。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摘录。

回家后，花了四五个小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也谈〈海瑞罢官〉》。他连草稿也没有打，信手写在印着横条的活页纸上。

写罢，他看了一遍，觉得这样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灵机一动，想出个笔名“马捷”。

他还给报社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敬业中学高二学生，出于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写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实姓。

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进了邮筒。

约摸过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来找马鑫：“你给《文汇报》写了稿子，是吗？报社给学校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万万想不到，《文汇报》居然会这么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为，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来稿，也许会被扔进编辑部的废纸篓。如今，竟要他去报社，且要作修改，这显然意味着要发表他的稿子。

他平生还是头一遭去《文汇报》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当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里该找谁，因为打电话给学校的人没有留姓名。当他来到圆明园路，跨进《文汇报》大门，说自己是敬业中学生的学生，一个似乎早就等在那里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说道：“跟我来！”

马以鑫随着他走进大楼，来到一间办公室。马以鑫注意到门口挂着“总编办公室”字样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总编辑亲自接见他这个中学生，看样子对他的稿子格外重视！

一进去，总编辑手中正拿着他那写在活页纸上的稿子，每一页差不多都用红铅笔画过许多道道。

总编辑询问了马以鑫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资料是怎么查的。这时，马以鑫壮起胆子，逐一作了答复。从他那不假思索、流畅的答话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确系他写的，并没有什么人“辅导”。

总编辑谈了对稿子的意见，说写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紧时间修改，明天一早送来。

走出《文汇报》社，马以鑫的情绪处于异常兴奋之中。因为“明天一早就送来”，意味着《文汇报》会很快发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视，又如此急用，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着那一叠画满红道的活页纸回到家中，当晚便重写了一稿。他把稿子删短，压缩。想到此文要公开见报，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锐的字句删去了，改写成一封读者来信，说是一位中学生读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见云云。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报社，报社还未上班呢！

过了一个多星期——十一月三十日，上午，马以鑫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见《文汇报》以显赫的位置刊出了他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在报上发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紧了，急剧地跳着。他读着报纸，才看了几句，便傻眼了：怎么，报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稿从报社取回之后，没有寄出，报社从哪儿弄到了他的初稿？

天真烂漫的他，哪里知道报社讳莫如深的内幕：

那是因为，马以鑫把意思领会错了，在修改时反而抹去了那些锋芒毕露的词句（也是因为他修改时处处想及此文要公开见报，不像写初稿时图一泄为快）。

张春桥没有用修改稿，指令仍用初稿——马以鑫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初稿曾用大字排印过。正因为这样，这位幼稚的中学生会对报上登出他的初稿迷惑不解……

经过张春桥这位幕后导演的一番惨淡经营，费煞苦心，《文汇报》上终于出现了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通栏标题之下，刊登着"编者按"和署名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一文。

"编者按"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这才定下来的：

"编者按：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十一月十日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单位已进行了几次讨论，有的正在展开讨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讲座。现在把马捷同志的来稿发表于下。"

这段“编者按”，是张春桥、姚文元“引蛇出洞”的“广告”。令人惊讶的是，惟恐人不知，这段“编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连重复刊登了六天，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空前奇迹。惟有广告，才会如此重复刊登！

马捷的文章，被放到空前显赫的地位。在“编者按”中并没有说马捷是中学生，作者名字前也没有冠以“上海敬业中学学生”，张春桥在巧妙地玩弄遮眼法：“马捷”这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生疏的，谁也不会以为他是中学生，而会把他看成是某一专家学者的化名！不言而喻，这就大大提高了这篇反驳文章的声望和煽动力，才能起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马捷的文章，火药味浓浓的，简直是指着姚文元的鼻子予以痛斥，骂得那么痛快：

>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
>
>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
>
>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说：“不论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

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昧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请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优秀形象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公干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士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象许云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马捷在毫无顾忌地逐点批驳了姚文元之后，文末，也给姚文元“上纲”了：

>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
>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虽说马捷的文章，是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抛出的，但这位中学生毕竟是勇敢的。“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心中的诡计？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内心的对“金棍子”的无比憎恶。虽然他上了张春桥的当，而他的纯真、他的正义感是可嘉的……

此处顺便提一下马捷——马以鑫的“后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文章以笔名“马捷”发表，敬业中学还是轰动了，人人皆知是马以鑫写的。好心的老师们看了马以鑫那没遮没拦、直言不讳的文章，都为这位正直而颇有才气的学生捏了一把汗。

马以鑫在文章见报的当天，给《文汇报》社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修改稿，却登初稿。他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我们需要！”

满校风雨，马以鑫成为全校关注的人物。随着“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声越来越响高，各报纷登批《海瑞罢官》的文章，马以鑫也就成了校内的批判对象。

最初是开班会批判他。接着，学生代表会批判他。再接着，大字报围攻他，有的大字报甚至称他为“反动学生”。

本来正在争取入团的他，入团成了泡影。连红卫兵组织都不

许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汇报》社看大字报，吃了一惊。大学报“揭露”，那位总编辑如何“扶植反动学生马捷”，“帮助他修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还说“马捷”这笔名也是那位总编辑取的，如此等等。马以鑫看了，如堕五里云雾之中！惟有一点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级”，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马以鑫到《文汇报》看大字报的消息传开以后，学校里贴出了“勒令”，不许马以鑫“乱说乱动”，不得“私自外出”。

当红卫兵们去“大串连”的时候，马以鑫被“勒令”下乡，接受“改造”。

接着是“勒令”马以鑫交出日记，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记上写的都是“闪光的语言”，查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所幸马以鑫的父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他本人又年纪轻轻，平时还算积极，因此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成为什么“分子”。那“反动学生”的“头衔”，也还只是大字报上说说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光景，一个陌生的男人忽然出现在马以鑫家中。此人大约三十五岁上下，瘦瘦的，中等个子，他自称是《文汇报》的，却没有拿出任何证件。他说报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马以鑫交出来。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未问来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从此，这份写在活页纸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动员上山下乡时，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队的名单。不过，体检时发现他有肋膜炎，以病休名义留下，转到街道。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动员上山下乡，他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到黑龙江嫩江农场劳动。

原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但同去嫩江的有敬业中学的同学，“马捷”之事又在那里传开来了。好在那儿毕竟不是张、姚的“根据地”，人们当作一桩新闻听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农

场领导竟然因此得知有一个能写文章的马以鑫，把他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编编写写，当个“秀才”使用，这是马以鑫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他，经过磕磕碰碰，棱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诚惶诚恐地完成领导交给任务。这样，在北国边陲，他度过了平平静的四个春秋……

大学生王复兴奋笔批姚

在本书初版本出版之后，一九九四年九月八日，笔者收到中原油田采油技校高级政工师王复兴的来信。在信中，他告诉笔者，他有着与中学生马以鑫十分相似的经历：

“大作《姚文元传》中写及中学生马捷成了‘反姚先锋’，我反复读了多遍。本人有着与马捷同志相同的经历。当时，我是河南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不能这样否定——与姚文元同志商榷》，受到了原河南省委、河南大学当时领导人的迫害……”

当时，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奋笔批驳。他化名“宋都”，把文章寄到北京的《光明日报》。意想不到，《光明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发表了他的文章！此后，他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反革命”……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复兴是这样向笔者叙述自己的这一不平常的经历：

> 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不可能知道姚文元文章出笼的历史背景。但是，青年学生天真，没有包袱，无所畏惧，确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管你是什么大人物、小人物，你说得不对，就要和你辩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

为了捍卫真理，我就到图书馆里翻阅《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有关海瑞的历史资料及批判姚文元的理论根据。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化名“宋都”（因为学校在开封，开封是宋朝的国都），写出了《不能这样否定》的文章，寄往北京《光明日报》社。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会发表。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的《光明日报》来了之后，我发现刊登了我的文章，当时学校轰动了，好多同学都争看那篇文章。

我把那篇文章寄到了我的母校——河北省荥阳高中，母校的教导主任李涤平老师在全校大会上宣扬了我的文章，认为学校毕业生中出了一个才子。

一九六六年四月，原中南局书记在广州召开中南六省宣传部部长会议，在会上点了我的名，说开封师院有个学生叫宋都，发表文章反对姚文元，河南来的同志回去查一查。

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连夜从广州坐飞机回到郑州。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开封师院党委的一个秘书，把我从学生寝室里叫了出来，问我《光明日报》登的那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

第二天晚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进行审问，问我家庭是什么出身，我说是贫农；问我父亲是干什么，我说是党员；又问我都干过什么，我说我从小上学，高中毕业后当过兵，当了兵又来上大学。

他又问我那篇文章是谁让你写的，有没有后台？我说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出问题我自己负责。

接着系里让我写检查，又派人到我的家乡调查情

况，全系开大会批判我。

他们抓不住我什么问题，就从笔名上无限上纲，说“宋都”要复辟封建主义，要恢复宋朝的国都。就连我不爱吃鸡蛋，也成了他们攻击的把柄，说我腐化堕落，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连鸡蛋都不吃，真是无稽之谈。

后来，开封师院党委把整我的材料报到了河南省委宣传部，把我定为反动学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文化大革命”在开封师院爆发，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院第一炮就瞄准了我。一夜之间，前庭后院，墙上、地上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复兴”，“打倒小邓拓王复兴”，“打倒小吴晗王复兴”，大约有一万张之多。一夜之间，一个本来不出名的青年学生居然成了全校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诬蔑为“历史罪人”。

在我的母校，曾经宣扬过我文章的教导主任李涤平老师也成了“黑帮”，宣扬我的文章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我父亲也成了“黑帮”。他们学校的造反派把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贴了出来，说什么“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反革命培养的小反革命”。

就连我们一个宿舍里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也不敢和我说话，要和我划清界线，写大字报攻击我。一时间，我成了孤家寡人，没人敢和我说话，没人敢接触我，我走到哪里，后面就有人指指划划，“他就是小邓拓”。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让我参加，说我是“反革命”，上街游行也不让我去，恐怕我玷污他们的“革命行动”。

直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王复兴才获得彻底平反。《关于王复兴同志的平反决定》全文如下：

王复兴，男，现年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河南省荥阳县人。一九六五年考入我院历史系学习，一九七〇年毕业，现任荥阳县刘河高中教师。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开展了对《海瑞罢官》问题的评论，王复兴同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化名宋都发表了题为《不能这样否定》的文章。王复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对反动文痞姚文元对吴晗同志的恶毒攻击和诬蔑表示反对。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及我省几个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的迫害。给王复兴同志强加上“小邓拓”、“小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判，使王复兴同志精神上受到很大委屈。

院党委认为：“上述情况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决定给王复兴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强加给王复兴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塞进本人档案或家属档案中的不实材料都应予清理销毁。

中共开封师范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史》，对王复兴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吴晗同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中文系、历史系一些学生对姚文元散布的反动论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历史系学生王复兴以宋都的笔名，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能这样否定》一文，批判姚文元的论点。他从理论和学术的角度为吴晗申辩，明确指出："姚文元不顾历史的局限，不顾时代的不同，不顾事实性质的不同，而硬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和现代的人民公社、翻案风相提并论，岂不可笑。"他还尖锐地指出，姚文元"自以为是地在自己的审判庭上把《海瑞罢官》判为毒草"，"我们决不允许"。事实证明，广大师生是富有鉴别能力的。

马以鑫和王复兴，作为两名普通的学生，能够鉴别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姚文元是无法一手遮天。"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手握真理的"小人物"必将战胜貌似强大的"大人物"。

终于"引蛇出洞"

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的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

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束世蘩、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教授、学者请来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个个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打抱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

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那阴沉的脸上，硬是贴上了眯眯笑。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十二份。这十二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

“围城打援”

按照姚文元开列的三十几道题目，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旷日持久地在《文汇报》上进行，一整版又一整版，连篇累牍，没完没了。

一出京剧《海瑞罢官》，用得着花那么多的篇幅，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

如果说要“引蛇出洞”，许许多多专家、教授都已表了态，讲了话，写了文章，干嘛还要“深入、持久开展讨论”？

在《文汇报》社，已有人厌倦了，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漫无际涯的“学术讨论”。

张春桥在冷笑，说了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大战还没有开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本是军事用语，即：“进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据守城镇的敌人，诱使敌人从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队来歼灭敌人的援兵。”现在，张春桥把吴晗当

成已被围困于城中的敌人，旷日持久地讨论《海瑞罢官》，对吴晗“围而不歼”。张春桥的目光，注视着城外的援军……

张春桥和姚文元无日不在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说过，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来上海点燃批判《海瑞罢官》之火。

北京，隐伏着吴晗的强大的援军！

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抛出之后，北京保持缄默。

张春桥嘱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单行本，以便到北京散发，攻入那个“盘根错节”、“水泼不进”的“顽固堡垒”。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纸型，就要付印。这时，江青给张春桥来电，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准备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时，北京的报纸终于表态了：十一月二十九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后的第十九天，《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均在第二版转载，并各自加了“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旗帜鲜明”，倾向性极强，口气咄咄逼人。全文如下：

>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认真读一读。
>
> 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形象，要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去“学习”海瑞的所谓“退田”、“平冤狱”以及所谓“刚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强调突出政治，就是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

我们军队的同志，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对哪个阶级有利，对什么人有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凡是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去干。反之，就坚决反对，坚决不干。

希望大家在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议一议。大家还要关心报纸刊物上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中吸取教益。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口气就温和得多，只是说以“双百方针”的精神展开讨论。全文如下：

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现在加以转载。

吴晗同志编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过去本报和《北京晚报》发表过繁星、常谈、方三、史优等赞扬《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

化繁荣的方针。”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问题展开讨论。

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栏里转载姚文，加入“编者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用词严谨，口气平稳，把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讨论来处理。这一“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和彭真审定的。

《人民日报》“编者按”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是这么回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编者按”的报审过程：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

由于姚文元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讽今，联系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

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十一月三十日发表。编者按语措词比较缓和，基本倾向仍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处理。

以后发展的情况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篇文章是江青策划、毛主席看过的。从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报刊已点名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著名学者。①

十二月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转载姚文，加了“编者按”。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大体上保持与《人民日报》“编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一四九——五〇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者按”一致的精神。

《光明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本报今天转载了《文汇报》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事件等重大原则问题，值得大家重视。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编的一出京戏，曾经出了书，也在舞台上演出过。本报也曾发表过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序》和其他称赞这出戏的文章。几年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认为，既然《海瑞罢官》这出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既然人们对这出戏和上述有关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就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为此，我们准备就这出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鸣。

各报不同的“编者按”，反映了各报对于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

张春桥和姚文元研究着北京各报：什么时候转载，登在第几版，尤其是“编者按”的每一句话，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表态。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态度是差不多

的，“编者按”只是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不偏袒吴晗，也不倾向于姚文元。惟有林彪手下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一点也不含糊。

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组织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写，也无报纸会登——要不，只能求助于《解放军报》，而《解放军报》毫无“民间”色彩！

以下是当时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间表：

报纸名称	发表时间
《新华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浙江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建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安徽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江西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解放军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北京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黑龙江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河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河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续上表）

报纸名称	发表时间
《光明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山西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四日
《陕西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
《湖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
《云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宁夏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青海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四川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贵州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西藏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吉林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疆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甘肃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辽宁日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内蒙古日报》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

《南方日报》没有转载姚文，只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发表了《〈海瑞罢官〉宣传了什么?》，转述了姚文元的要点。

《湖南日报》也没有转载姚文，只是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讨论情况的介绍》。

从以上各报转载的时间看：

一、最先转载的是华东各省报，不言而喻，当时华东各省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最先知道姚文元发表的“通天背景”。

二、其他各省报则都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之后，才开始转载的。各省报转载姚文时，无一例外地同时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

张春桥不断地琢磨各地对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内中特别关注北京的动向。

从北京不断传来“秘密”摸来的消息，使张春桥、姚文元如坐针毡。

吴晗，这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居然有恃无恐地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被“围困”了的吴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为他有“后台”，有“援军”。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被视为吴晗的“后台”。彭真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盛怒道：

“姚文元是什么人?！把姚文元和他父亲姚蓬子的材料都给我找出来，我要向毛主席汇报！”

有人密告张春桥、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是《北京日报》“编者按”的定稿者。邓拓在《北京日报》社、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表态：

“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密报！密报！从北京又传来紧急消息：邓拓从北京许多高等学校抽调文史专业教师，组织成一支队伍，要以《北京日报》为阵地，反击姚文元！

密报！密报！就连邓拓面对这些教师所讲的一席话，也被急急地密报到张春桥、姚文元耳中。邓拓很明确地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专门查对过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吴晗的意思。他这样搞很被动，有心人多得很！你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要扣帽子。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

密报纷至沓来。张春桥把主攻目标从吴晗转向邓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机宜：你去准备批邓拓！

这样，姚文元在讨论《海瑞罢官》的过程中，除了以"劲松"、"伍丁"的笔名，抛出《欢迎"破门而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之类"棍文"，便埋头于整邓拓的材料。

张春桥的"围城打援"，终于奏效：《北京日报》登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登出了《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呢?》，署名"向阳生"。

密报！密报！"向阳生"即邓拓！

好，好，另一支援军也出动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署名"方求"。张春桥、姚文元认定，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报！密报！"方求"即周扬！

第十章　拉开“文革”大幕

二月：南北对垒

一九六六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北京，二月三日至七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直属于中共中央领导。所谓“五人”，乃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吴冷西当时为《人民日报》总编。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因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以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惟有康生用手摸着小胡子，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二）方针；

（三）队伍；

（四）左派要互相帮助；

（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中共中央在二月十二日同意《二月提纲》，并向全党转发。

《二月提纲》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五人小组”开会的前一天——二月二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五个人，在召开另一个会议。从二日开至二十日，花了十八天。

会议的主角，便是那位上海的“女客人”。她刚从苏州来。在苏州，她跟正住在那里的林彪、叶群作了一笔重要的政治交易。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当她来到上海，林彪已指令总政治部派出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从北京飞抵上海。

她提议采取“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来开会。张春桥虽不

是会议的正式成员，却不时出现在锦江饭店，三天两头参加座谈。

就这样，经过“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次”，写出了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她讲，别人记而已。记录经张春桥动手修改，又经陈伯达修改，成了那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们简称《纪要》。

《纪要》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它的主题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由于得到林彪的支持，毛泽东的同意，《纪要》战胜了《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尖锐地批评了《二月提纲》，批评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称姚文元是“小鬼”，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说：

>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
>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各地方的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接着，毛泽东又对魏文伯说：

你们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保护左派，左派写文章，谁不犯错误。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改了几次，就是有错误嘛。列宁手稿也改得很多。

许立群专门搜集关锋的文章，不搜集吴晗的文章，要批评。我们要保护左派。尹达有两句话是对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大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历史上都是这样。

我最近同乔木谈，书不可不读，多了也没有用。中国历史书太多了，我们有些军区司令，如许世友他们，也不懂宋元明清，但他们会打仗，会阶级斗争。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他们实际掌握了文、史、哲、

经、电影、出版等等事业，对他们一个是要驳倒，一个是给他们饭吃，有职无权。

我也保过吴晗，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底，他少年时代就拍胡适的马屁。郭老、范老这两个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不懂学术，郭老搞古代史就很有成就。

（有人插话：郭老在海南岛写了两首诗，发点牢骚。）毛泽东说：郭老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他是个杂家，学术批判可找二三个有代表性的人，不可过多。

姚文元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还不如张居正。海瑞的平离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好好加以批判。

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现在写文章的人许多我都没见过。李希凡写一篇文章，调到《人民日报》，做了人大代表，再没有写出好文章。关锋是不是人大代表？……但是也有危险，年轻人要注意，现在学校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报刊编辑、记者很复杂，保皇党很多。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好比孙中山和康梁。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走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我怀疑。

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大大鼓舞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纪要》。

紧接着，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评了《二月提纲》，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建立新的“文化革命小

组”——亦即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姚文元来说，进入“中央文革”，是他的发迹史上关键性的“跃进”。不过，据关锋回忆，在“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名单上，并没有姚文元……

一九六六年四月，最初拟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组员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后来，删去了陈亚丁、吴冷西，加上了谢镗忠、尹达。这时，依然没有姚文元。

“中央文革”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会。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中央文革’的辫子!”

关锋愕然——直到这时，他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革”。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通告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陶铸，第一副组长江青，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全组正式成员十四人。后来，又补充四人，即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从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从上海调往北京，与江青结帮——在此之前，江青与张春桥在“京剧革命”中开始勾结，而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姚文元加入了江、张联盟。

对于姚文元来说，他靠批胡风崭露头角，靠《录以备考》成为“新星”，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一句话，此人是靠“大批判”起家，是靠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的。

就在张春桥忙着为江青张罗《纪要》的时候，姚文元销踪匿迹。他，另负重命——打掉吴晗的“援军”……

瞄准邓拓

在姚文元的书桌上，《海瑞罢官》剧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边，代之以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金棍子”要从打吴晗转向打邓拓和廖沫沙了。

说实在的，姚文元本来对邓拓颇为敬佩，对《燕山夜话》深为赞赏。

一九六二年，姚文元曾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写过这么一封信：

编辑同志：

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

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杂感》），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

致

敬礼

姚文元　五月三十日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邓拓北呼，姚文元南应。他要步《燕山夜话》的后尘，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话》。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击”，把《燕山夜话》当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连张春桥也是如此。当年，当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之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曾一起共事。如今，为了顺应“阶级”的需要，全然不顾这些了。

又一番“对外保密”。经过几次修改，经过江青、张春桥动笔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泽东手中。

标题：《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署名：姚文元。

毛泽东阅毕，拿起铅笔，思索了一下。他觉得标题过于冗长，便写上《评“三家村”》四个字，而把原先的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删去。

于是，江青便吹嘘了：“经过主席亲笔改定……”

江青和张春桥第三次看中《文汇报》，决定在上海发表。

作为“军师”，张春桥选择了“最佳时机”——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文汇报》上抛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确实是“最佳时机”：

因为五月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会议。

因为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军报》上登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指明“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江青还点明：“《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这样，江青就借“围城打援”，从吴晗身上“扩大战果”，把矛头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进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直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在上海见报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调子，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开缺口，“扩大战果”，成为轰击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发重磅炮弹：第一发俞铭璜的《“有鬼无害”论》轰击廖沫沙，第二发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轰击吴晗，如今第三发轰击邓拓及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这三发重磅炮弹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都是以《文汇报》为炮口。

“四人帮”其实最初是“三人帮”：以江青为核心，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棍子”。那时候，“造反司令”王洪文还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办公室里逍遥，他连做梦也想不到日后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成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亲密战友”……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上海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与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衣，“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

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一日通过，

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炮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

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的“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捏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余兴。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便在四月二日晚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莫大兴趣。

毛泽东嘱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道：“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四月三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

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

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向文艺界一些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海瑞精神的意思，许多人都向钱俊瑞推荐了吴晗，以为由研究明史的吴晗来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胡乔木也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他同样想到了吴晗。胡乔木以为，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胡乔木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于是，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七月初，吴晗又写了《论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

胡乔木上哪儿去了呢?

赤日炎炎，七月流火。中共中央委员们聚首清凉世界——江西庐山，在那里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亦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刚上庐山时，心境是宽松、愉快的，欣然命笔，写下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上山不到半个月，一封意外的信，使毛泽东的心绪顿时变得极不愉快，原定二十天结束的庐山会议竟延宕至历时一个半月才结束。

那是七月十三日早晨，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朝庐山向毛泽东住所走来，说有事找主席一谈。警卫员说，主席刚睡。中年人走了。当晚，他在庐山上草成一信，于十四日晨又亲自送往毛泽东住所。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多年战友、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彭德怀的信，一开头便这样声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直言苦谏。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阅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顿时，庐山上风云翻滚，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海瑞。他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阐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

海瑞。

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庐山会议终于结束。

当胡乔木下山，回到北京，这才见到吴晗那篇《论海瑞》。胡乔木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觉得吴晗的文章仍可照发。他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新见解转告吴晗。于是，吴晗修改了《论海瑞》，补充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假海瑞的见解。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吴晗始终以为，他宣传海瑞精神，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乔木找吴晗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向文艺界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各出版社、各剧团纷纷刊登文章、出版书籍、上演节目，歌颂海瑞、宣传海瑞，形成了“海瑞热”。就连关于海瑞的连环画，一时间也出了十多种。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其实还不是北京，却是上海。毛泽东四月四日上午在上海谈了海瑞的故事之后才十来天，四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便在“朝花”副刊登出该报组织的专稿——蒋星煜的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张春桥后来在小轿车上突然向《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提出质问的这篇文章），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早了整整两个月！

当时，《解放日报》约蒋星煜写关于海瑞的历史小说，是因为蒋星煜对于海瑞颇有研究，早在一九五七年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

就京剧而论，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上海便推出了许思言（注：初版本

误排为“许恩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据蒋星煜回忆，他的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引起了周信芳很大的兴趣。周信芳邀请蒋星煜一起去青岛，决定以《南包公——海瑞》为主线改编京剧。周信芳还邀请剧作家许思言前往青岛，着手写作剧本。

蒋星煜说，剧本最初取名《直言天下第一事》，因为海瑞的奏疏在收入陈子壮的《昭代经济言》之中时，题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于是周信芳便以《直言天下第一事》为剧名；后来觉得《直言天下第一事》毕竟不像京剧剧名，便改为《海瑞上本》；最后，改为《海瑞上疏》。

上海京剧团一马当先，急坏了北京京剧团的那匹“马”——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他在全国政协会上遇见吴晗，便求吴晗写剧本。此后，马连良亲自出“马”，几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吴晗，请他写海瑞剧本。虽然吴晗再三声明不懂京剧，挡不住马连良一片热忱。终于，“上帝”被感动了，吴晗七易其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一九六〇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开始彩排。

正巧，吴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抚掌而笑，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酝酿，一九六〇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讴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在上海排演了《海瑞上疏》、北京排演了《海瑞罢官》之际，海瑞的故乡——海南岛排演了《海瑞回朝》，写的是海瑞在七十二岁时东山再起、到南京出任南史部侍郎的故事。

《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后，马上殃及《海瑞上疏》和《海瑞回朝》。这三部海瑞戏，被称之为“海瑞三部曲”。据云，这三出海瑞戏是从北至南，“全国一盘棋”，与彭德怀“南呼北应”，进行“反党活动”。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给主席当秘

书”而又兼着“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朗朗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拍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了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

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惟有张春桥一人知。

据说，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是否真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

有人以为，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怎敢去上海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有人以为，一开始可能是江青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去上海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章写出初稿之后，送毛泽东审阅。

不过，江青却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却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话。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后，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有江青要批《海瑞罢

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到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久久地，只顾自己抽烟。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他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弛。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便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二月五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

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

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筹。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

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筹。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

“一九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

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邓拓、田家英、吴晗死于姚文元笔下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

“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当江青把来自陈伯达的重要消息告诉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补充了一句：“主席的话，是对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励和高度评价！”

江青一听，觉得张春桥、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记录。

四十三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十七个年头。

毛泽东对田家英颇为器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毛泽

东笑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写的，叫田家英，我的秘书。”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参加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成都。他从小失去父母，在中药铺里当学徒。一九三七年，十五岁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一九三八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年之后，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田家英，调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家英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田家英向来为人正直。最初，提议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据说是陈伯达。在田家英担任毛泽东秘书之后，陈伯达常常向田家英探问，毛泽东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思索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新见解？……陈伯达摸到了毛泽东的动向之后，抢着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最新见解，以求博得毛泽东的好感。

一回，两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觉。从此，每当陈伯达向田家英摸“动向”的时候，田家英总是支开话题，聊起别的事。这使陈伯达深为不快。

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关锋是快手笔，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

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

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姚的那段话删去了。

纪要印出来。

陈伯达一看，冒火了。

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

江青心急似火，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给江青打来了电话……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骂道："老右倾！"

一点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决心，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还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关锋所述，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说法之一，是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原文如下：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话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瞒过了。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

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提起了。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一九五九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①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

① 此文原载《知情者说》之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五月二十三日衔冤辞世。①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他以为：

一、在杭州整理记录的时候，田家英就提出不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胡绳、艾思奇支持，关锋不表态；

二、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关锋坚持要写入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最后印发的记录上还是写上了那段话（前几种说法都说最后印发的记录上没有这段话）；

三、是关锋向上告密。

逄先知的原文如下：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②

说法之四，是《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一、记录是田家英整理的；

---

① 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二四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②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八〇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三、告密者除了关锋之外，还多了个戚本禹。

彭亚新的原文如下：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①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一、建议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不是江青，却是田家英；

二、田家英在记录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三、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附带”谈到的。

---

① 彭亚新：《田家英小传》，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三三〇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原文如下：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①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认为：

一、是田家英在纪要中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二、田家英删去这段话的原因是这段话不属于“重要的内容”。

原文如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

① 余广人：《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诤谏》，《炎黄春秋》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要罪状。①

说法之七，是邓力群。他以为：

一、田家英是由于“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而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二、田家英是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

原文如下：

> 一九六五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②

以上七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江青骂田家英是“老右倾”，而他确实是个“老右倾”！

早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时，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听罢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那次大会讲话，田家英的心像灌了铅似的。他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 四面江山来眼底
> 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

---

① 曾自、曹应旺：《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载《名流写真》第四十二页，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版。

② 邓力群：《悼念家英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九日。

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惟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亮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

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吴晗的学生张海瀛，曾回忆一九六五年底在吴晗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前去看望他。师生间作了这样的对话：

吴问：你还在乡下吗？几个月没来了？

张答：还在乡下，是九月份返京时来过一次，已有两个多月了。

吴问：最近看报没有？

张答：看了。原先手头没有《文汇报》，《北京日报》转载后，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这两天读了蔡成和同志和燕人同志批驳姚文元谬论的文章，真解气！真痛快！真是以理服人！

吴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能说服了谁呢？

张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澄清史实的文章呢？

吴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

张说：看来这场争论有点像郭老替曹操翻案时引起的那场风波。

吴说：不好类比。这场争论的来势要比那次猛烈

得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张海瀛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吴晗先生发表的自我批评后，利用一九六六年新年休假，又去拜访吴晗先生。

张海瀛后来回忆了两人的对话：

吴问：你看报了吗？

张答：看了，先生的大作我认真拜读过了。

吴问：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

张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评，说明这场争论要收场了；也有的说，这不是收场的信号而是升级的信号。

吴说：从《人民日报》的按语来看，这场辩论是要扩大和升级的。假如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

张问：学习刚开了个头就有中断的危险，怎么办呢？

吴说：有志者，事竟成。你有志于明史，主要靠自己努力。我送你几本书。

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海瑞集》以及在高级党校的明史讲座稿，在封面分别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一九六六年元旦。”①

张海瀛说，从吴晗谈话的口气和举动，可以看出，吴晗已经

① 张海瀛：《忆吴晗师》，《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感觉到事态在扩大、升级，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他将面临火与血的考验。

此后吴晗一次次被拉上批斗会。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

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

吴晗一家惟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　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的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

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思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的“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侪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侠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

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侠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为准确地描绘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这里顺便提一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两年多，吴晗的《海瑞罢官》还难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还难以批判。内中的原因，是由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毛泽东同意才发表的，有着“御批”的“来头”；再说，“彭德怀就是海瑞”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谁也不敢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实，否定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最深刻的含义，在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是这篇“宏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但在“两个凡是”的岁月，还高唱“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终于勇敢地打响第一炮，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传言称是“吴晗的秘书”。其实，当年他是北京历史学会惟一的专职干部，而会长是吴晗，故与吴晗相知甚深。苏双碧后来在一九七四年调往《光明日报》工作。

也正巧，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报》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推出历史性的文献——“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炮猛轰“两个凡是”，从此引发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苏双碧决心为吴晗申冤，打响批判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一炮。苏双碧是这样回忆的：

> 我当时觉得，由我来写这篇文章，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年轻，又是报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即使文章有点偏差，上面也不至于太计较；二是我曾和吴晗一起工作过，又参加过邓拓、范瑾同志为组长的后来被称为“假批判真包庇”的写作组，多少也算了解一些内情。据此，我决定试一试，并着手准备写这篇文章。
>
> 然而，这件事毕竟太大了，按组织原则，我必须向报社（引者注：指《光明日报》）领导汇报我自己的想法，并征得领导的同意，才能着手去做。
>
> 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左右，我得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会议。那天下午正好在楼道碰到他，我向他说明我要写一篇从政治上狠批姚文元并替《海瑞罢官》平反，从而为全面替吴晗平反作舆论准备的文章。西光同志几乎没有多加思索就表

示同意，并说：“批姚文元总可以吧，吴晗平反是时间问题。”他态度明确，坚决，增强了我的信心。

随后，我告诉了主管理论部工作的副总编辑马沛文同志，他对我的设想报以极大的兴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并让我把别的工作先放一下。于是，从构思到查材料到写文章，大约只用了两天多时间。把文章初稿交给马沛文同志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找我，认为文章基调不错，大体可以……①

就这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勇敢地发表了苏双碧的《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苏双碧这样说道：

当天广播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的摘要，《文汇报》等全国许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

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播发刊登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根据他们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进行评述和猜测。

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十六日的一篇专稿认为，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的“最惊人之举”。

十一月十七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中认为，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十一月十八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是一篇“冲击性很强的文章”。

其实所谓“最惊人之举”或“冲击性很强”的说

① 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法，是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四人帮”制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作风的表现。①

① 苏双碧：《为〈海瑞罢官〉平反的前前后后》，《炎黄世界》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第十一章　进入“中央文革”

成了“中央首长”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十八名成员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小组组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小组组员”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须知，陈伯达也不过是个“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不过“副组长”，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于一人之下，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彭罗陆

杨”的职务，在这次会上被宣布全部撤销。全会通过了“历史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三十五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于是，这个十七年前的高二学生，姚蓬子的儿子，一跃成为“中央首长”，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姚文元三个字镀上了一层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马捷之辈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谁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对姚文元说一句稍稍不恭的话，对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选择”：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曰“攻击中央首长”；

三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虽然，当时姚文元惟一足以吓人的头衔，不过是那么个“小组成员”。

于是，如同本书开头所写，“子贵父荣”，姚蓬子的胸前别起了儿子所赠的毛泽东像章，一扫过去那种灰溜溜的面孔，一下子

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起来。

和张春桥一起发动“一月革命”

往昔，张春桥和姚文元会在上海，望着北京。如今，他俩坐在北京，望着上海。上海，毕竟是他们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万万不可因为做了“京官”而丢了上海。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庆贺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周年的日子里，从上海传来“特大喜讯”：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这一天，清早，“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领两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车北上，要进京告状，被堵于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工人“造反派”切断铁路交通，发生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扩大成为“四人帮”。

当张春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后，上海又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冲击之下，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摇摇欲坠。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过，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行。要摧毁中共上海市委，必须在后院放火，内应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给徐景贤挂长途电话“策反”。正在为陈丕显、曹荻秋草拟“检查”稿的徐景贤“反戈一击”了。这个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带领写作班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造反”。秀才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看出时机成熟，双双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俩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出现在上海滩，万夫莫敌，不可一世。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于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一号通令”，声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会员”。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一把抓了过来。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统治上海达九年之久，直至他们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

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周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尽管《文汇报》套红刊登整版消息，而《人民日报》不吭一声！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么一来，壮了张春桥的胆，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一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八日，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跟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密商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

就在这时，康生抢先一步。一月十九日，这个山东老乡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要他转告山东的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的夺权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宣告成立。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诞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予以支持。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告建立。《人民日报》为之庆贺，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不能再落后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于在上海也“宣告”一下。可是，向来喜欢“震撼”全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甘于跟着别人叫“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革命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之类。上海有人提议叫“政治联络总站”，他们也以为缺乏新意。

有了！到底是秀才，姚文元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了灵感：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曾称赞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不言而喻，毛泽东很喜欢“公社”这字眼。一九五八年，当“人民公社”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第一个发出“人民公社好”欢呼声的便是毛泽东……

“就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赞同姚文元的意见。

他们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非同凡响，有着“首创”意义，富有“革命”色彩：既象征着接过了巴黎公社的神圣大旗，又符合毛泽东的“北京公社宣言”的含义，真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

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

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么一来，全国只有你们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吗？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报》上

登载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国都要叫‘公社’，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

“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刚才提到的问题，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三个办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

这时，张春桥才明白了《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连声对毛泽东说：“改，改，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意见改！”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张春桥和姚文元面面相觑。张春桥下意识地摸了摸帽上的红五角星，犹如摸了摸乌纱帽。虽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总算乌纱帽还在。

回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一身冷汗刚干，徐景贤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于《人民日报》迟迟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众看成中央不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动，“炮轰张春桥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将有上万人参加这一大会……

火烧眉毛。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当月十八日匆匆飞回上海。

二月二十三日，挂在上海外滩的巨大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终于取下来了，换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招牌。

《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消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俩原先想抢旗帜，使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夺权样板”。这时，却落了个第四名：继贵州和黑龙江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已在《人民日报》上亮相了！

虽说如此，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后吹嘘“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由于《人民日报》总算承认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个“炮轰张春桥大会”被张春桥借用“最高指示”

镇住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化险为夷，总算没有在这场政治风浪中翻船。

与王、关、戚并驾齐驱

像穿梭似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来来回回，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间。

他们不能放掉上海，因为上海是他们的老巢，是“基地”；

他们不能丢掉北京，因为不在北京称雄，无法夺得中央大权。

“炮轰张春桥”的浪潮像地火在上海滩下运行，不时喷射出火光，震颤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斗在持续，江青时时需要她的“军师”和“棍子”，而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时时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携，觊觎着中南海、新华门里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要买京沪之间的“飞机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闹得地覆天翻之际，北京也大风大浪，大起大落：

“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开进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为打倒王任重而筹划于密室，闻讯大喜，当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顿时，“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京都。

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刷掉了一个书记。

紧接着，江青顺风助澜，大声疾呼：“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他是刘邓的新的代表人物！”

顿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大字标语，又刷满北京的大街小巷。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下台了。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书记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升了一级。

一九六七年二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被林彪、林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在反“二月逆流”的大轰大嗡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刷掉了好几个，政治局陷于瘫痪。

姚文元兴高采烈，居然“诗兴”大发，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已经取得胜利，群众起来了，很高兴。感而赋诗一首。

贺反“二月逆流”胜利

画皮恶魔现原形，
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
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
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起，
跳梁小丑岂足论。

兆文
三月二十六日

字里行间，姚文元咬牙切齿之声可闻。

中共党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现象：“中央文革小组”取政治局而代之！

可是，翻遍《中国共产党党章》，找不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中国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决策中心！

直到这时，还叫“中央文革小组”，还只不过是个“小组”，而它已成了至高无上的“小组”。这倒被毛泽东说中了：“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

随着这个“小组”一步步登天，“小组”不是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小：

顾问陶铸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

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秃笔——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个“小组”成了名副其实的“小组”，加上组长陈伯达，全组不过八个人而已。

当然，这八个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小组”之下的办事机构、办事人员却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而不断扩大、增加。

这时候姚文元的头衔，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然而，这个“组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实质上已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

四位“秀才”并列为“组员”，姚文元与、关、戚并驾齐驱。

王力、关锋、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样，都是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当作撑竿跃入“中央文革小组”的。

中国的王力有两个。一个王力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潜心于学术研究，“龙虫并雕，著作等身”，

是一位德高望重、造诣甚深的学者。在“文革”中，此王力自然在劫难逃，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黑牌批斗。

“中央文革”的王力，则是另一个。此王力是江苏淮安县人，比姚文元大九岁。他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里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便是康生。

解放后，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六十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之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九月，为了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由康生定稿，而执笔者便是王力。从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际，正是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时。一个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个依仗张春桥接近了江青，他们的“登龙术”何等相似。

关锋原名周玉峰，号秀山，比姚文元大十二岁，是四位“秀才”中最年长的一个。一九一九年七月，他生于山东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他的杂文曾常用“庆云”为笔名。一九三三年，他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担任中共乐县县委书记。一九三九年起改名关锋。一九四四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九四七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〇年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一九五二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夏征农。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与艾思奇、胡绳等共事。对于关锋来说，这一调动，从地方进入了中央。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红旗》杂志创刊，关锋调入《红旗》，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内刊。不久，成为《红旗》编委，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据关锋自云，他在《光明日

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从此，得到毛泽东的垂青。

关锋喜欢写杂文，一九六二年起，以笔名庆云（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许多杂文。有人把关锋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他反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看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于是，关锋被保护过关。作为“左派”，关锋如同姚文元一样，也曾写过许多“棍子”文章；还曾与戚本禹联名写过诬陷彭德怀的信，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以致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惨遭揪斗。

戚本禹是山东威海市人，比姚文元小一岁，是四个“秀才”中最年轻的一个。跟姚文元一样，是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一九六二年，中南海发生“八司马案件”。

挨整的八个“司马”，都是年轻干部，其中之一便是戚本禹。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偶然遇见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诉说了“八司马”之冤。毛泽东令田家英细查。不久，毛泽东为“八司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来喜欢历史，业余钻研历史，写出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发起挑战，在《光明日报》上展开论战。毛泽东看后，赞扬了戚本禹。于是，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编辑，后来成为历史组组长。

在田家英遭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虽说“王、关、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实际上戚当时最接近毛泽东，手中的实权远远超过王与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他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爱国

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开了猛烈的一炮。刘少奇曾闻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宫秘史》发难，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毛泽东写信，阐述自己对于影片《清宫秘史》的看法，戚仍执意发表那篇文章。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当天，刘少奇看毕，气愤地对家人说道："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戚本禹的文章，成为公开声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信号弹。

这四支笔杆，各有各的登龙术：王力替林彪捉刀，关锋批杨献珍起家，戚本禹攻刘少奇夺取"头功"，姚文元则是以评《海瑞罢官》进入"中央文革"。

笔杆子们之间，有过你呼我应：在批《海瑞罢官》时，关锋和戚本禹曾一起专程来沪，跟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不久，关锋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戚本禹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围剿吴晗。

四支秃笔倒了三支

"四笔并存"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一九六七年酷夏来临，"文革"的热度也继续上升，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头脑发热中一起倒台，只剩下姚文元一支秃笔……

那是在七月十三日晚，毛泽东带着杨成武、余立金登上火车，离开了北京，开始为时两个月的漫长旅行，他巡视大江南北，调查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副统帅"林彪坐镇北京，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着手部署

“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第一战役是打倒“彭罗陆杨”，已经实现了；

第二战役是打倒“刘邓司令部”，已经实现了；

第三战役是借助于批判“二月逆流”，扫掉一批老帅老将……

须知，林彪虽然名列元帅，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有十个，他只是十帅之一。除了彭德怀早已扫除之外（一九五九年，他取彭德怀而代之，当上国防部长），尚有八帅。林彪以为只有打倒这八个老帅及其手下一批将军，才能巩固他的“副统帅”的地位。

二月，天赐良机，在北京京西宾馆，老帅老将们当面斥责“文革派”人物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被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林彪想乘机下手，除去军内对手。可惜，毛泽东不允，林彪只得罢休。

七月中旬，武汉两大派严重对立，一场大规模武斗迫在眉睫。谢富治和王力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于十四日匆匆从重庆赶到武汉。王力虽然不过是一名“组员”，却自视甚高，仿佛钦差大臣、最高裁判。王力本该调解两大派的矛盾，而他却支一派，打一派。武汉部队的一些干部、战士同情受压的“百万雄师”派，于七月二十日抓了王力，批斗了一番。消息传出，全国轰动。

江青闻讯大怒：岂可如此无视“中央文革小组”？

当王力终于“脱险”飞回北京，江青动员了二十万人去机场欢迎，然后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大会。江青把怒火落向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时间，“打倒陈再道”、“绞死陈再道”的大字标语贴满全国城乡。

林彪微笑了。又是天赐良机！林彪借题发挥，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以此开展他的“第三战役”。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军队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要借助于这一口号，清洗军内一大批政敌。

康生、江青、陈伯达当即赞同林彪的意见，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秀才”起草《红旗》杂志社论——《揪军内一小撮》。关锋执笔。

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外地见了，深为震怒。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这是毒草。”

思索了一下，他又用遒劲的笔大书四字：“还我长城。”

长城，向来是人民对解放军的赞誉。“揪军内一小撮”、“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乱军的口号。毛泽东怎不心急如焚？

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林彪装聋作哑。江青、康生、陈伯达朝“秀才”们一推了事。“秀才们”成了替罪羊。

最初，戚本禹把责任推给王力和关锋。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被捕。到了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也站不住脚了，终于被江青从“中央文革”中“端”了出来。

当时，一起被追查的还有《红旗》杂志副总编林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恢复自由并正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林杰，从中国北方某地给本书作者来信，除寄赠他以笔名发表的新作《王清任的脑髓说及其哲学贡献》之外，还在信中回忆往事：

“对于姚家父子，我只知蓬子是叛徒，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那是从鲁迅书中看到的。文元为人，正如你所写的，眼很高，是看天的。我这种人，不在他的眼下。《红旗》发了他交来的几篇文章，是通过关锋给我的。陈伯达对我说，文元的文章，一个标点也不能错。我只有听命照发。从未与之作个别交谈过。虽然当时穆欣曾开玩笑说，我和他是一对：个子高低、年岁都差不多。

正是他和陈伯达、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夜二时来《红旗》，宣布将我关起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发了《评陶铸的两本书》，其中一段关于‘五一六’集团两大罪状：反对军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暗指我。从此，我的罪就定了……”

在王、关、戚写那篇《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的时候，姚文元正在上海，和张春桥一起陪同毛泽东巡视上海，未参与社论的写作，幸免于纠葛。这样，四支秃笔倒了三支，姚文元安然无恙。

当姚文元听说王、关、戚成了阶下囚，又喜又惧：喜的是一下子除去三个劲敌，惧是的日后自己不会也步王、关、戚的后尘？

从此，姚文元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惟一的“组员”。整个小组只有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组员姚文元。

姚文元成了富有政治权威的“大手笔”。他不再写《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不再写《算命摊旁的杂感》，不再写《折卖行中的声音》，不再写《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他不再一年发几十篇“千字文”了。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一整版、几大版；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他要么不写，要写就成为全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政治学习文件”。

一九六七年，他洋洋洒洒地发表了新的“两评”。

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他声言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历史”。其实，这恰恰是姚文元

的精确的自我写照。

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称陶铸为“南霸天”，具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兼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其实，姚文元又如同“猴子上天平——自称自”。

仔细研读姚文元的“四评”，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相关定律”：随着姚文元的身份逐步升级，他所“评”的对象也在逐步升级，从吴晗，而邓拓，而周扬，而陶铸。

文章少了话多了

姚文元的文章少了，话却多了。

本来，他有着“结巴”的“后遗症”，何况老是戒不掉口头语“正是这样”，他总是以笔代言，不大在群众场合讲话。

无奈，他成了“中央首长”之后，而领导“文革”的“新潮流”便是“中央首长讲话”，他不得不向打着各种各样旗号的各省各市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即席讲话。“接见”刚一结束，各式各样的油印机便开动起来，《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我翻阅着几十册厚厚的《中央首长讲话选》，读着一篇又一篇的姚文元讲话记录稿。其中一篇姚文元和江青等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张永生、杜英信的讲话纪要，颇能反映姚文元当时的形象。他，早已不是第一次走进张春桥家中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了，居然跟江青像唱双簧一般，江青说几句，姚文元便插一句，处处“紧跟”。

以下是当年的“浙江省革命委”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的传达记录：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九时二十分至二十日凌晨一时正。

当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福建厅时，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引者注）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非常非常关心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们十分亲切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我们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美术学院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在这里，姚文元充分显示了棍子的本色——引者注。）

江青同志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

姚文元同志补充说：“黄胄这个人也很坏。”（在那种年月，姚文元这样说一句话，便意味着“中央首长点了黄胄的名”，给黄胄带来一场大灾难——引者注。）

我们要求江青同志给我们革命委员会作指示，江青同志说：“不要我指示了，你们是革命委员会嘛！”

姚文元同志插话：“革命委员会就是搞革命嘛！你们去干嘛！”

当我们汇报到浙江戏剧界的情况时，江青同志说：“浙江有个问题，旧的剧种都有问题。绍兴大班武功基础好，样板戏是否可以移植？”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移植是很艰苦的改造工作。”

江青同志："越剧要改造。越剧是资产阶级的。越剧音乐很消沉。女人演男人，是六十年代的怪现象，讨厌透了！"

姚文元同志插话说："男人演女人，女人演男人，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部结束了！"

江青同志说："你们浙江演古戏、鬼戏，学到出奇的程度，甚至棺材里出僵尸鬼。还《庵堂认母》到处都演。"

姚文元插话："那时还美其名曰'抢救遗产'。"

当我们汇报到胡乔木到杭州活动时，江青同志说："胡乔木还与陈冰搞了一个'辛文兵'！"

姚文元同志插话："胡乔木到杭州去了好几次！"

当我们汇报了浙江省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姚文元同志说："浙江复杂！"江青同志说："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嘛！"

……

凌晨一时，接见结束了。敬爱的江青、伯达、文元、肖力同志一直亲切地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外，握手告别。

我们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说："谢谢同志们！"

姚文元同志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

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革命青年和浙江三千一百万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

这次接见，是三十七岁的"中央首长"姚文元在他的同乡们面前的精彩亮相。

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一搭一档，形行影随。真的，江青的那句话，是出自内心的：“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姚文元讲话记录。以上只是其中的一次。虽说是“管窥一斑”，倒也可见全豹之貌。

三个多月之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大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从此，“文化大革命”揭开新的一页：成千上万名工人穿着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挂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袖章，步入“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这一回，不再是“评”，不再是“批”，姚文元的笔杆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他已成为毛泽东的代言者，威风显赫，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震动着中国！

尽管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也免费地发给每一个公职人员，但为了显示他今日的眩目光彩，姚文元还是不忘当年整过他的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喜欢写长句的他，在一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上题词：“赠给现在仍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的卢湾区委的同志们并向你们问好！姚文元。”

姚蓬子之死

一辆浑身雪白、漆着红色“十”字的救护车，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啸着前进。

救护车停在林村那长长的甬道前。

两位救护人员持担架奔向姚家。

当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躯占满那狭窄的担架时，已有许多人闻讯赶来。

本来需要两个人抬的担架，四周围了好多“造反派”战士。七手八脚，抬着姚蓬子前进。担架通过长长的甬道时，又有好几位“造反派”战士前来助一臂之力。眼看担架就要抬到救护车跟前，由于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姚蓬子横着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着地的是他的右颊，顿时摔得紫中带青，鲜血流了出来。

那几位“造反派”顿时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声嚷嚷：“还没进医院，就给你们摔个半死。你们等着瞧！你们不想想摔的是谁?!”

救护车在急驶。周修文在车上还咬牙切齿，骂声不绝。

姚蓬子被送进了上胸科医院。他，得了肺癌。

几天前，夜深人静之际，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林村，从裤袋里拿出钥匙，熟练地打开房门。

此人已是坐上红旗牌轿车的“中央首长”，这时甘受委屈，骑着旧自行车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在他身后十多米，一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员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子夜时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进上海胸科医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来一个瘦长脸的家伙，在林村像幽灵一样晃来荡去。他用“阶级斗争”的眼睛审视一切，用“阶级斗争”的嗅觉辨别一切。

他暗中调查了那几个“积极”得过了头的“造反派”，查档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现。他还拜访了离姚家不远的那位江青心腹、后来当上“文化部长”的于会泳——本来住在那里的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自从一九六六年九

月九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杀身亡，于会泳便占了她的那套舒适的公寓住宅。

过了半个多月，那张瘦长的马脸才在林村消失。他，实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阶级敌人”。不过，那几位“造反派”战士已察觉幽灵的存在，吓得魂不附体，后悔当初拍马屁拍在马脚上……

收音机里播送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连幼儿园里的孩子也必须洗耳恭听。姚蓬子在胸科医院单间病房里听着广播，枯黄的脸上泛着笑容。他本来期望儿子成为一个作家，不料这么有出息。想当初，当儿子神秘地要他帮助查《明史》的时候，就连他也觉得批什么《海瑞罢官》纯属多管闲事，如今他方知儿子确实“先知先觉”，青胜于蓝。

一九六九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人前往看望、慰问。姚文元派来专人，在床前聆听姚蓬子对后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着为林彪起草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无法分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肺癌终于结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辆大卡车在苍茫的夜色中驶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军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众多的藏书，运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车，搬了过去。

几天之后，周修文回林村取点衣服，见到了邻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货。别人还没问，她就先吹了起来：“哎哟哟，康平路那里真好，连东西都不用自己买。你只要开一张单子，过一会儿，有人就会替你买好，给你送来！”

刚说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脸，摇头了：“哎哟哟，那里就是有一点不好——前前后后，都有警卫员站岗。这么一来，你们就没办法来看我了。那个地方，‘外头的人’是进不去的！”

她唏嘘一番，抬着头、挺着胸，一副“革命妈妈”的标准姿势，开步走了。

邻居们望着她的背影，有点糊涂起来：她刚才说的康平路“有一点不好”，究竟真的“不好”，还是“好”的“不好”呢？

不过，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决定不开追悼会，以免太招惹别人的注意。虽说周修文对此曾有些不满，无奈儿子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于是，姚蓬子的遗体被悄然送进火葬场，不声不响地在世界上消失，结束了他的错综复杂，曾“红”曾“黑”的一生……

第十二章　“舆论总管”

取陈伯达而代之

就在姚蓬子死后不久，一九六九年四月，姚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

大红标语刷满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喧闹的锣鼓声和震天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会议发布的第一号新闻公报上，那“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破天荒的。看得出，是“秀才”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才“创作”出的。把一百七十六名主席团成员的姓名分为四组，惟有第四组才是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名，颇为令人寻味：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周恩来　陈伯达　康　生　江　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　叶　群　汪东兴　温玉成

董必武　刘伯承　朱　德　陈　云　李富春　陈　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于会泳……魏秉奎等一百五十二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名。

这张名单用潜台词清楚地表明：三十八岁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号人物，成为前二十四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

众多的外国记者一看到这张名单，就纷纷报道："以批判《海瑞罢官》而进入政坛的姚文元，已成为中共九大最值得注意的年轻人。"

林彪在政治报告中，提及了姚文元的"历史性功绩"：

"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文革小组"结束了取代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而临时执政的局面，它的五名成员中的两名——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另三名成员——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组员姚文元均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姚文元，结束了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穿梭生涯。虽然他仍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但他的立足点已转入北京，在北京遥控着上海的一切。他的全家迁往北京。一家五口，住了六十多间房子，比起当年姚蓬子的林村小楼阔多了！

从此，姚文元不再是一名投稿者，不再是一家地方报纸的编委，而是成了陈伯达的副手，掌管全国的舆论大权。

一年之后，姚文元的地位又“向上浮动”了“一级”。

那是一九七〇年盛暑，中共中央委员们再度聚首江西庐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庐山会议”，亦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又是风云翻滚：副统帅林彪抢班夺权，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跟毛泽东展开激烈的斗争。陈伯达成为林彪的马前卒，在会上抛出坚持设国家主席、支持林彪的“第二号简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于是，林彪虽未倒台，全党已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受到了审查。

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丁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那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烧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

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

‘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喑，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十九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像“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曾这样揭发“舆论总管”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控制：

> 姚文元对广播局进行控制，主要是利用他在中央窃取的权力和地位，打着中央的旗号，发号施令。最基本的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大量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给我以影响。而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分不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斗争的是非界限，更识不破他们玩弄的阴谋诡计，加上又有怕挨整、官迷心窍的私心杂念，这是我接受姚文元控制的错误思想基础。
>
> 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事情管得很宽，宣传、外事、新闻、业务、政治思想、保卫工作他都过问。我错误地把他看成是代表中央来分管广播局工作的，凡是重大事情向中央的请示报告，都经他转报中央。他的黑指示，我也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我们给中央的许多重要报告，在他批了意见以后，才送政治局传阅，有的还送毛主席圈阅后才退给我们，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迷惑（此句不通，原文如此。——引者）。
>
> 姚文元控制广播局的具体渠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面谈话，下达黑指示。

我来广播局两年，两年多，当面同姚文元直接谈话的次数不是很多，核心小组其他成员同姚文元谈话的更少。

谈话的场合比较多的是陪见外宾之后，我和张振友、王寿仁（核心小组成员，副局长）等都是这样。如我刚到广播局，姚文元就利用我参加陪见外宾的机会第一次单独和我谈过一次话。不久，又同我和张振友一起谈了一次。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时间也比较长，对控制广播全局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也还有几次，主要谈话内容是要我们召开一次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他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反对经验主义，至于如何联系广播局实际，你们先出一个题目，过几个月再回答。他还批评我们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宣传有模糊阶级界限的倾向，提出中央几个新闻单位的外事活动可以成立一个协作小组，搞一个统一计划报批等等。但他并不是每次陪外宾后都找我们谈话，每次谈话也不都是单独同广播局的同志谈，更多的是同时和参加陪见的几个新闻单位的同志一起谈，我也不是每次谈话都参加。姚文元每次同我的谈话我都在核心小组传达或讨论，有的还向全局作了传达。姚文元还规定，他同外宾的谈话记录，整理以后，清样都要先送他亲自审阅修改后才准打印，这也是一种控制。

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场合，姚文元也直接同我谈过几次话。一次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灵堂里，姚文元向我下达不准第三遍播放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不准电视记者拍摄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机关里不准搞计划以外的大型悼念总理的活动等黑令。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把鲁瑛、解力

夫（《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同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列席政治局会议，听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人民日报》炮制的那篇有关天安门政治事件黑文件的定稿，在此过程中，姚文元同我们谈了一些话。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办公厅通知鲁瑛、解力夫和我到怀仁堂去值班，姚文元在那里也同我们谈了一点话。以上几次的谈话主要内容我已根据回忆写了交待材料。

……

我同姚文元私人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交谈。

二、通过新华社对宣传报道的方针和口径严密进行控制。

新华社记者遍布国内外，每天编发大量新闻报道，担负着向国内外宣传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处于宣传第一线。电台广播的新闻节目，稿源主要来自新华社。姚文元控制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渠道是向新华社下达黑指示并审阅新华社的稿件。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传到广播局以后，同样起了严密控制广播、电视宣传的作用。姚文元直接给广播局的黑指示并不多。

为了加强宣传业务上的联系，了解中央宣传意图和精神，广播局总编室一直派人每天晚上参加新华社总编室的汇报会。批林批孔开始后，一度中断。我来广播局后，感到广播局了解情况太少，宣传上不好掌握，经征得朱穆之同志同意，并报告姚文元批准，又恢复了这种联系。总编室每天去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同志，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新华社的宣传意图，主要是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的精神，写成书面记录材料供核心组、总编室和各宣传口的领导同志传阅。我对姚文元在宣传上向新

华社下达的那些黑指示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央宣传方针的主要来源。有些还作了批示，要总编室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两年多来，广播、电视的宣传完全纳入了“四人帮”另搞一套的轨道，如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不断升级；突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都是从这条渠道来的。总编室存有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记录档案材料，组织上可查阅。“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曾整理了一下，摘记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已上交专案组。

我来广播局后，还曾想同《人民日报》也建立这样的业务联系渠道，同样是为了想从那里更多地了解姚文元黑指示的精神。经过几次交涉，鲁瑛不同意，没有搞成。现在看，倒是一件好事。否则，我的错误会更大。……

姚文元还规定，中央电台转播《红旗》的文章，每期都要交报目录，经他审批决定。

三、直接电话联系。

姚文元（或经他的秘书郭文）通过电话向广播局发号施令，有直接打给我的，有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当时都有电话记录。打给我的，凡是重要的，我也有简要记录。遇有重要事情，我和总编室也直接用电话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张振东、王守仁是否同姚文元直接打过电话，我记不清楚。

我来广播局后，到一九七六年九月，直接同姚文元的电话联系不多。经回忆，还能想起来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1. 一九七五年评论《水浒》开始时，姚文元给我来电话，说主席最近对《水浒》有个重要评论，新华社和广播局没有宣传任务，所以没有告诉你们。但还是送

给你们看一下好。过了几天，朱穆之同志就把姚文元送给我们看的主席的批示和姚文元关于评论《水浒》问题给主席的一封信在看过以后就转给了我。我看后退给了姚文元。

2.……

3.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为纪念毛主席为广播题词十周年和广播局成立三十周年，我们准备开一个文艺晚会，除请中直单位、新闻单位和与广播局工作有关的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外，还准备请江青、姚文元和登奎同志、东兴同志参加。在事前报批的计划上，姚文元在他的名字下批了“到时再看”。九月十三日，我打电话给姚文元，问他是否能来？他考虑了一下，要我们把晚会日期推迟几天。我照他说的，改到九月十八日。当天上午又联系，姚文元说可以来参加，登奎同志也说可以参加，东兴同志说不来了，江青找不到（后来才知道到大寨去了）。可到了晚上，姚文元又来电话说，政治局要开会，不能来了。我们瞎忙乎了一顿。

4. 一九七五年十月。我在上报的准备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姚文元看了之后，第一次并没改，第二次改掉了，退给我重新打印上报。我当时不了解背景，没有引起重视，在同时批发的另外一个有关农村有线广播工作的通报中，仍然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总编室根据这个文件编发了一期工作简报，也是我批发的。姚文元看到后大发雷霆，要郭文打电话找我。当时正是晚上，我有外事活动，在饭店陪外宾吃饭。郭文把电话通到饭店，说你们报告上“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文元同志已经给你们改过了，那是认真考虑过的，怎

么在广播工作简报上又出现了？这时姚文元接过话筒对我说：“我那样改，你们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不想一想？广播工作简报要立即全部收回。”他把我批了一顿，第二天我向核心小组说了此事，仍然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将简报收回，我并向姚文元写了一个检讨，才算了事。

……

8. 毛主席逝世后准备追悼大会期间，技术处干扰科忽然收到一个可疑的新的干扰频率讯号。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苏修为干扰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搞的。我当即先在电话里向姚文元作了报告，接着又写了书面报告。姚文元要我们继续注意，并说已报告了华国锋同志。

9. 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姚文元来电话问广播和电视的实况转播情况。我说转播情况良好，未发现干扰。电视实况的转播录像已在审看，不大理想，主要是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镜头偏向东侧，我们准备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问题不大，打算重播。电视片正在洗印编辑。姚文元表示同意。

据我再三回忆，在这次电话联系之后，姚文元就没有再来过电话，我也没有向姚文元再打过电话。

……

姚文元通过各条渠道控制广播局，首先是控制我。为了达到控制我的目的，他甚至采取极其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有关情况，我过去已有过详细揭发，这里就不重复了。

邓岗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说明：有些事实的时间已记不具体、确切，因手头材料都已上交，请组织上查对。

“左”眼看画

做了“京官”，回上海就像走“娘家”似的。不过，他在上海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拿着小本本，不断记下他的“指示”。

他呢？也拿腔做势，对这发“指示”，对那也发“指示”。

我从一大堆档案中，找到一九七〇年春节前——一月二十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一店时的“指示”。那是张、姚当年趾高气扬的真实记录，现照录于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引者注：铁梅、小常宝分别为“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了，像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

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进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风眠的黑画！

两位“大批判专家”，居然在百货商店里批这批那，简直乱批一气，近乎胡闹！

其实，他们并非信口雌黄。两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不由得勃然大怒。张春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一个多月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姚文元学着张春桥的腔调，对外贸部作为出口画广告的《中国画》册，进行“批判”：“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

《中国画》册里，有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这幅《迎春》画，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

“公鸡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

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

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于是，一个“黑画展览”在北京举行，一个“批黑画”浪潮推行全国。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编》之中……

这位“左家庄”的“大将”，即便就《诗刊》复刊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也不忘对一九五七年曾经“大批判”的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捎”上一笔：

主席：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个想法：新出的诗刊可否兼登一些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鲁迅对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就进一步发挥诗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

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

《诗刊》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新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长处。革命诗歌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

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而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还将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是很不整齐的楼梯式的诗，真正写得好，还可发表。

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三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与政治局同志参阅。

此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批示“同意”。这样，《诗刊》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出版了复刊号。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两面派”和“暴发户”

大抵是“人贵言重”的缘故，自从姚文元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之后，虽然一篇篇重要的社论、报道都要经他的秃笔斧定方可见报，而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几乎从报刊上消失了。他退到幕后，用各种各样的“批示”作为口令，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一九七二年底借批判“右倾回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一系列“左”的文章，发表一系列宣传“左”倾思潮的社论；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令《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了“编者按”，为“白卷英雄”张铁生撑腰；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加了“编者按”，在全国掀起批判“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高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令《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在全国掀起批“文艺黑线回潮”的运动；

与此同时，为江青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社论，登文章，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猛攻周恩来；

……

姚文元开动舆论机器，成为“中国帽子公司”和“中国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复出，担任了中共中央

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篡权阴谋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姚文元再也无法忍耐了。他从幕后跳到了幕前。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的“重要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时间，全国各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又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文件”。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已经四年，“批林批孔”也已经“运动”多时，作为舆论总管的姚文元怎么放马后炮，直到这时才发表署名文章批林彪呢？

弦外有音，话外有声。姚文元批的是林彪，暗中指的是什么，路人皆知：

“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

姚文元还强调了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

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一九七三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锯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上，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毛泽东说姚文元“不懂马列”

就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不久，这位“舆论总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姚文元的文章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指谁？姚文元心目中的经验主义，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依据“文革”前的经验办事，所以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一段重要批示：

>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
>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
>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
> 为盼。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姚文元，批评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不懂马列”。“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 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不正是替姚文元画像吗？

毛泽东的批示，不由得使“舆论总管”感到非常紧张。因为

“舆论总管”向来以“精通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泽东斥为“不懂马列”，这样的批评的潜台词便是下台！

确实，姚文元就像那砰的一声飞上青云的爆竹一样，虽然升得那么快，但到达顶点之后便要急速跌落。看来，这一回要轮到姚文元“贬值”了。

果然，就在毛泽东写了那段批评姚文元的批示之后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提到了“经验主义”问题，他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帮，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指出“四人帮”是“党内小宗派”，下决心非解决不可。

姚文元那向来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转向地板。他耷拉着脑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那个姚文元。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这一回“炮打”的却是王、张、江、姚！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求报告的批示，对

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五月八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的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就在“四人帮”纷纷写检讨、处境维艰的时候，“舆论总管”忽然举起指挥棒，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讨论起《水浒》来了。

突然发动“评《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引发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发端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的一次聊天。

据芦荻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荻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荻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
>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

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和‘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见到芦荻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

于是，正处于步步退却之中的"四人帮"，一下子抓住了毛泽东的旗帜，神气活现起来。

其实，就算评《水浒》吧，毛泽东那些随口而说的意见，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过去评这评那，也曾评过《水浒》。姚文元对《水浒》的评论，跟父亲姚蓬子大同小异，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见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水浒》，……在生动的形象中所显示的斗争策略和战术，在历代农民运动中发生过某种教科书的作用，很多农民革命领袖从《水浒》中吸取了封建时代被压迫人民向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论艺术作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学》）

"真正歌颂劳动人民的艺术作品，从《水浒》，到《悯农诗》，都是不朽的。"（《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冲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作为"墙头草"，这时候的姚文元随风倒那当然不在话下。他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舆论总管"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评《水浒》"运动，起初使许多人困惑不解——用得着如此连篇累牍地去评《水浒》？

"舆论总管"导演了一幕幕舆论战：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发表了短评《重视〈水浒〉

的评论》，又在“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作为“样板”。《人民日报》当即在八月三十一日予以转载。

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中把芦荻记述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作为“最高指示”用黑体字印出来，公之于众。

有了《红旗》评论，有了《人民日报》社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几天，就在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高潮”。

“舆论总管”发起这么个“热潮”、“高潮”，究竟想干什么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样，姚文元的长文在《文汇报》上冒出，忽然评起《海瑞罢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个哑谜的谜底，直到一个月后，江青跑到大寨，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才终于点穿：

“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

是什么样的大事呢？江青说道：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谈，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无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在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讲得更明白：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一九七六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二月一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

丙辰年清明节，亦即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正值星期日。

早有“探子”向姚文元报告：四月四日这天，将会有数十万人以至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祭奠去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北京许多机关、学校、工厂，正忙于做花圈。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在做纸花……

姚文元那敏感的政治神经马上收紧了。在他看来，纪念周恩来，也就是向“四人帮”示威！

早在三月下旬，南京已经爆发“炮打张春桥”。

三月二十七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

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

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

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

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面临的紧急情况。四月二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报告：

主席：

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

一、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四月四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二、今年五一节活动。有的同志提出不搞游园活动了，应改革一下，还有见报也不好安排等。

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历年有活动，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今年五一节活动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

至于中央同志登报排列，可分三个公园分别报导（道），不搞通栏，只登政治局同志、副委员长、副总理，不搞过去上千人的大名单。

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它（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

三、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目前干部已学习了近一个月，党员、基层干部普遍要求传达，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

如同意，国锋同志准备正式向主席写报告。

毛远新

四月二日

四月二日，北京各单位急急地传达“舆论总管”紧急电话通知：“清明节是鬼节，是旧习。要破‘四旧’，不得在清明节那天搞什么祭奠活动……”

姚文元的电话通知，激怒了人民群众，如同火上加油。

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了！

四月三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就在姚文元希冀“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丙辰年清明节大爆发。

哀思如潮，银花似浪。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被白色的花圈紧紧围裹。每一朵小花，都代表着一颗火热的心。

人民忍受了十年苦难，再也无法咽泪吞声了。

举起笔，诗言志，悼总理，斥妖魔。人们用诗痛驳姚文元：

谁说清明是四旧？
谁说清明习惯臭？
年年奠祭我先烈，
今发禁令何理由？

又有诗道：

前番悼念，
又哄又压。
今朝扫墓，
变本加厉。
言称四旧，
用心毒辣。

还有的诗，诅咒姚文元道：“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他死定无花！”

中国，进入了大拼搏的时刻。

四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以下会议记录，抄自毛远新的记录本，文中的错别字是毛远新记录中原有的：

华（国锋）：

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

很严重，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

吴德：

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2073个，单位1400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三号507个单位送800多个，四号420个单位送450个，大的有六米直径，一部分写人民烈士，一部分写总理。

三号有二十万人，四号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

北京市：广播器材厂（761），曙光电机厂、青云仪

器厂。

重型电机厂送了个钢焊的花圈。送的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多数人是出于怀念总理，有的是学校到那里去宣誓，批邓、教育干部。

四月二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有的煽动、讲演，反动的实质很清楚。

诗词、悼词、小字报，有四十八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敌人利用这件事，性质和南京是一样的。

采取的措施：

1. 当场取证、拍照。向群众说这是反动的。结果有的公安人员被打。

2. 看准了是反动的，有人盯着，离开人群以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拂晓前清理一次，把花圈取走。

看热闹的人是多的。有的坏人来送，带一帮打架的人。

基层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下去了，今天明显减少了，向群众说明是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主席、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群众还是听的，很多人明白以后说不能去上阶级敌人的当，很多单位把花圈折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通知的，知道所谓“总理遗嘱”是敌人造的谣，广大工人说不能上敌人的当。

投入了五千民兵，三千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的身份出现，做了大量保卫、劝说工作。

对外部（地）进入北京的火车车辆，有各种大标语的都在丰台刷掉。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

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

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有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

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是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华：

这次有个迷惑人的借口是《文汇报》的三月六日、二十四日来骗人，说是《文汇报》实际上是攻击中央的。

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的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

即便在那样忙碌的时刻，姚文元仍不忘写日记。他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

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道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

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

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斥“秃子”》怒斥姚文元

“联络员”毛远新也很忙。四月五日，毛远新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文中错别字是原件中原有的：

主席：

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

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有的工厂在动员后仍送去钢铁焊成的花圈。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

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某某人反总理，某某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续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市委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也要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被打伤。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与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批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在群众中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

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石景山）工人可以把“遗嘱”全文背下来，还边读边流眼泪，是上当受骗的。但是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的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芬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正起草）

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万人）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

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

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

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三个营（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止目前（五日晨五时）在五万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传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至战斗。

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

毛远新

四月五日晨

四月五日中午，人民大会堂。一扇玻璃窗后边，一双三角眼在望远镜后面窥视。张春桥看毕，颓然把望远镜递给站在身边的姚文元。面对从四面八方自动涌来的成千上万戴白花、挂黑纱的人们，张春桥和姚文元脸色惨白，手心的冷汗把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愤怒出诗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以后，传诵一时：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朗诵者的脸上挂着轻蔑的冷笑。听众们发出会心的微笑。谁都明白，“江桥摇”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那欲哭无泪的日子里，这首诗唤醒了与人们久违了的幽默感。

另一首题为《斥“秃子”》的诗，锋芒所向，直指姚文元。这首诗痛斥了姚文元的卑劣行径——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姚文元指令《参考资料》（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大参考》）转载香港某报一篇极其恶毒污蔑周总理的文章，往尸骨未寒的周总理身上大泼污水：

二月六日大参考，
为何举起敌人刀？
是疏忽吗？
不，是鬼花招！
必须老实交待，
是谁拍板定稿？
你想造谣中伤吗？
总理白璧无瑕，品德崇高。
你想借刀杀人吗？

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
来吧，
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

又有一首《秃儿想掘坟》，怒斥姚文元：

神州欲变，
风雨已迷天。
昏星暗月，
红日当空已难显。
自从总理别世去，
灰撒锦绣江山。
百花痛，含悲念，
声泣语更咽，
人心皆怀念。
秃儿想掘坟，
悲剧又重演。
妖婆想统赤县，
自称武则天。
长江日夜向东流，
聚义群雄在人间。

还有一首《三人只是一小撮》，诗中暗藏“桥”、“摇”、“江”，谁都明白所指何许人：

断桥飘摇春寒冷，
浦江浊水走鱼精，
挥手撒下铺天网。

刀下鱼精现原形。

在诗潮怒火之中，密探混迹于人群，抄来天安门广场上一首首“反诗”，如利箭钻心。姚文元自知“江桥”在“摇”，面临倾覆的危险。

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他所“目睹”的“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四月五日日记：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万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

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儿，解放军管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北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

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姚文元预感到末日不远了。他，磨刀霍霍，要以笔为刀进行大讨伐了……

“戈培尔第二”

在“四人帮”之中，姚文元处于最前线。这位“舆论总管”每天都要发布消息，指挥舆论工具。

姚文元尤其严密控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叫鲁瑛。姚文元不断给鲁瑛发出指示……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鲁瑛。

鲁瑛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硬朗，居然还在上班！

据鲁瑛说，他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出生于山东黄县。黄县位于渤海之滨，烟台之西，招远之北。黄县当年是山东的富县。谚云：“山东一百零八县，饿死一百零七县，饿不死黄县。”鲁瑛说，尽管如今连他的身份证上都写着“鲁瑛”这名字，其实他并不姓鲁。他原名刘殿松。现在除了档案上的记载之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鲁瑛这名字，像女性的名字。他这么个七尺男子，怎么会取了个“鲁瑛”的名字？面对我的提问，鲁瑛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起了“鲁珉”，我马上记起这十分熟悉的名字。在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担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曾是重要的人物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林彪之子林立果在北京西郊机场，向鲁珉出示了林彪的手谕，要鲁珉驾机炸毛泽东专列。鲁珉深知此事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把眼睛弄红肿了，

第二天住进医院，躲避此事……紧接着，便发生了林彪在蒙古“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

我问鲁瑛：鲁珉是不是你的兄弟？

鲁瑛笑道，鲁珉其实也不姓鲁，原名刘振渊，只是他的中学同学而已，不是兄弟。

原来，鲁瑛和鲁珉在中学里，都是“展扬户”——也就是“冒尖户”。不仅成绩优异，而且体育运动也很突出。那时，不论是篮球、排球、马拉松跑、撑竿跳高、徒手跳高，鲁瑛都是全校第一；鲁珉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样样在行。

此外，班上还有一个同学，名叫曲道原，在美术方面是“冒尖户”。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三人都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想去报考设在根据地曲阜的山东大学。不过，生怕去了根据地会连累家人，他们三人决定改名换姓。换什么姓呢？他们三人都一致同意改姓鲁，因为鲁是山东的简称。至于名字，都用“王”字旁，起好三个名字：“瑛”、“珉”、“琦”。谁叫什么名字，以抓阄来定。

刘殿松第一个抓阄，抓了个“瑛”字。他很不高兴，觉得这名字像女人的名字。但是这名字已经抓在他手里了，不肯也得肯。刘振渊抓了个“珉”字，从此叫鲁珉。曲道原则从此叫鲁琦。

不过，临出发之前，鲁琦给家里拉回去了。鲁瑛和鲁珉进入了根据地，进入了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鲁瑛分配在第四班。那时候，条件很差，学生们睡地铺，挤在一起。鲁瑛传染上疥疮。

就在这时候，部队来挑人进空军。鲁珉身体棒，被选中了，进入空军。照理，鲁瑛也完全可以进入空军，只是那讨厌的疥疮，使他在体检时遭到否定！

后来，鲁瑛被分配到文教部门：先是到山东《渤海日报》当记者，后来进入山东《大众日报》。接着来到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

在电话里，姚文元一道道指令通过鲁瑛之后，很快地就在《人民日报》上体现出来。

姚文元通过鲁瑛，还紧紧抓住内部刊物《情况汇编》。在四月五日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一连出了十几期《情况汇编》。

《情况汇编》的印数很有限，可是，在姚文元看来，比《人民日报》还重要。姚文元曾说过："这个小报，比几百万张报纸的作用还要大。"

为什么呢？因为《情况汇编》直送毛泽东。卧病之中的毛泽东，无法像过去那样走遍山山不水，只能靠一纸《情况汇编》了解外面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作出决策——发布"最高指示"。另外，《情况汇编》也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同样也影响着这些高层政治人物的视听。

在姚文元的把持下，《情况汇编》变成了《谎报汇编》。

四月四日，《情况汇编》上原本编入了一首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满江红·敬周试作》：

> 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烧，拍案起。
>
> 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

姚文元大笔一挥，斧去上半阙。再删去"捍卫咱，周总理"以及结尾句，变成了"民同者，团结紧，拿起火与铁，准备决

战”。然后，姚文元加上批语：“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外，还想搞行动。”本来，那首《满江红》纪念周恩来、斥骂“四人帮”是很鲜明的，经姚文元一删、一批，变成了“反党”、“反革命”。

四月五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贴出一首五言诗，把“四人帮”比做“闹鬼”、“豺狼”：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姚文元拿到抄件之后，竟把“泪”字改成“血”字，变成了“洒血祭雄杰”。光是这么改，意犹未尽。他从探子们抄来的许多诗挑选了一下，选出另一首，加以删节，与那首五言诗“拼接”。虽说一首五言，一首自由体，“拼缝”非常明显，“舆论总管”也不管了：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姚文元把这首诗编入《情况汇编》，并亲笔加了这样的按语：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这期《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果真震怒了，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首诗，也就被认为是天安门诗歌中“最最恶毒”的一首，定为“〇〇一号反革命诗词”，交公安部门立即作为要案加以侦查。

姚文元的造谣“想象力”异常丰富，以至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他甚至说，在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哪里是在给周总理献给花圈，那分明是在祭奠蒋介石！

怎么会扯上蒋介石呢？原来，姚文元从港台报道中见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举行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纪念典礼——蒋介石是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去世的。姚文元移花接木，把与此毫不相干的天安门事件，硬跟蒋介石之死牵扯在一起。

其实，这位“舆论总管”，早就精熟“移花接木”术：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际，新华社要发出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主席台上交谈的照片，姚文元“审查”时，认为应当“加”上王洪文。于是，从别的照片上剪下王洪文，“移”入毛、周之间。

江青见到记者拍的她与许世友在一起的照片，便给“舆论总管”打来电话：“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春桥在一起。”于是，姚文元下令，把照片上的许世友头像换上了张春桥的脑袋。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病逝。新华社选了一九六四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毛泽东、朱德到机场欢迎的照片，准备发表。姚文元一“审查”，下令剪去毛泽东和朱德，顿时，变成了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机场……

当年，纳粹德国有位大名鼎鼎的“舆论总管”——宣传部长戈培尔，以撒谎、造谣著称于世。姚文元居然成了“戈培尔第二”。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揭发材料：

中央宣传口并报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社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今年（引者注：指一九七六年）三月底，清明节前，许多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

献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花圈。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南京事件后，姚文元两次指令鲁瑛：“要注意北京的情况。”并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鲁瑛秉承姚文元的黑指示，派记者日夜轮流守在天安门广场，收集情况。根据有关记者的揭发，并查看了姚文元对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编发的十二期《情况汇编清样》（这是专送姚文元看的，经他修改、同意后，才能印成《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政治局。以下简称《清样》）的亲笔修改件，证实“四人帮”在处理材料中耍了许多阴谋，搞了不少假情况，蓄意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扣发或删去有关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内容。

例如：四月一日和四月四日上午的两期《清样》，除有一部分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外，主要是反映群众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规模，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情景，姚文元全部扣住不发……

二、对广大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内容，姚文元作贼心虚，大砍大删。

四月三日的《清样》，反映了一份《倡议书》的下列内容：“说共产主义的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修正主义者们，凭说共产主义的空话，窃取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灵魂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清样》还反映了一些诗词的内容，如：“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桥红霞现。”这些内容，都被

姚文元一笔勾销了。

四月四日的《清样》上，刊登了署名“首都几名红小兵”的一首诗：“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不要小看。”还刊载了署名“北京地安门中学学生”写的题为《承志捉鳖》的诗：“何惧寒风刺骨，誓把妖叛全消灭。敢翻怒涛下海洋，捉贼鳖！”姚文元也全部删掉……

三、肆意删改，颠倒是非，给群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

例如：四月三日的《清样》上，刊载了一首诗：“丹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强加了如下罪名：“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四月四日《清样》刊载的一首题为《清明节呐喊》的诗写道：“……‘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姚文元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了一段话，恶毒地叫嚷：“这除了上海之外，还把矛头指向辽宁，暴露了策划者的一部分意图。”

四月五日的《清样》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因此，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许多人叫着：‘打死他！打死他！’”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删去了“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句。经他这样一改，是非完全颠倒，对诬蔑周总理的坏蛋表示极大义愤的革

命群众，却成了无缘无故要“打死人”的“暴徒”。

四月五日的同一期《清样》说：“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有了，便聚众‘抗议’。”姚文元把“有人”改成“一小撮坏人”，把“聚众”改成“煽动一伙人”。经他一改，那些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竟变成了“一小撮坏人”。

四月五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四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四月四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份材料，文中写道：“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报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四月三日和四月四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四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四月五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四月八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

同鲁瑛联系密切。

四月五日凌晨五时，王洪文窜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作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四月七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把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四月六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会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姚文元在日记中所记毛泽东的话“士气大振，好！好！好”！是毛泽东在四月六日与“联络员”毛远新谈话时说的。

紧接着，在四月七日上午八时五分至九时十五分，毛泽东听

毛远新汇报，又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远新整理的谈话记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

（我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我：登报？）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等。

（我：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我：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我：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我：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

（我：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惟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极不正常。

一九八〇年十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
>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
>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

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

异常忙碌。他在四月七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导，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

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

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

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萧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

了写稿的战斗。

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

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

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着，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成“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

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

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儿，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

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纪念。（引者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二六五期等四期简报订在日记中，留作“纪念”。）

姚文元日记中所写及的“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是指四月七日晚上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项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

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中共中央两项决议。从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起，姚文元开动造谣机器，在全国各报刊登《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长篇文章，对革命人民极尽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显得异常兴奋，在四月八日的日记中居然还“作词一首”：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

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 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 社会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 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
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
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嚎风四起，恶鬼逞狂凶。
工农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涛涌，扫黑风。
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
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
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写着：

“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

信封背面却写着：

“请戈培尔编辑收”

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一张四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登着那篇《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报》刊头，那“人民”两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谣”两字，成了《造谣日报》。

报上，加了正气凛然的批注：

“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

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这就是人民的声音！“舆论总管”见到了《人民日报》社作为急件送来的这封信，气得嘴唇都发紫了。

一个多月以后——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长文《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审看大样时，反复捉摸了文中一句结论性的话：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为，这句话还“不够深刻”，拿起秃笔，圈去那个“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变成：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是怎样闹起来的呢？它的根子在党内，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舆论总管”开足了宣传机器，把成束成排的“纸弹”朝邓小平倾泻！

姚文元以墨写的谎言掩盖血写的事实，把落日的余辉吹嘘成灿烂的朝霞。

越近末日，这位“舆论总管”越是疯狂。在他“总管”之下的舆论，造谣惑众，欺上瞒下……

捏造“毛主席临终嘱咐”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舆论总管”到了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这位“总管”肩负着他的伙计们的重任：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为“四人帮”夺权制造舆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姚文元在毛泽东刚刚去世时，就已经担心会发生“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这样的事——言外之意，会发生突然事件！

鲁瑛这样写道：

> 九月九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毛泽东逝世）任务后，把我留下来单独密谈。
>
> 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
>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
>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
>
> 他还指使我说：“主席逝世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会乘机捣乱和破坏，你们要密切注意情况，及时反映。对内部也要布置一下，做些准备，包括你们几个负责人的安全。”
>
> 根据姚文元的指令，我当即返回报社找萧泽曜、刘治平（党组成员）进行布置、传达，派出民兵昼夜加强巡逻、值班，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已不省人事，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舆论总管”姚文元居然捏造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舆论总管”的指挥下在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向全国公布“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这么写道：

>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
>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
>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在这篇社论中，以黑体字印着“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在“文革”中，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在报纸上，凡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排印。这“按既定方针办”既然是用黑体字排印，便表明是毛泽东的话。

这篇社论的原稿上，本来是“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姚文元审阅时删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之感。

对于“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接受审讯时是这样解释的：

> 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
> 审讯员问：“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
>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

“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按“文革”方针办。“四人帮”的命运，是与“文革”休戚相关的。

从此，“按既定方针办”，成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宣传总纲领。

此后，围绕着这句“按既定方针办”的真伪，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姚文元一次又一次给新华社打电话，强调“按既定方针办”。他的“指示”，又迅即由新华社传向全中国每一根宣传神经。

据新华社电话记录稿，查到姚文元的一系列“指示”：

九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指示：

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九日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

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

5.关于三要三不要（引者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提出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九月二十日

（凌晨）二时文元同志又来电话：补充一点，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九月二十三日夜

文元同志告：

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九月三十日

文元同志凌晨三时电话：

三十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遗志，化悲

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就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的当天，叶剑英把《人民日报》送给华国锋。叶剑英用红铅笔在那句“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根红杠，然后在旁边打了个大问号“?”。

叶剑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华国锋注意这句话。

华国锋当时看了，却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论发表的翌日——十月十七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一百二十五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时，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空气。

报道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森的发言：

“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报道又引述清华大学工宣队员王玄元的话：

“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其实，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人，未必说得出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四人帮”手下的那些秀才们借这些人之口，通过《内部参考》，制造“临终嘱咐”的舆论气氛罢了。

也就在九月十七日，上海的《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了四个醒目的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而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基地”。

正因为这样，《解放日报》紧跟“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宣传为追悼毛泽东的最重要的主题词。

于是，叶剑英又一次提醒华国锋。

叶剑英向华国锋指出：

第一，华国锋过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传达过，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及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泽东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

第二，有人已经在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实，这不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因为四月三十日距毛泽东去世还有四个多月，那时毛泽东还在会见外宾，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

经叶剑英这么一提醒，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本来，他以为“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意思差不多。

由于华国锋开始注意这件事，所以他在九月十八日追悼毛泽东的大会上致悼词时，就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一侧的王洪文，显得焦躁不安。

后来，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九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审讯时，作了这样的交待：

>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

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这就是说，“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其实不是按字面解释这两句话本身的含义有多大区别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究竟对谁说的，亦即涉及毛泽东要谁接班的这一重大问题！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毛泽东去世前四天，即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如果真的如张春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把“临终嘱咐”向他说了，那么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华国锋，而是张春桥！

只是张春桥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除了张春桥和毛泽东外，并无他人。所以，毛泽东如何“拉着他的手低声说”，连王洪文都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九月十九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写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

“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

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九月三十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十月一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十月二日，当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

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就等于零。

末日的疯狂

姚文元已经清楚地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姚文元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只是他不敢把这封信在“四人帮”中传阅。

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他谈到这封来信：

问：继续交待向你提出的问题。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

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一九七六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另外，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了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一方面，又觉得是不是

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

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相，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是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

十月三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在中央专案组一九七九年整理的《姚文元案卷》第二一二卷，有这样一段揭发材料：

姚文元同鲁瑛的第四次密谈，是为了组织“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

“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败露后，鲁瑛继续参与阴谋活动。

十月三日，姚文元又把鲁瑛找到他家密谈。姚文元告诉鲁瑛“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一方面要他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要他通知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把关；另一方面要他派人搞反调查。

鲁瑛立即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进行反调查，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

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姚文元还要鲁瑛派的人质问谷牧同志，要他“讲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在所写的交待材料中，也讲到姚文元要他进行反调查一事：

十月三日。姚文元又把我找到他家中对我说：

“按既定方针办出了问题，有人要借社论引用主席这句话大作文章，攻击《人民日报》。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后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反不起来了，有的可能要翻案。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为了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姚文元还指使我：一方面采取措施，在报上逐步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并让我通知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把好关；一方面又让我派人搞反调查。

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我回到报社就直接打电话给刘湘萍（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等人核对，同时派出崔奇、张沛四下活动，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原话，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在十月四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

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七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要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

给华国锋。

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四人帮”已经箭在弦上。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

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①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上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十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

① 吴江，《十年的路》，第九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二版。

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以为，必须“快打慢”。

历史的车轮毕竟无法逆转。“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十年，“四人帮”气数已尽，濒临覆灭的时刻到了。

“舆论总管”在覆灭前夕，一边指令全国各报转载《光明日报》在十月四日发表的“帮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边又在一篇经他三次审改的更恶毒的黑文上，写了如下“批示”：

“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

可是，这一回“舆论总管”的指挥失灵了。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并未在头版头条发出那篇文章。

因为就在姚文元写完那条“批示”不久，一副锃亮的手铐，咔嚓一声，套在他的手腕上。那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终于束手就擒

关于十月六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十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十月四日晚上十一时至五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第二天，也就是六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

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呢？

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毛主席逝世前后，你同江、张、王还有什么接触，有些什么议论？

姚：毛主席病重后，江、张、王都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朝夕相处，议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主席逝世后，张春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中南海，不久就搬回了钓鱼台，我去看过他两次，最后一次是十月六日下午。

问：你同张春桥都谈了些什么？

姚：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当时张春桥还讲了一件事，他说：那个批邓的小册子，华主席压了很长时间没有批，是他催了几次才批下来，还说那几本东西他（华国锋）根本没有看。张春桥讲这番话是攻击华主席批邓不积极。这正说明了华主席对批邓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另外，我们还谈到江青。

问：你们都谈了什么？

姚：张春桥问我最近和江青的关系怎么样了？我说：还好，比较缓和了，内参的问题做了新的处理。张春桥希望我主动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团结。

问：内参是怎么回事？

姚：毛主席逝世后，新华社有篇内参，把江青怎么找手工艺工人做花圈（是给毛主席送的），怎么讲文冠果是“文官国”，说得比较具体。不知哪些话江青不满意，对我发了很大的脾气，又把新华社记者找到她家里，要他们重新写了才算完事。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姚：张春桥还谈到出版毛选五卷的事，他说：“已找李鑫谈过了，我对出版毛选的具体意见给华国锋写了信。”随后，张春桥又攻击叶副主席。

问：他说些什么？

姚：张春桥说：“最近叶剑英接见了一个美国人，有个外事记者，你见到了吗？”我问：“是九月二十七日他会见美国前国防部施莱辛格那一次吗？”张春桥点点头说：“他把杨成武也叫去了，讲的还是过去那一套。这些人，要改变观点也难呢！”我附和着说：“那个记录我看过了，强调的还是海军。”

问：这是什么意思？

姚：叶帅过去（一九七三年）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我的意思是说叶帅太强调海军的作用了。最后张春桥说：“我想总要开三中全会吧，但还没有考虑好，你有什么想法？”我说：“华国锋当主席，应当在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现在政治局办事的人太少，工农都有

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干部。”但我并没有提出具体对象。现在看来，我的后一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当时政治局首先应该增加老同志。张春桥对我提的这两条没有什么反映。我当初还想谈社论问题，但他总是谈别的事情。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这次我同张春桥的议论是“四人帮”的帮派活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天晚上，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有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相。

问：去照相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相？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相。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相。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相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十月六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十月六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

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据行动小组腾和松回忆：

“晚上八时多，姚文元来了。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一九八四年六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九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

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

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惟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

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十月六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尾 声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　　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续上表）

日　　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四人帮”出示证据统计表

被告人	出示证据（件）	出庭证人（人名）	合计
江　青	86	16	102
张春桥	59	5	64
姚文元	35	4	39
王洪文	33	2	35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

“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一九九六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较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档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

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醒目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一九八六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军”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一九六八年六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

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十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三月版）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中所写的“精辟之言”：

>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五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六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六日傍晚，日本《读买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七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十月八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十月六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惟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也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写毕初稿。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改毕二稿。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日完成三稿。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改定，初版本《姚氏父子》付印。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日补充，初版本《姚文元传》付印。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大修改毕，新版《姚文元传》付印。
于上海沉思斋

附录一

姚氏父子书目

姚蓬子书目：

1.《处女的心》，法国，果尔蒙著，蓬子译，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出版，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共224页。

2.《银铃》（诗集），蓬子作，上海水沫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水沫丛书之一。共65页。

3.《妇人之梦》，法国，果尔蒙著，蓬子译，钱牧风装帧，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一九三五年十月二版。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共230页。

4.《我的童年》，苏联，高尔基著，蓬子译，上海大光书局出版。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三一年八月再版，一九三二年十月三版，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共438页。

5.《浮世画》（小说），蓬子作，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二年三月初版。一角丛书之一，赵家璧主编。共61页。

6.《结婚集》，瑞典，斯德林保著，蓬子、杜衡合译，上海大光书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三五年十月三版，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共446页。

7.《剪影集》（短篇小说集），蓬子作，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三三年五月初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再版，一

九三六年七月三版，良友文丛书之一。共251页。

8.《饥饿的光芒》，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短篇小说集），蓬子译，上海春光书店，一九三四年六月再版。

9.《俄国短篇小说集》，苏联，皮涅克等著，蓬子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万有文库全书之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再版。共239页。（注：蓬子的《译后杂记》末写明一九三一年六月于上海，估计可能在一九三一年曾出过初版本，后被万有文库收入重印。初版本不详。）

10.《论胡适实用主义》，蓬子著，出版年月不详（在姚文元档案中曾提及此书）。

姚文元书目：

1.《细流集》（杂文集），姚文元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初版。收文章二十九篇。全书127页。

2.《在革命的烈火中》（杂文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初版。收文章五十五篇。全书230页。

3.《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文学评论集），姚文元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初版。收文章十二篇。全书359页。

4.《革命的军队　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点》（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版。全书33页。

5.《兴灭集》（杂文集），姚文元著，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初版。收文章四十六篇。全书190页。

6.《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丛书），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初版。全书247页。一九六四年第五次印刷时改版。全书276页。

7.《冲霄集》（杂文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五

月初版。收文章四十一篇。全书160页。

8.《新松集》（文艺评论集），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版。收文章三十一篇。全书347页。

9.《想起了国歌》（杂文集），姚文元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七月初版。收文三十五篇。全书174页。

10.《文艺思想论争集》，姚文元著，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三年九月新一版。收文章十二篇。全书356页。

11.《在前进的道路上》（文艺评论集），姚文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一九六五年九月初版。收文章二十四篇。全书362页。

12.《为革命而生活》（杂文集），姚文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于一九六六年四月排出校样本，未出版。收文章三十八篇。全书230页。

1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版。

14.《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四月版。

15.《纪念鲁迅，革命到底》，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

16.《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一月版。

17.《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七月版。

18.《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姚文元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八月版。

19.《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三月版。

附录二

姚文元文章目录

（凡署笔名的，在括号内注明）

1.《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志毅），一九四九年四月收入《细流集》。
2.《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青年报》。
3.《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十二期《解放日报》。
4.《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卷二期《文汇报》。
5.《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期《文艺报》。
6.《错误的了解》，一九五三年五月十期《文艺报》。
7.《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期《文艺报》。
8.《路是人走出来的!》（志毅），一九五四年十月四十二期《展望》。
9.《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九五五年一月一至二期《文艺报》。
10.《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

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11.《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期《文艺报》。

12.《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13.《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解放日报》。

14.《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解放日报》。

15.《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16.《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17.《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新闻日报》。

18.《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19.《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20.《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四日《青年报》。

21.《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22.《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23.《请简单明确的讲话（党员来信）》，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24.《和徐中玉先生商榷几个问题》，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25.《理论家和墙头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新闻日报》。
26.《在酷热中战斗的上海》，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27.《对生活冷淡的人》，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28.《坚持“真理”的火鸡》，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新闻日报》。
29.《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作，收入《细流集》。
30.《僮族青年的歌声——读龙金珊的两首诗》，一九五六年六期《萌芽》。
31.《刻苦学习，永远前进！——介绍鲁迅的学习精神》，一九五六年七期《萌芽》。
32.《“扶得东来西又倒”》，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33.《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一九五六月九月二十三日《劳动报》。
34.《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对宋禾同志一文的意见》，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作，收入《细流集》。
35.《谈猎奇心理》，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新闻日报》。
36.《锋芒篇》，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37.《关于“名单学”及其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期《文艺月报》。
38.《致埃及兄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解放日报》。
39.《电车上的杂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新闻日报》。
40.《也谈庸俗社会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41.《馆子里的杂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42.《算命摊旁的杂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

报》。

43.《碎贝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44.《让理想的火焰照耀着你!》，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十八期《展望》。

45.《论对句》，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期《文艺月报》。

46.《人和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解放日报》。

47.《谦虚和圆滑》，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新闻日报》。

48.《回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文汇日报》。

49.《漫谈“同”与“异”——读书杂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

50.《论“为政策去写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51.《“针尖”不要刺错了对象》，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新闻日报》。

52.《时代的歌手在哪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53.《幸福和享受》，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青年报》。

54.《未来集——答杜勒斯“一九五七年幻想曲”》，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文汇报》。

55.《也谈感情》，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56.《谈“一窝蜂主义”》，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新闻日报》。

57.《量衣台边的杂感》，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大公报》。

58.《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期《文艺月报》。

59.《论“知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文艺月报》。

60.《艰苦和磨炼》，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期《青年报》。

61.《杂谈风格、领导和规格》，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解放日报》。

62.《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文汇报》。
63.《〈细流集〉前记》，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作，收入《细流集》。
64.《影评家和英雄》，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期《中国青年》。
65.《奇怪的“逻辑”——仿鲁迅〈论辩的魂灵〉》，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期《萌芽》。
66.《在“奇案”的背后》，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
67.《拍卖行中的声音》，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解放日报》。
68.《英国人民的愤怒》，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69.《望洋集》，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文汇报》。
70.《论辩出真理》，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71.《顺流和逆流》，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72.《三则广告》，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大公报》。
73.《谈称呼》，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解放日报》。
74.《一点补充——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一九五七年五月七、八日《文汇报》。
75.《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76.《人的价值》，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
77.《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78.《关于青年的杂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劳动报》。
79.《敌友之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80.《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关于“硬骨头”及其他》，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新闻日报》。
81.《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82.《法国人民的觉醒——介绍苏联电影〈第六纵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期《大众电影》。
83.《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84.《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85.《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自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86.《“过去是有功劳的”》，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87.《揭露谜底》，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新闻日报》。
88.《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89.《鲁莽要的是什么把戏?》，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90.《这场“戏”的确“好看”》（文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91.《党颂》（尖兵），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文汇报》
92.《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期《萌芽》。
93.《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
94.《乘胜追击》，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新闻日报》。
95.《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解放日报》。
96.《从“来函照登”说起——对〈文艺报〉上的几篇文章的一些意见》，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97.《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期《展望》。
98.《温情主义及其他》，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99.《丑相》，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劳动报》。

100.《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期《文艺月报》
101.《〈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102.《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103.《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解放日报》。
104.《走哪一条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期《文艺月报》。
105.《不要同时代脱节》，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期《学术月刊》。
106.《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107.《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期《文艺报》。
108.《驳徐中玉向党进攻的六个论点》，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09.《从“这是一场革命”来看问题》，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110.《重视工农知识分子——支持一个读者的建议》，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文汇报》。
111.《十个“客观上”》，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11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期《人民文学》。
113.《在斗争的风暴中所想到的》，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期《萌芽》。
114.《摄影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文汇报》。
115.《平凡的新闻，伟大的道德》，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二日《人

民日报》。

116.《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期《文艺月报》。

117.《人类的骄傲》，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18.《〈在革命的烈火中〉前记》，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19.《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期《人民文学》。

120.《静夜杂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文汇报》。

121.《新的时代、新的美和新的文学——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期《文艺学习》。

122.《聋哑人的幸福》，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期《萌芽》。

123.《“真理归于谁家”？——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124.《“联系实际”的魔术——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125.《术语、花巧、杀气——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126.《“独一无二”的逻辑——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四》，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六日《文汇报》。

127.《无产阶级人性最合情理——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五》，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文汇报》。

128.《徐懋庸提倡的是什么“小品文”？——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七》，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129.《几句结束的话——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八》，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文汇报》。

130.《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九五七年十二

月十二期《文艺月报》。

131.《一种应当抛弃的坏作风》，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新民晚报》。

132.《两条值得注意的消息》，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133.《“梦魇般的生活”》，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期《文艺月报》。

134.《从一套照片引起的感想》，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新闻日报》。

135.《展望未来》，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136.《冯雪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期《文艺报》。

137.《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一九五八年三月二期《收获》。

138.《我永远坚持自己的信念——答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文汇报》。

139.《反对懒惰，发扬干劲》，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解放日报》。

140.《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期《文艺月报》。

141.《战斗生活的颂歌——读〈在和平的日子里〉》，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期《延河》。

142.《辨毒篇——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期《萌芽》。

143.《健康·明朗·朝气——介绍〈爱情的开始〉》，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文汇报》。

144.《亲切而引人上进的书——读〈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作，收入《兴灭集》。

145.《略谈“系统派”和“当前派”》，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收入《兴灭集》。
146.《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期《文艺月报》。
147.《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一九五八年四月《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
148.《谈谈看小说》，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青年报》。
149.《漫谈大学文学理论课》，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文汇报》。
150.《略谈“存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151.《并非“偏见”》，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文汇报》。
152.《鼓掌欢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新闻日报》。
153.《为什么人写作》，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劳动报》。
154.《不要怕》，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日报》。
155.《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期《学术月刊》。
156.《不健康的趣味——评〈球场风波〉》，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期《中国电影》。
157.《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158.《何必害怕》，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解放日报》。
159.《雄心惊得专家叹!》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北京日报》。
160.《“李葳事件”的感想》，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新闻日报》。
161.《介绍〈大跃进〉之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劳动报》。
162.《毒草及锄毒草》，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163.《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序言》，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作，收入《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164.《评〈早霞短笛〉》，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期《文艺月报》。
165.《怎样看待西欧古典文学作品的爱情描写——从〈红与黑〉谈起》，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一期《中国青年》。
166.《如何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期《文学青年》。
167.《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从张狗丢的创造看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量》，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文汇报》。
168.《让诗传单飞遍全市》，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169.《我们工人骨头硬》（诗），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期《街头文艺》。
170.《贯彻总路线，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期《萌芽》。
171.《打倒“假洋鬼子”的派头》，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新闻日报》。
172.《杂感四则》，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文汇报》。
173.《英国佬有啥了不起!》，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期《展望》。
174.《鲜明、乐观、战斗的文学——推荐〈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文汇报》。
175.《漫谈杂文》，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期《新闻战线》。
176.《和平出在斗争里》（诗），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
177.《上游有止境吗?》一九五八年七月作，收入《兴灭集》。
178.《我们不怕战争》，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179.《提高警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新闻日报》。
180.《无耻的骗局》，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181.《“爱和美”的“人生观”》，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

182.《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期《文艺报》。

183.《在跃进再跃进的号角下——记诚孚铁工厂的再跃进》，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期《解放》。

184.《伟大的史诗——论新民歌》，一九五八年九月《跃进文学研究丛刊》二辑。

185.《最新最美的图画——为邳县农民的画欢呼，并谈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性》，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文汇报》。

186.《自套绞索，自掘坟墓，自找死路》，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文汇报》。

187.《论〈林海雪原〉》，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新文化报》。

188.《向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189.《论稿费》，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190.《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几个特点》，一九五八年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1.《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期《中国青年》。

192.《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期《读书》。

193.《歌颂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简评胡万春同志最近的创作》，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期《文艺月报》。

194.《五星红旗射出万道金光——国庆前夕杂谈思想战线二、三事》，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文汇报》。

195.《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论〈青春之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色》，一九五八年十月《语文教学》。

196.《水兵的心，水兵的歌——读〈水兵生活速写〉》，一九五八

年十月十九期《萌芽》。

197.《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期《文学研究》。

198.《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199.《写在影片〈红与黑〉上映的时候》，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期《大众电影》。

200.《丑事奇闻》，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新闻日报》。

201.《文艺界的又一反面教材》（向红），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新民晚报》。

202.《我们在创造着胜利的欢乐——驳对于全民炼钢的“怀疑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作，收入《冲霄集》。

203.《兴灭集》前记，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作，收入《兴灭集》。

204.《这些“豪客”是什么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新闻日报》。

205.《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期《解放日报》。

206.《小饭店里的杂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207.《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下乡劳动的杂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208.《大家动手写文艺评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209.《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期《文艺月报》。

210.《一幅优秀的照片剪贴》，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

汇报》。

211.《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期《剧本》。

212.《介绍刘白羽的〈政治委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期《文学书籍评论丛刊》。

213.《利用科学规律一例——鸡也在嘲笑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

214.《巴金作品的讨论，分歧的实质在哪里?》，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期《读书》。

215.《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介绍〈毛泽东论文艺〉》，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文汇报》。

216.《他们为什么狂吠?》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国青年报》。

217.《无产阶级的英雄花——论革命传记文学》，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期《文艺月报》。

218.《略论辩证法、片面性和折衷主义——和巴人同志讨论两个问题》。

219.《三种人的三种“冷”》，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青年报》。

220.《永远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期《解放》。

221.《发扬“闲不住”的精神》，一九五九年二日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222.《百折不回》，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新闻日报》。

223.《“蛇足”与“议论”——为诗中的“议论”一辩》，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文汇报》。

224.《论〈白兰花〉和〈丁佑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

比》，收入《新松集》。

225.《重读鲁迅的〈拿来主义〉》（金兆文），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期《解放》。

226.《漫谈读书》，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文汇报》。

227.《“罪不在书本”的提法不确切》，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文汇报》。

228.《点滴集》（六则），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229.《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肖尧），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期《解放》。

230.《春风桃李花开日——谈谈群众业余创作中反映工人生活的一些优秀的小说和特写》，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期《文艺月报》。

231.《一个深刻的悲剧——论鲁迅的〈伤逝〉》，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期《萌芽》。

232.《多读点理论书还是多读点文艺书?》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文汇报》。

233.《这是什么“人道主义”?》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文汇报》。

234.《从古人谈读书中得到的“借鉴”》，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文汇报》。

235.《写声音》（文艺漫谈），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期《萌芽》。

236.《学而思小札》，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文汇报》。

237.《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新闻日报》。

238.《略谈“命题作文”——和徐鳌先生商榷》，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

239.《鼓劲集》，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期《解放》。

240.《点滴集》，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收入《冲霄集》。

241.《千秋浩气入诗篇——读〈革命烈士诗抄〉》，一九五九年六

月十二期《解放》。

242.《长江中的一个小片断——读〈虚惊〉有感》，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九日作，收入《冲霄集》。

243.《论〈风雪之夜〉》，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期《延河》。

244.《“废物”中有奇珍异宝——读书札记》，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245.《“想”作用》，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新闻日报》。

246.《点滴集》，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文汇报》。

247.《读〈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给胡万春同志的一封信》。

248.《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期《支部生活》。

249.《鲁迅论文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七、九两章》，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期《收获》。

250.《尼克松的“拿着吧”》，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新闻日报》。

251.《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252.《钢人颂》（向红），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解放日报》。

253.《特殊性格的人》序言，一九五九年八月作，收入《新松集》。

254.《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期《解放》。

255.《一点余文》，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256.《人民公社颂》，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257.《还有一点余文》，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258.《惊回首，喜欲狂》（向红），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解放日报》。

259.《倒霉的诽谤家》（向红），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期《解放》。

260.《是满腔热情，还是泼群众冷水?》，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十八期《解放》。
261.《是谁最热心大跃进?》，一九五〇年九月九日《解放日报》。
262.《童话中的真理——读〈宝葫芦的秘密〉》，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期《红旗手》。
263.《鲁迅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反动文艺的批判》，一九五九年九月至十月，九、十期《语文教学》。
264.《论动摇》，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解放日报》。
265.《这是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文汇报》。
266.《英雄的梦》（向红），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267.《江边断想》，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北京日报》。
268.《鼓足干劲，乘风前进——从鲁迅先生对培养新生力量的意见谈起》，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269.《读列宁给高尔基的三封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270.《〈冲霄集〉前记》，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作，收入《冲霄集》。
271.《总路线上群英会》（向红），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272.《论辩和推荐——杂感二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期《上海文学》。
273.《不让一个同伴掉队》（向红），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解放日报》。
274.《老话》，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275.《谈标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解放日报》。
276.《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期《语文学习》。

277.《评〈草原烽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期《文艺报》。
278.《响彻云霄的赞歌——读〈红旗歌谣〉》，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期《安徽文学》。
279.《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一九六〇年一月二期《文艺报》。
280.《用什么态度去读文艺作品?》，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九日《青年报》。
281.《在斗争中发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期《上海文学》。
282.《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一九六〇年三月六期《解放日报》。
283.《伟大的“公”字》，一九六〇年二月六期《萌芽》。
284.《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批评——读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一九六〇年四月四期《上海文学》。
285.《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的观点》，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期《上海文学》。
286.《冰块挡不住奔流》（向红），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287.《前进的“脚印”》，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文汇报》。
288.《我们绝不能“忘掉”》（向红），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289.《走狗显原形》，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290.《群众创作的新花——评上海电机厂职工群众创作选集〈大风暴中的故事〉》。
291.《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答陈恭敏同志》，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期《剧本》。
292.《天下无废物》（金兆文），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期《解放》。
293.《肮脏的自白——斥美国现代反动堕落的“垮掉文学”》，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新民晚报》。

294.《为人民的幸福而思索》，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295.《一个大阴谋——杜勒斯的几笔黑帐》，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296.《介绍〈萧三诗选〉》，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297.《粉碎美帝国主义这个大阴谋》，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298.《迅速反映新事物，热情歌颂新事物》，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期《萌芽》。
299.《奴才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期《解放》。
300.《艾森豪威尔的“非暴力论”》，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301.《革命文艺的战斗纲领》，一九六〇年八月八期《上海文学》。
302.《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把兴无灭资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30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读〈创业史〉》，一九六〇年九月第十七至十八期《文艺报》。
304.《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谈李准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305.《这就是主人翁的态度》，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06.《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颂歌——评〈以革命的名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期《上海电影》。
307.《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期《上海文学》。
308.《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一九六一年一月

十七日《文汇报》。

309.《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人民》，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310.《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美学笔记之二》，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

311.《“红色娘子军”的思想意义》（金兆文），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期《解放》。

312.《艺术的辩证法——祖国美学遗产初探、美学笔记之三》，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期《学术月刊》。

313.《古今谈》，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314.《〈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改版后记》，一九六一年八月作，收入《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315.《艺术的辩证法——美学笔记之四》，一九六一年八月七、八期《上海戏剧》。

316.《“烂桃”和“萌芽”》，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317.《学习鲁迅的文风——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期《解放》。

318.《关于“锥刺股”》，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文汇报》。

319.《蟹的杂感》，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文汇报》。

320.《天才与勤奋》（金文），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期《解放》。

321.《大跃进的果实》，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文汇报》。

322.《另一种毒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文汇报》。

323.《诗的警语》，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文汇报》。

324.《论艺术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一期《上海文学》。

325.《夜读偶感》，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326.《〈新松集〉前记》，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作，收入《新松集》。
327.《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328.《看花漫笔》，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329.《评〈擂鼓集〉》，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期《上海文学》。
330.《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美学笔记之六》，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三期《新建设》。
331.《革命志气和踏实作风的力量——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一》，一九六二年三月三日《文汇报》。
332.《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形象——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二》，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
333.《想起了国歌》，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解放日报》。
334.《并非“挨批”》（尖兵），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335.《第一位的工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期《山东文学》。
336.《黑牢中的红鹰——赞〈红岩〉》，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期《四川文学》。
337.《须要总结文艺工作者成长道路上的经验》，一九六二年五月九、十期《中国青年》。
338.《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文汇报》。
339.《关于郑板桥的“狂”》，一九六二年五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40.《郑板桥家庭教育一事》，一九六二年五月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41.《咏物杂感（江河、红绿灯、相片）》，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

八日《解放日报》。

342.《一点辩证》，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343.《从播种到收获》，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344.《“七一”抒情》（顽石），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解放日报》。

345.《革命的传统力量》（顽石），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346.《手表和挂表》（何白），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347.《找》（顽石），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348.《赌棍的自白》（针锋），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349.《读报偶感》，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0.《躲不开，赖不掉，骗不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351.《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谈唐克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九期《上海文学》。

352.《不可征服的人——谈杜鹏程短篇小说集〈年轻的朋友〉中的人的形象》。

353.《草原在歌唱——读短篇小说集〈遥远的戈壁〉》，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354.《“大道理”的力量》（顽石），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355.《〈想起了国歌〉后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6.《生气勃勃的农村图画——读浩然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357.《革命的“红玫瑰花”——读〈甘蔗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期《上海戏剧》。

358.《垂死阶级的心理》（顽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

359.《反映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读〈傲霜篇〉和〈壮志录〉有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360.《垂死的阶级心理》（之二）（顽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361.《“有这样一个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362.《新年买鬼》（向红），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文汇报》。

363.《提倡多一点热气腾腾的短文》，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

364.《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365.《颂“三宝”》（顽石），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366.《传播科学　破除迷信》（顽石），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367.《〈母亲〉的思想意义——重读〈母亲〉，并以纪念高尔基诞生九十五周年》，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368.《论艺术分类问题——美学笔记之七》，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期《新建设》。

369.《光辉的“灵魂工程师”——推荐〈红色宣传员〉》，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期《上海戏剧》。

370.《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思想阵地》（顽石），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解放日报》。

371.《手的解放》（顽石），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解放日报》。
372.《这不仅是家庭问题——读〈家庭问题〉》，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373.《为革命而读书》，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十一期《中国青年》。
374.《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文汇报》。
375.《“和群众一起革命”》（金人），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376.《奇解一则》，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文汇报》。
377.《宣传唯物主义　破除迷信思想》，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378.《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期《文学论评》。
379.《辩“义气”》（葛铭人），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文汇报》。
380.《析“苦学”》（葛铭人），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文汇报》。
381.《“谁该掩鼻?”》，一九六三年七月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2.《谈“化装”》（葛铭人），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文汇报》。
383.《几句补充的话》，一九六三年，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4.《无产阶级的父子情》一九六三年，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5.《防“落井”》（葛铭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
386.《从德彪西讨论想起的》（群山），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文汇报》。
387.《从德彪西想到星海》（铭人），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文汇报》。

388.《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389.《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春之歌——评〈年青的一代〉》，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期《文艺报》。

390.《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

391.《为革命而生活，还是为爱情而生活?》，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九期《中国青年》。

392.《爱“未来”》（葛铭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九日《文汇报》。

393.《破“而已”》（葛铭人），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六日《文汇报》。

394.《〈文艺思想论争集〉再版序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作，收入《文展出思想论争集》。

395.《这股风和那股风》（闻潮），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

396.《歌颂为主》（闻潮），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397.《破“陈腐旧套”——也算纪念曹雪芹》（葛铭人），一九六四年二月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98.《首先做革命派》（闻潮），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399.《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期《收获》。

400.《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一九六四年三月第六期《红旗》。

401.《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一九六四年六月十日《光明日报》。

402.《冰山雪岭奏新歌——推荐短篇小说〈迎冰曲〉》，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403.《革命的歌声是千百万群众的歌声》（闻潮），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404.《两种“境界”》（闻潮），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05.《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分析几个反映青年生活道路的优秀作品的思想意义》，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06.《韧》（闻潮），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解放日报》。

407.《读〈故事会〉》（金向红），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408.《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读〈故事会〉》（金向红），一九六四年九月九辑《故事会》。

409.《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410.《新事物的灿烂光辉——赞越剧〈春风送暖〉》（闻潮），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411.《名词小议》（葛铭人），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12.《驳“写普通人”——对于一种“写中间人物”论点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期《萌芽》。

413.《〈在前进的道路上〉前记》，一九六五年三月作，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14.《向革命故事学习》，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期《文艺报》。

415.《化仇恨为力量》（闻潮），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解放日报》。

416.《叛徒的逻辑——看戏有感》（永红），一九六五年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17.《革命辩证法的胜利》（闻潮），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

418.《赞“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葛铭人），一九六五年七

月四日《文汇报》。

419.《有革命远见的英雄们——谈谈两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几个英雄人物的特色》（葛铭人），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三日《文汇报》。

420.《敢教日月换新天——影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观后》，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解放日报》。

421.《写出劳动人民的斗争史——从一位老贫农的批评中得到的启发》（葛铭人），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422.《团体操中的真理》（金向红），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423.《“君子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风格》（顽石），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解放日报》。

424.《这是什么样的“爱”——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一》（闻潮），一九六五十月十一日《解放日报》。

425.《虚伪的“良心转变论”——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二》（闻潮），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426.《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葛铭人），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427.《高潮后的高峰》（葛铭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文汇报》。

428.《轻装前进》（金向红），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报》。

429.《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430.《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闻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期《学术月刊》。

431.《欢迎“破门而出”》（劲松），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文汇报》。

432.《为革命而生活》后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收放《为革命而生活》。

433.《哪个阶级的立场》（牛子明），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434.《“吃人”的“光明面”》（牛子明），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文汇报》。

435.《“似曾相识”的论调》（牛子明），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文汇报》。

436.《为谁化装》（伍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437.《奇妙的逻辑——录以待考》（伍丁），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438.《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伍丁），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439.《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解放日报》

440.《“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劲松），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

441.《纪念鲁迅　革命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解放日报》、《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十四期《红旗》。

442.《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九六七年一月《红旗》。

443.《〈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444.《在阿尔巴尼亚共青团“五大”的贺词》，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445.《评陶铸的两本书》，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红旗》。

446.《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

民日报》。

447.《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448.《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九七五年三期《红旗》。

附录三

关于姚蓬子的通信

叶永烈致施蛰存

施蛰存先生：

您好！

上次拜访您，承热情接待，不胜感谢。我写的长篇《姚氏父子》，已于今年十九期起连载于《新观察》。目前在作修改，出单行本。

有一事请教：

据《新文学史料》今年一期所刊丁玲回忆录，谈及她认识姚蓬子，是去松江出席您的婚礼。丁玲回忆说，那是“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但我从《现代家庭》杂志查到关于您和夫人陈慧华的报道《淡如水，甜如蜜》，内中提及结婚在一九三〇年，不知丁玲记忆有误，还是《现代家庭》的报道有误？这涉及丁玲与姚蓬子第一次认识的时间。我想，您是清楚记得结婚的日期，便中请拔冗函告婚礼的年、月、日，以求准确。

麻烦您，望谅。

祝

如意！

叶永烈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八日

施蛰存致叶永烈

永烈同志：

惠书敬悉，我们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四日，丁玲所记不误。《现代家庭》可以说是约数。

林徽因（女）在北京，林微音（男）在上海。参加婚宴的是林微音。

蓬子家乡有人在沪，要访问蓬子事，你想必已知不少，可否让我介绍其人来访问你？

此复恕草草。

施蛰存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叶永烈致施蛰存

蛰存先生：

大函敬悉，非常感谢！

您的结婚日子，我查了一下万年历，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这样，我可以把这一确切日期写入蓬子传记。

我已从《文学月报》等许多杂志查到蓬子的诗文、译作，拍照复制。也查阅了您主编的《现代》。他的诗集，只查到《银铃》。如果您还记得他的其他著作，盼告。

蓬子家乡有人来，当欢迎。

祝

如意！

叶永烈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叶永烈致《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我因写作长篇《姚氏父子》，所以细读了贵刊一九八七年一期丁玲的《魍魉世界》，觉得这是涉及姚蓬子南京囚居生活的最详尽的文献。

丁玲在第三章第二十二节《伤寒病》中，提及："他（姚蓬子）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此处及下文提及的《芜湖日报》，应为《大江日报》。当时，姚蓬子在芜湖大花园烟西墩任《大江日报》副刊主编（见《社会新闻》十一卷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

第十五节《与姚蓬子为邻》，提及丁玲与姚蓬子第一次相识，是在参加施蛰存先生的婚礼时——"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据施蛰存先生告知，他的婚礼日期为一九二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四日，亦即公历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以上意见，信手写下。供参考。

致

礼！

叶永烈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后 记

“我以为，报告文学作者的眼睛，应当是读者的眼睛。读者关心的、渴望了解的，正是报告文学需要‘报告’的。”我在报告文学选《雾中的花》（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的后记中，曾这样谈及我的“报告文学观”。

我写人物传记，亦作如是观。中国乃泱泱大国，人物如林。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传记文学作者的驰骋天地，都不及中国辽阔。自太史公始，中国的传记文学有着悠久、优秀的传统。如今，除了“奉命立传”之外，传记作者有着充分的自由选择传主。我的选择传主原则，大凡有二：

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第二，无人涉足。

“知名度高”表明传主是众所关注的；“透明度差”，则表明读者欲知而未知。诚如我那本报告文学的书名那样——《雾中的花》。

至于“无人涉足”，因为我不喜欢去“轧闹猛”，也不喜欢别人嚼过的馍。何必呢，去跟人家争题材，或去写人家早已写过的人物。尽力避免重复劳动；何况，中国值得立传的人物成千上万。

基于以上原则，所以我写傅雷，写傅聪，写马思聪，写殷承

宗，写戴厚英，写罗章隆，写王造时，写陶勇，写常溪萍，写彭加木……也正因为这样，我写了长篇文学传记《姚文元传》。

一般来说，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点棘手。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我倒觉得，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得之不易，倍感珍贵。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交叉。尊重史实是传记文学的铁原则。真即真，假即假，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这种写作，如同戴着枷锁跳舞，绝不可像写小说那般浮想联翩。

这种近乎“残酷”的创作原则，我却能够适应。因为我原本是自然科学统帅麾下的小兵，受过正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懂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写人物传记，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有时几乎要跑断腿；在我看来，如同当年在光谱仪旁，为了测得一个数据，要摄谱、冲片、对谱、测黑度……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也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传记文学具备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前提是尊重史实。不然，那只是小说了。

写人物传记，倘若传主健在，能够面对你的录音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那样的采访是很省力的。《姚文元传》一书的艰辛，不在于写，而在于采访。不是“七分跑，三分写”，几乎成了“九分跑，一分写”了。因为姚蓬子已死，而姚文元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无法面对面采访，只有依靠“迂回包抄”了。

当年深受“四人帮”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监狱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指点道：“文献是由文与献组成是。文，即档案、史书，是死的材料；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献’。因为‘文’总在那里，一二百年以后的作家要写，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写《李自成》那样。‘献’却要抓紧。一旦重要的当事人死了，

‘献’也就没有了。”我听从他的指点，从“文”、“献”两个方面开始采访。

“文”，对于姚氏父子来说，包括两大类：一是作品，因为姚氏父子皆为作家；二是档案。查阅作品是顺手的。我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图书馆，从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期刊、报纸上，查阅、摘录、复制了姚蓬子的诗、小说以及翻译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查到了他的《脱离共党宣言》全文。此外，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报刊上查到的姚蓬子诗集《银铃》的广告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社会新闻》第十一卷三期上姚蓬子“主编《大江日报》副刊”及其长篇小说《十年间》所登广告，都很有参考价值，并为进一步查阅提供了重要线索。我还查到老舍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重庆《新民报》上的散文《姚蓬子先生的砚石》。可以说，他把姚蓬子写活了！此外，查阅一九八〇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及夏衍《懒寻旧梦录》，了解不少关于姚蓬子在“左联”期间的活动情况。姚蓬子是潘汉年介绍入党的，我查阅了有关潘汉年的《冷落如泥香如故》等书。另外，查阅了许多文史资料选集，以求从中查出与姚蓬子有着密切关系的徐恩曾、费侠等中统特务头子身世。

姚文元的文章，远比姚蓬子多，查起来倒并不大费事。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大都收入他的集子，而且我的写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姚文元的全部文章的复印件！当我提着五大卷、好几公斤的复印件回家，像打了大胜仗似的——这下子节省了大量的逐篇查阅文章的时间。

在“文革”期间，姚文元发表了大量讲话。我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十几辑当时群众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集》，查阅了众多的“文革”传单和小报。另外，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初，全国两度掀起批判“四人帮”高潮，我复印了当时各报

批判姚文元的大量文章；还查阅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八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九日特别法庭四次审判姚文元时的现场记录。我用照相机翻拍了姚文元的各种社会活动照片，也查阅了海外姚文元的一些报道。

追寻姚氏父子的档案，颇为艰难。尤其是姚蓬子的档案材料，在“文革”中列为“防扩散材料”，属于“核心机密”。我为了盖一个某机关的公章，办好查阅手续，往返奔波多次，这才获得最后的许可，从两个重要部门调阅姚蓬子档案。不料，令人大失所望。其中一份档案中剩下卡片，另一份档案的牛皮纸口袋里，只装着当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烧毁姚蓬子档案的一纸公文以及留存备考的姚蓬子档案目录（原件均已销毁）。当然，那份目录多少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令我吃惊的是，就连姚蓬子家所在处的派出所里，也查不到按规定应永久保存的户籍卡——只是因为那上面记载着一九五五年姚蓬子曾被公安部逮捕，生怕影响姚文元的“光辉”，在“文革”中被列为“防扩散材料”而销毁！

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档案室里，我为写另一部人物传记查找材料，无意中，在一个公文卷里，发现一批姚蓬子材料！我的眼前一亮，立即细细翻阅。征得主管人员同意，我全部复印了这一卷姚蓬子档案。

相对来说，查找姚文元档案，倒还方便一些。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成为我排定姚文元年谱的依据。

一边查“文”一边找“献”。我东奔西跑，采访知情者。我发觉，“献”往往比“文”更重要。

知情者一般分三类：一种是他们的直系亲属或有牵连的人，最难采访。他们往往最知情，却不愿详谈。总是谈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在这样的人那里，我常常只能核对一些事实。慢慢熟悉之后，也能了解不少珍贵史料。

另一种是受迫害者，能够很热情、很尽力地给予帮助。

还有一种是无牵连者，一般知情不深，愿说。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一些背景材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聚首，与我交谈。他们认为大家一起回忆，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校正。那是一个星期天，几位老同志都应邀赶来。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又生动，又详细，远不是档案上的记载所能比拟的。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我深为感动，我把那天的录音磁带作为重要史料保存。

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们，也给以可贵的支持。有几位“老总”，与姚文元长期共事，以至是多年的邻居。如《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的翔实的回忆，同样是很重要的史料。

一些老作家、老诗人，回忆了半个世纪前的姚蓬子的往事，施蛰存谈笑风生，讲起姚蓬子种种为人之态。王若望的回忆中，谈及很重要的一件事，即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五十年代是怎样开始勾结的。王若望所讲的情况鲜为人知，又是他亲自经手的，是第一手的材料。

为了弄清“杂家”事件始末，我拜访了深受“姚棍子”迫害的罗竹风；为了弄清“德彪西计较战”的前前后后，贺绿汀对我谈了他与姚文元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查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经过，《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有关负责同志谈及了许多内幕……

上海某大学的许多老师，目击了姚蓬子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里弄干部们了解姚蓬子与姚文元间的来来往往；姚文元曾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的同事，也颇知情，我一一前往请教，采访。

我终于找到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成员，找到审查过姚蓬子的公安人员，还找到作家书屋当年的店员……

我曾笑称我的写作近乎“外调”，简直成了“专案组”一般。我细细研读了当年关于调查姚氏父子历史情况的中共中央文件。我的采访，几乎不放过文件中提到过的线索，不论这些知情人在上海还是在外地。

我从那张留存在姚蓬子档案中的目录上，注意到一个原中统负责人的名字。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他已是九十五岁的老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他谈了徐恩曾的身世，谈了费侠的叛变经过，谈了《扶轮日报》是怎么办起来的，谈了姚蓬子的叛变情况……他的这些“献”，很多是“文”中从未见过的。

姚蓬子在南京的情况，当然，丁玲是最了解的。在一九八五年夏，我去北京。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必须采访她。她当时很忙，但她告诉我，已经写了回忆录，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为了节省她的时间，凡是她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的事，她就不重复了……我一直期待着读到她的回忆录。我终于读到她用生命最后岁月写成的《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她用她的笔，为后人勾画了当年姚蓬子的可耻形象。

传记文学的大厦，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地基上，我经过反复“外调”，才进入写作阶段。

姚氏父子的身世，其实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的缩影。这样的人物，有深度，有跨度，需要作者能够有相当的驾驭史料的能力。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的史著，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最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准确、如实地掌握笔下的分寸。尽管姚氏父子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写作时仍需要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态度。就拿姚蓬子来说，在被捕、叛变之前，他是左翼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确实具有进步的倾向……当然，在他反水之后，也充满深深的矛盾，他是在极度的隐痛中过着他的“文化掮客”生涯。没有一个叛徒，是真正幸福的。

传记文学与小说一样，同样需要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不过，小说属“合成材料”，作者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却属“天然材料”，必须依据人物的本来性格加以刻画，比起小说来，“自由度”要小得多。在写《姚氏父子》时，我以为写姚蓬子要比写姚文元容易，原因便在于姚蓬子本来就是个性格鲜明的人，他的喜欢炫耀、不甘寂寞，他的马虎之中透着精明，他的吝啬刻薄，他的不修边幅，构成了他的生动形象。相对来说，书中对姚文元的性格的刻画要差一些，他不如姚蓬子那般鲜明。

姚文元道路，是一条政治投机之路。“反胡风”、“反右”和“文革”，姚文元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投机手腕，来了个“三级跳”。把这个人物的本质写透了，把“无产阶级金棍子”的“成长历程”写出来，实际上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重大的“左”的失误的分析与批判。姚文元在“反胡风”中，本来处境狼狈，因为姚蓬子受胡风一案牵连，被公安部拘捕审查，姚文元也因与胡风的来往受到组织审查，而且审查小组负责人之一便是他当时的恋爱对象金英。他差一点连女友都告吹！他随机应变，投奔张春桥，接二连三地在张春桥任社长兼总编的《解放日报》上抛出一系列批胡风的文章，他由此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在上海文艺界崭露头角。在一九五七年“早春天气”，姚文元本来发表了许多篇有着“右派”言论的文章，“右派”的帽子已在他的头上旋转了！当他听到“反击右派”的风声时，急急抛出那篇《录以备考》，迅速被《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人民日报》还在社论中提及《录以备考》，他再度投机得胜，成为“反右英雄”。此后，他踌躇满志，“横扫”巴金、艾青、秦兆阳、流沙河、周谷城，以致把棍子打到丁玲头上。他终于经张春桥力荐，被那位从北京秘密来沪的“女客人”所看中。于是，江、张、姚结伙，姚的“四评”（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陶铸、评周

扬）拉开了“文革”大幕，他也由此一跃而为“中央首长”……剖析姚文元道路，为他立传，目的在于使青年读者了解“左”毒曾怎样狂獗一时，给人民的事业带来多大的灾祸，从而察往知来，借昔鉴今。细细追究姚文元的“政治投机商”的看家本领，发觉乃是与其父一脉相承。姚蓬子时而是左翼作家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中共中央特科联络，时而倒入国民党反动派怀抱，成为中统局的科长，接连发表反共文章，时而当起作家书屋老板，时而教起中国文学史来……写姚文元，不可不写姚蓬子。于是，我选定姚氏父子作为传主。写《姚文元传》，着眼于姚氏一父一子，却浓缩着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风云和文坛搏斗。这是一对特殊的父子。传主本身所具备的深刻内蕴，使传记具有力度和深度。

在我看来，把透明度甚差的人物通过长篇传记清晰地推到读者面前，这个过程如同解数学方程求得 X。求解姚氏父子的 X，是颇花精力的。我终于在一九八六年秋，写出了《姚文元传》一书初稿。

写完后，鉴于这本书所具有的敏感性，两家大型文学丛刊的编辑看了，都很喜欢却未敢发表。我不求急功近利——早在酝酿写《姚文元传》这样一批人物传记时，我就已很明确地跟一位老编辑谈过。我说，写完之后，也许要过十年、二十年才得以与读者见面，但我必须抓紧在这几年采写——因为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已经步入风烛残年，晚了一步就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仓库里“抢”到不可复得的珍贵史料。我在采写《罗隆基传》时，就有深切的感受，因为那段时间我简直成了北京几家医院的常客——被采访者差不多都年已耄耋，只能在病房中接待我。我想，我将不仅仅把我写的这些传记留给后人，我也将把大量的录音磁带、采访笔记留给后人——那将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资料。正因为这样，写这些人物传记，我耐得寂寞。青灯一盏，书桌一张，默默笔耕，案牍劳形，如此而已。

《姚文元传》写出初稿（初稿名《姚氏父子》）之后，我又发现一些新的资料、新的线索。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初，我进行了补充采访，对初稿作了很大的修改、补充，从最初的十三万字扩充到二十五万字。

在完成第三稿之后，我再度赴京，对姚蓬子胞妹姚舞雁、姚蓬子多年之友楼适夷以及已经出狱的关锋进行采访，又对全书作了补充修改。

本书初版本于一九八八年印出。出版前曾由国内多家报刊发表。此后，我又访问了田家英夫人董边、刘志坚、李锐、芦荻、马以鑫以及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我还专程前往姚文元故乡——浙江诸暨，来到姚公埠姚家老屋。在诸暨，得到地方志办公室陈侃章、档案馆姚彩娟以及姚家老邻居俞校法等的帮助。这次，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

叶永烈

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九月三十一日二稿
二〇〇〇年五月三日三稿
于上海沉思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姚文元传
作者=叶永烈著
页数=478
SS号=0
出版日期=